

第一国际 巴塞尔代表大会 (文件资料)

[苏] 弗·阿多拉茨基主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第一国际 巴塞尔代表大会

(文件资料)

〔苏〕弗·阿多拉茨基 主编

张文焕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029374

ПОД РЕДАКЦИЕЙ
В. АДОРАТСКОГО
БАЗЕЛЬСКИЙ КОНГРЕСС
ПЕРВОГО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А
6—11 СЕНТЯБРЯ 1869 г.

根据俄共(布)中央出版社1934年版译出

第一国际巴塞尔代表大会

(文件资料)

(苏)弗·阿多拉茨基 主编

张文焕 译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郊海淀路39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北京鼓楼西大石桥胡同61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开本: 850×1168毫米32开 印张: 6

1983年9月第1版 1983年9月第1次印刷

字数: 128,000 册数: 5,300

统一书号: 3011·171 定价: 0.63元

目 录

序 言 1—19

代表大会议记录

代表大会开幕式.....	23—26
发言的代表有：布律安、安斯、埃卡留斯、里沙尔、阿普耳加思、里廷豪森	
第一天（1869年9月6日）.....	29—30
上午会议。——审查代表资格证。选举主席和秘书.....	29
下午会议。——批准议事日程。讨论戈克提出的把直接立法问题列入代表大会议事日程的建议。成立关于土地问题、继承权问题、信贷问题、人民教育问题、工会问题的专门委员会.....	29
第二天（1869年9月7日）.....	31—35
上午会议。——成立起草以后各次代表大会规则的专门委员会。通过取消支部主席和副主席职称的决定。通过保存代表大会文件和公布正式报告的决定.....	31
下午会议。——总委员会报告。缪拉对总委员会报告的修正。各地代表的报告：安斯（比利时）、里沙尔（马赛、里昂）、李卜克内西和施皮尔（德国）、施维茨格贝耳（库尔特拉里）、帕利克斯（里昂）、巴斯腾（维尔维叶）、吉特（瑞士裁缝联合会中央委员会）、戈克（瑞士德国工人教育协会联合会）。菜克对戈克发言的意见。施维茨格贝耳和里廷豪森发表声明。各地代表继续发言：法尔加-佩利塞尔（巴塞罗纳）发言	31
第三天（1869年9月8日）.....	36—42

上午会议。——讨论代表大会经费。把建议提交组织问题委员会讨论。决定把报刊上出现的诬蔑国际的一切文章寄给总委员会。舍马莱就这个问题发表声明………	36
下午会议。——大会秘书处宣布寄给代表大会的信件和电报。各地代表继续发言：堵列（日内瓦钟表匠联合会）、德·巴普（比利时）、布律安（巴塞尔）、罗班（列日）、卡普卢索（那不勒斯）。缪拉提出关于巴塞罗纳罢工问题。法尔加回答缪拉的问题。各地代表继续发言：贝克尔（日内瓦，德语区支部中央委员会）、格罗斯兰（日内瓦工会联合会）、昆舍（巴塞尔制带工人协会）、弗拉奥（巴黎大理石工人协会）、瓦尔兰（巴黎）、诺马耶（维也纳）。巴枯宁就诺马耶的报告发言。各地代表继续发言：弗洛凯（洛克尔）、阿普耳加思（英国木工和细木工联合会）………	36
第四天（1869年9月9日）	43—49
上午会议。——批准以后各届代表大会的规则。改变第五天和第六天的议程………	43
下午会议。——大会秘书处宣布收到的信件和电报。土地问题委员会报告。埃卡留斯（总委员会）发言。施皮尔、缪拉、舍马莱提出建议。国际各地方支部关于土地问题的报告：里沙尔（里昂）、德·巴普（布鲁塞尔）、奥布里（鲁昂）、亨格（日内瓦）、安斯（布鲁塞尔）。辩论土地问题：舍马莱、斯特普尼、戈克、鲁克拉夫特。………	43
晚上会议。——讨论关于总委员会权力的决议………	49
第五天（1869年9月10日）	50—67
上午会议。——继续辩论土地问题：托伦、里沙尔、朗格鲁瓦、布律安、巴枯宁。美国全国劳工同盟代表凯麦隆莅临。继续辩论土地问题：缪拉、列斯纳、贝克尔、塔尔塔列、安斯发言………	50
下午会议。——继续辩论土地问题：埃卡留斯、莫兰、	

弗留诺、罗班、格雷利希发言。就土地问题进行表决。	
卡普卢索对决议案提出补充。总委员会关于继承权问题的报告。继承权问题委员会报告。辩论继承权问题：舍马莱、德·巴普、里沙尔、瓦尔兰、缪拉、巴枯宁、李卜克内西、吉约姆、朗格鲁瓦、塔尔塔列、托伦发言。	
弗拉奥建议把信贷问题和人民教育问题从代表大会的议程上撤销	57
晚上会议。——关于新支部加入国际的规则的决议	66
第六天（1869年9月11日）	68—82
上午会议。——工会问题委员会的决议。国际各地方支部关于工会问题的报告：库尔特拉里区支部的报告，巴黎铜匠协会的报告。辩论工会问题，发言的有：李卜克内西、舍马莱、卡普卢索、巴枯宁、安斯、弗拉奥、杜朗、托伦、弗留诺、赫斯、布里斯美。	68
下午会议。——继续辩论工会问题，发言的有：缪拉、塔尔塔列、布里斯美、格雷利希、格罗斯兰、列斯纳。阿普耳加思提出关于工会问题的决议案。就工会问题决议案进行表决。凯麦隆发言。荣克致闭幕词	72
晚上会议。——杜朗宣读巴黎来信。讨论召开下届代表大会的地点。发言的有：巴斯腾、李卜克内西、巴枯宁、埃卡留斯、安斯、鲁克拉夫特、阿普耳加思。批准总委员会的财务报告。通过关于抵偿代表大会开支的决定。	
确定伦敦为总委员会驻在地。代表大会闭幕	80
代表名单	83—88

代 表 大 会 材 料

代表大会的决议和决定	91—96
一、关于土地所有制问题	91
二、关于工会问题	91
三、关于劳动统计问题	91
四、关于组织问题	92

1 关于主席职位	92
2 关于含有攻击协会的言论的出版物	92
3 关于在协会的机关刊物上公布管理处和总委员 会的地址	93
4 关于新支部加入协会的手续	93
5 关于接收新支部加入协会的手续	93
6 关于从协会内开除支部的手续	93
7 关于解决协会各支部之间的冲突	93
8 关于会费	94
9 关于会费的数目	94
10 关于各地方支部向协会代表大会的总结报告	94
11 关于协会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	95
五、个别决定	95
关于协会下次代表大会召开的地点	95
关于抵偿巴塞尔代表大会的开支	95
关于总委员会的财务报告	95
关于总委员会的驻在地	95
六、选举总委员会	96
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的材料	97—106
各委员会的成员	97
土地所有制问题委员会的报告	98
工会问题委员会的报告	103
综合教育问题委员会向代表大会提出的决议草案	106
在代表大会上宣读的贺词	107—109
纽约德国工人联合总会的贺词	107
法国海员联合会的贺词	108

附录

关于召开代表大会的通知	113—114
卡·马克思·比利时的屠杀	115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395—400页)	

卡·马克思 致合众国全国劳工同盟的公开信	116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401—403页）	
《蜂房报》关于总委员会会议的报道摘录	117—122
第一国际总委员会1869年9月14日会议记录	123—128
马克思和恩格斯书信摘录	129
1. 卡·马克思致路·库格曼（1869年5月11日）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592页）	
2. 卡·马克思致弗·恩格斯（1869年5月14日）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299页）	
3. 卡·马克思致弗·恩格斯（1869年7月3日）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312页）	
4. 弗·恩格斯致卡·马克思（1869年7月6日）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314页）	
5. 卡·马克思致弗·恩格斯（1869年7月17日）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318页）	
6. 卡·马克思致弗·恩格斯（1869年7月22日）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323页）	
7. 弗·恩格斯致卡·马克思（1869年7月25日）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328页）	
8. 卡·马克思致弗·恩格斯（1869年7月27日）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331页）	
9. 弗·恩格斯致卡·马克思（1869年7月30日）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334页）	
10. 卡·马克思致弗·恩格斯（1869年8月8日）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338页）	
11. 卡·马克思致弗·恩格斯（1869年8月10日）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339页）	
12. 卡·马克思致海尔曼·荣克（1869年8月13日）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619页）	
13. 卡·马克思致弗·恩格斯（1869年8月18日）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347—348页）	
14. 卡·马克思致劳拉·拉法格（1869年9月25日）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620—621页〕	
15.卡·马克思致弗·恩格斯(1869年10月30日)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360—361页〕	
16.弗·恩格斯致卡·马克思(1869年11月1日)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362页〕	
17.弗·恩格斯致卡·马克思(1869年11月9日)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366页〕	
18.卡·马克思致弗·恩格斯(1869年12月4日)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392页〕	
19.弗·恩格斯致卡·马克思(1869年12月9日)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394页〕	
20.卡·马克思致塞·德·巴普(1870年1月24日)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629—633页〕	
德·巴普、荣克、李卜克内西、列斯纳和拉法格致马克思的信	130—145
1.塞·德·巴普致卡·马克思(1869年5月31日)	130
2.塞·德·巴普致卡·马克思(1869年6月9日)	131
3.海·荣克致卡·马克思(1869年8月12日)	132
4.弗·列斯纳致卡·马克思(1869年9月6日)	133
5.弗·列斯纳致卡·马克思(1869年9月7日)	134
6.威·李卜克内西致卡·马克思(1869年9月7日)	136
7.弗·列斯纳致卡·马克思(1869年9月8日)	137
8.弗·列斯纳致卡·马克思(1869年9月9—10日)	139
9.弗·列斯纳致卡·马克思(1869年9月11日)	141
10.保·拉法格致卡·马克思(1869年9月中)	143
注 释	146—148
索 引	149—180
发言人事引	149
人名索引	153
报刊索引	178

插 图

第一国际巴塞尔代表大会代表（根据当时的 照片复制）	27
第一国际巴塞尔代表大会代表	
一	39
二	55
三	77

序　　言

一

马克思在第一国际中的全部活动都服从于准备无产阶级革命这个任务。马克思创立的国际实际上是国际性的工人阶级政党，这个政党的使命是组织无产阶级和把它对资本进行的“游击战”提高到整个战线的革命战争，即为推翻资产阶级、确立无产阶级专政和消灭阶级的战争的水平。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第一国际的任务是，既集合工人阶级的力量，又在未来的夺取政权的革命战斗中直接领导无产阶级。1867年马克思给恩格斯写道：“在下一次革命到来时——它也许比表面看起来到来得更快些——我们（也就是你和我）就将这个强大的机器掌握在我们手里”。^① 马克思之所以把这架机器的主要杠杆总委员会的驻在地选择在伦敦，首先是考虑到，只有在伦敦，国际的领导在决定关头才会处于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心。

大家知道，历史对期限问题作出了自己的修改。但是，只有蠢汉和伪造者才会因此而怀疑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第一国际中的政策的正确性。相反地，马克思领导国际的全部路线已经完全和整个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正是由于这种领导，正是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坚定的和一贯的方针，正是由于他们的英明的革命战略和策略，正如列宁所说，第一国际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348页。——译者注

“奠定了工人国际组织的基础，使工人做好向资本进行革命进攻的准备”①。

马克思对当时无产阶级和工人运动所处的水平并不抱任何幻想。在上一世纪六十年代的条件下，建立无产阶级的国际性、群众性政党意味着什么呢？这首先意味着把各个国家工人运动的各种支流纳入国际的共同航道。恩格斯写道：国际工人协会“的目的是要把欧美整个战斗的工人阶级联合成一支大军……它应该有一个不致把英国工联，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和西班牙的蒲鲁东派以及德国的拉萨尔派拒之于门外的纲领”②。

马克思和恩格斯有意识地让国际在最初阶段兼容并包。但是，只有社会民主党内的那些不可救药的伪造者，才把马克思的政策解释成在国际里“调和”各种流派的政策。相反地，马克思在第一国际中的政策不是调和，而是斗争；这种政策在于根据工人本身的经验向他们耐心地阐明唯一正确的斗争道路，从而揭露国际中的一切反无产阶级的流派；这种政策意味着进行顽强的工作争取群众，逐渐孤立各个宗派的首领，最后把他们完全排挤出国际。这是一种深谋远虑的和非常灵活的“统一战线策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国际的整个历史过程中坚定不移地执行了这种策略。

在国际的第四次代表大会即巴塞尔代表大会以前，马克思已经在这条道路上取得了很大成就。总的政治形势对国际的发展是非常有利的。六十年代下半期是当时“文明世界”各个角落都发生战争和革命震动的时期。在英国，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从争取宪章的斗争以来第一次在政治舞台上反对资产阶级，并取得了一些成就，这些成就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国际的帮助取得的。在法国，第二帝国在政治和军事上不断遭到破

① 《列宁选集》第3卷第809页。——译者注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43页。——译者注

产，从而面临着新的革命；难怪马克思1869年春天在给库格曼的信中谈到法国即将爆发“新的革命”时高兴地写道，那里“整个历史的魔女之锅就沸腾起来了”^①。在德国和意大利，在尖锐的阶级斗争过程中解决了这两个国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主要问题：国家统一问题；1869年8月在爱森纳赫建立了第一个社会民主党。西班牙处于深刻的动荡之中，1868年完成了这个国家资产阶级革命的许多阶段的一个阶段——推翻了波旁王朝。奥地利还没有从1866年战争的失败引起的震动中恢复元气。在美国，资本主义在北方人用内战的胜利清扫出的基地上蓬勃发展，工人运动也迅速发展起来。

在1867—1869年，西欧的罢工浪潮此起彼伏，常常伴随着同军队和警察的冲突。国际积极参加了罢工运动，从而在无产阶级群众中极大地提高了国际的威信，同时也引起了资产阶级阵营中的极大恐慌。这种恐慌表现在一方面警察恐怖的加剧，另一方面激进的资产者加紧拉拢工人运动。恩格斯在1869年4月给列斯纳的信中写道：“他们明明知道，社会运动有朝一日将彻底制服他们，却又不得不对这个运动做一些言不由衷的赞扬，再没有比这种赞扬更滑稽可笑的了”。在这封信中，恩格斯还对国际形势做了总的评价。全世界都面临着“劳动和资本的矛盾尖锐化以及更加激烈的阶级斗争。”针对这种情况，恩格斯指出：“事情的进展比任何时候都好。”^②的确，1869年是国际工人运动蓬勃发展的一年，是国际的拥护者的人数在各个重要的国家中空前增长的一年。

但是，1869年巴塞尔代表大会在第一国际历史上的特殊地位，不能完全用人数的增长来说明。必须联系代表大会前后在国际队伍内进行的并在代表大会过程中明显表现出来的斗争来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585页。——译者注

② 同上书第587页。——译者注

考察这次代表大会，才能正确评价它的历史意义。

* * *

这场斗争的主角是马克思。他无疑也是巴塞尔代表大会的中心人物，虽然他没有出席代表大会。

马克思直接指导了代表大会的一切准备工作。1869年6月至7月总委员会的许多会议讨论了这次代表大会的议事日程问题。马克思在总委员会的许多发言中对列入议事日程的所有问题都阐明了自己的立场，从而论证了总委员会对这次代表大会的路线。同时，马克思就这些问题同国际的许多活动家（其中包括李卜克内西和德·巴普）进行通信。这样，总委员会中马克思的亲密战友在起程到巴塞尔去以前便从马克思那里得到了明确的政治指示，他们都在代表大会上尽其所能地贯彻了这些指示。

马克思还为总委员会起草了向代表大会的总结报告。宣读这个出色的报告给巴塞尔代表大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列斯纳回忆说：报告“经常被暴风雨般的掌声打断。”最后，在代表大会进行的过程中，马克思还给大会主席荣克寄去了其他材料，其中包括关于继承权的报告。荣克收到了这些材料后向总委员会代表团的同志们说：“现在我们全副武装起来了。”^①

二

土地所有制问题是代表大会的一个主要议题。

在国际的代表大会上讨论这个问题已经不是第一次了。1867年洛桑代表大会上曾争论过这个问题，1868年布鲁塞尔代表大会曾进行过专门讨论，布鲁塞尔代表大会以六十四票中的三十四票通过决定：“现代社会的经济发展创造了把耕地转为

^① 见本书第139页。——译者注

公有的社会必要性”，并“以国家的名义在保证合理耕种的条件下把土地交给农业合作社使用。”

私有制的拥护者蒲鲁东派在布鲁塞尔成为少数，他们非常不满，认为对土地问题没有进行“全面的”讨论，在代表大会后不止一次地反对大会通过的决议。马克思所以重新把这个问题列入应届代表大会的日程，是为了在巴塞尔彻底清算蒲鲁东派，并坚决强调国际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

蒲鲁东派也在准备进攻。1869年6月9日，德·巴普在给马克思的信中写道：“个人主义者想对布鲁塞尔代表大会的决定进行报复，我很担心，如果这一次集体主义者将仅仅得到布鲁塞尔和鲁昂报告的支持，代表大会将遭到突然袭击，并放弃在布鲁塞尔批准的结论。”^①

德·巴普的担心过分了。在土地所有制问题上马克思的拥护者把绝大多数代表团结在自己周围。反对土地公有的只是一小撮旧的法国蒲鲁东主义者（托伦、舍马莱、缪拉、朗格鲁瓦、弗留诺）。他们的论据归结为替小所有制进行庸俗的辩护和恶毒地攻击共产主义。

这一小撮人遭到了参加辩论的人的坚决反击。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承认，“社会有权废除土地私有制并把土地变为公有财产”，这种转变“是必要的。”

巴塞尔代表大会关于土地问题的决定给了国际中的资产阶级分子以毁灭性的打击。尽管通过的决议的措词不够确切（这同在它基础上联合起来的多数派成员复杂这一点完全相适应），它在无产阶级中间和资产阶级中间留下深刻的印象决不是偶然的：不管是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都理解到，这里谈的不是教条的争论，也不是无害的改革。巴塞尔的决议是在马克思的鼓舞下作出的。还在1850年马克思就声明：“只有资本的瓦解，

^① 见本书第131—132页。——译者注

才能使农民地位提高；只有反资本主义的、无产阶级的政府，才能结束他们在经济上的贫困和社会地位的低落。”^①马克思把土地问题作为无产阶级革命问题的组成部分提到国际面前。为了“唤醒农民”，就需要工人阶级专政；但是，为了夺得这个专政，就必须把无产阶级革命和农民战争结合起来。

出席巴塞尔代表大会的总委员会代表，尽管政治上和理论上都不成熟，但从他们的发言可以清楚地听出马克思直接指示的精神，可以感觉到马克思在代表大会前夜做的工作的影响。鲁克拉夫特的发言就是一个例证。鲁克拉夫特要求土地转归国有，使土地成为“国家的财产，并且由国家来耕种以造福整个社会——但不是在执掌国家政权的享有特权的少数人领导下进行”。鲁克拉夫特坚决反对永远保存小所有制；他主张应当“大规模地耕种土地，并尽可能使用能够节省劳动的机器”，以便“使科学能为大家的福利服务”^②。接着鲁克拉夫特说，“工人阶级应当掌握政权，把议会变为工人议会”，只有在这个条件下才能真正实现土地向人民手中的转移。坚持大农业比小农业优越的还有列斯纳和埃卡留斯。列斯纳说：“现在大农业带来的一切好处都落入少数人的口袋。科学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科学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是有利于土地公有制的”。

巴塞尔代表大会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对于英国和德国的工人运动具有重大意义；它在许多农业占优势的国家里加强了国际的阵地。根据杜邦的请求，马克思写了“论土地国有化”的卓越手稿，对巴塞尔决议的思想加以发挥。手稿开头这样说：“土地所有权——一切财富的原始源泉，现在成了一个大问题，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74页。——译者注

② 见本书第48页。——译者注

• 最后一句话引自布鲁塞尔出版的关于代表大会的报告的第74页，在这个版本中，鲁克拉夫特的发言比伦敦的正式版本较为详细。——编者注

工人阶级的未来将取决于这个问题如何解决”。最后马克思写道：“土地国有化将使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关系彻底改变，归根到底将完全消灭工业和农业中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那时，阶级差别和特权将与它们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一同消失。靠他人的劳动而生活将成为往事。同社会相对立的政府或国家将不复存在！农业、矿业、工业，总而言之，一切生产部门都将逐渐地用最合理的方式组织起来。生产资料的全国性的集中将成为由自由平等的生产者的联合体所构成的社会的全国性基础，这些生产者将按照共同的合理的计划自觉地从事社会劳动。这就是十九世纪的伟大经济运动所引向的人道目标”^①。

从写这篇文章以来，无产阶级已走过了漫长的道路；它的革命理论已被几十年的经验所丰富，提高到新的更高的阶段，列宁主义阶段。第一国际的非常丰富的经验和马克思的整个伟大遗产，在布尔什维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中，在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这里面也包括第一国际中在土地所有制问题上进行的斗争的经验教训。同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对小所有制的反动思想家——蒲鲁东派的斗争直接相联系的，是列宁和斯大林反对民粹派的反动空想的斗争，反对孟什维克马斯洛夫的自由资产阶级处方的斗争，反对十月革命后机会主义（托洛茨基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的斗争。没有这七十年中长期的和顽强的斗争，集体农庄制度在苏联农村的伟大胜利是不可思议的，在我国取得的对资本主义的彻底胜利也是不可思议的。

三

围绕着巴塞尔代表大会土地决议的斗争是马克思主义同蒲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51、454页。——译者注

鲁东主义的最后一次严重的搏斗。这次斗争之后，旧形式的蒲鲁东主义已经死亡。在代表大会前举行的总委员会会议上，马克思认为必须尖锐反对“代表私有者农民思想的小农场的拥护者”^①。但是，这时右派蒲鲁东主义甚至在自己的老巢——巴黎也已失去了自己的基础。荣克从巴塞尔回来后在总委员会声称：“大多数巴黎工人拥护土地公有制。投反对票的代表不反映〔巴黎工人的〕真正意见。”^②

“个人主义者”在巴塞尔的破产证明，国际历史的整个一个时期已成为过去。在这个历史的整个第一个时期内（1864—1869），作为国际内主要分水岭的主要问题，是关于无产阶级运动的目的问题；在这个时期的各次代表大会上关于所有制的争论实质上是关于社会主义的争论。在国际的整个这个时期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的和最凶猛的敌人是蒲鲁东主义。还在《共产党宣言》中，蒲鲁东主义就被称作“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马克思的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相反，“巴黎的先生们”保护按蒲鲁东的精神理想化了的庸俗的资产阶级生意经^③。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到巴塞尔代表大会时马克思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从这时起，在国际中打着公开保护私有制的旗帜来激烈反对马克思主义已经不可思议了。关于“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旧的争论已经失去了它的尖锐性。从现在起，任何反对马克思领导的总委员会的稍微有力量的反对派，都只有在革命词句和社会主义词句的掩盖

① 《蜂房报》的报道中没有提马克思的名字（见本书第116页）。在波斯特盖的笔记中是这样写的：“马克思认为蒲鲁东主义者是小农的代表”（《马克思恩格斯文库》1927年俄文版第3卷第320页）。——编者注

② 见本书第124页。本书方括号〔〕中的字均系本书编者加的。——译者注

③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61页。——译者注

下才有可能活动。事实上也的确是这样：巴枯宁主义代替了蒲鲁东主义。

蒲鲁东主义反映了保守的小所有者的情绪，这种小所有者迷信地抓住自己那一小块土地不放，或者抓住自己的手工工作台不放，他们还没有丧失用“互助”和“贷款”的办法拯救自己的希望。巴枯宁主义反映了同一种小所有者的绝望情绪，他们已陷入饥寒交迫的境地，又无力提高到进行有组织的革命斗争的水平，所以很容易受假革命的豪言壮语的影响。蒲鲁东的反动的空想主义和巴枯宁的“左的”歇斯底里叫嚣具有同一个阶级根源。巴枯宁主义是典型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性。

正是在布鲁塞尔代表大会和巴塞尔代表大会之间这段时间内，巴枯宁在国际中积极展开秘密活动，准备公开反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巴枯宁的目的是要夺取国际的领导权并把自己的无政府主义纲领强加给国际。他用被他净化了和改良了的蒲鲁东主义的“理论”来对抗马克思的学说。的确，巴枯宁的学说是到处适应庸人需要的蒲鲁东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混合物，它把“放弃政治运动作为主要信条（蒲鲁东主义的）”^①。这种“理论”的最高表现是“社会清算”，这种“社会清算”应当一下子消灭资本主义和国家，并在它们的废墟上实行“法律的和政治的无政府状态”。

按照巴枯宁的意图，他所建立的秘密组织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应当通过自己的阴谋活动夺取“看不见的专政”——先在国际中夺取，然后在全世界夺取——并宣布“社会清算”的到来。巴枯宁想在1868年12月使同盟作为国际协会内部的一个特殊的国际性团体合法化，这种企图遭到马克思的坚决反对。巴枯宁同意了总委员会提出的解散同盟的要求，可是背地里他不仅把同盟作为一个秘密团体保留下来，而且狂热地巩固它，收集力量准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95页。——译者注

备公开向总委员会进攻。

巴枯宁想把巴塞尔代表大会作为这种第一次进攻的场所。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首先力求把自己的信徒尽量多地派到巴塞尔去，想不惜任何代价在代表大会上获得多数。日内瓦人培列给荣克写信说：“他们〔同盟分子〕想尽办法把自己的候选人派到巴塞尔去，也想把格罗斯兰作为候选人派去……他们的手法是，要使得派到巴塞尔去的完全是同盟的成员：亨格、布罗塞、巴枯宁”。1869年7月29日，巴枯宁通知自己的一个亲密战友里沙尔：“我已写信给所有的地方，告诉我们所有的朋友，建议他们在九月份会见。请你们尽量多来人，因为德国人在紧张地进行活动”……“只要能做到的，一切都在全力以赴地在做。据说，该死的德国人准备在代表大会上同我们较量”。巴枯宁所说的“德国人”当然是指马克思及其战友。

虽然所有这些阴谋活动都是极端秘密地进行的，但仍然逃不过伦敦的视线。马克思还没有掌握秘密同盟存在的证据，但是对巴枯宁的真正意图一清二楚。1869年7月27日，马克思给恩格斯写信说：“贝克尔本人并不危险。但是，据我们从瑞士得知，他的秘书雷米是巴枯宁先生硬塞给他的；这个人是巴枯宁的工具。这个俄国人显然想当欧洲工人运动的独裁者。让他留神点。否则他将被正式‘革出教门’”。恩格斯在回信中说：

“十分清楚，肥胖的巴枯宁隐藏在幕后。如果这个该死的俄国人真想用阴谋手段窃取工人运动的领导，那末现在该是好好教训他的时候了，该是提出一个泛斯拉夫主义者究竟能否成为国际工人协会会员的问题的时候了”^①。

同盟想在九月代表大会上取胜的希望破灭了。在巴塞尔，巴枯宁还不敢公开以反对派的面貌出现，不敢直接了当地提出总委员会的政治路线问题和它的成员、驻在地问题。但是，巴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331、334页。——译者注

枯宁仍然企图（不无结果）在一系列问题上同马克思的立场相对抗，并瓦解由总委员会代表团领导的代表大会上的参差不齐的多数派。

在土地问题上，同盟分子支持多数派。但是，在反对右派蒲鲁东主义者时巴枯宁虽然同总委员会保持统一战线，可是在关于土地问题的辩论中他就已经宣布，全部问题在于“社会清算”，即他所谓的“废除……政治的和法律的国家”^①。巴枯宁解释说，他之所以支持多数派的决议，是因为土地公有是以所谓“自下而上的社会组织”为前提的，可是委员会的少数派“仍然谈的是国家”……

这种攻击遭到了反击。埃卡留斯接受了挑战，他同巴枯宁辩论时强调了无产阶级国家的决定作用，没有它土地公有的口号就会成为一句空话。埃卡留斯还指出了蒲鲁东主义和巴枯宁主义的内部联系：“巴枯宁在他同法国人的谈话中显然染上了他们对国家的恐惧病……如果站在国家一旁就不能改造国家，而社会改造只有靠工人阶级在国家中掌握的权力才能实现”。

四

紧接着这第一次交锋之后，巴枯宁蓄意谋划了一次主要的打击——关于继承权的辩论。

圣西门关于继承权的论点早就是巴枯宁的心爱的“思想”之一。在他的各种宣言、纲领和手册中，这个问题占有中心位置。巴枯宁坚持认为，在资产阶级国家中通过立法途径废除继承权是社会主义革命的起点。因此，同盟把巴枯宁纲领中的这一条作为在巴塞尔发起总攻的主题。此外，巴枯宁选择这个问

① 见本书第52页。——译者注

题纯粹出于策略考虑。

协会日内瓦支部提议把这个问题列入代表大会议事日程，自然是受到巴枯宁唆使的。1869年7月20日在总委员会内事先讨论这个问题时，马克思详细剖析了巴枯宁的方案。马克思毫不费力地揭露了这个建议的所谓革命性后面隐藏的极端的改良主义。马克思说：“如果工人阶级拥有足够的权力来废除继承权，那它也就足够坚强有力来实行剥夺了”^①。

马克思没有授权荣克和埃卡留斯在代表大会上独立地阐述总委员会对这个问题的立场。马克思为他们准备了一个报告，让他们代表总委员会在代表大会上宣读，其中对巴枯宁的处方进行了体无完肤的批判。马克思在这个文件中说：“同所有一般的民法一样，继承法并不是一种原因，而是一种结果，是从现存社会经济组织中得出的法律结论，这种经济组织是以生产资料即土地、原料、机器等的私有制为基础的……我们应当同原因而不是同结果作斗争，同经济基础而不是同它的法律的上层建筑作斗争……承认废除继承权是社会革命的起点，只能意味着引诱工人阶级离开那实行攻击现代社会真正应持的阵地……这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反动的。”^②

巴枯宁为了维护自己的方案而提出的反论据清楚地说明，他不仅依靠自己的拥护者，而且希望得到代表大会的极右翼的支持。巴枯宁在关于继承权的发言中根本没有提到“社会清算”问题；可是，巴枯宁尽力强调，他与马克思主义者不同。马克思主义者把这个问题的解决同革命和剥夺联系起来，而“不管是他还是他的朋友们建议废除继承权首先正是出于实际的考虑”。他把废除继承权看作是和平地实行土地公有的方法，这样就不至于因剥夺而吓坏小所有者，在现在的土地所有者死后逐渐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651页。——译者注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84—285页。——译者注

地把土地交归社会掌握……

在代表大会上缺少充分坚定的和理论水平高的马克思主义小组的情况下，巴枯宁的这种手腕对决议案的讨论和表决不能不发生影响。只有德·巴普一个人想在讨论中坚持马克思的立场，他声明，“祸害的根源在于人们划分为资本家和雇佣劳动者。怎样消灭这种划分，——这就是需要解决的任务”。德·巴普遵照马克思的思想，强调指出巴枯宁方案的机会主义性质：“继承权的反对者把希望寄托在资本家和工人阶级可能达成的协议上”，可是在大多数国家里，“无产阶级不得不仿效资产阶级而采用暴力”。

投票人的名单（见本书第147页注释^①）说明，相当一部分代表有些不知所措：许多代表投票反对两个决议案，一些代表弃权，甚至德·巴普也没有投票支持总委员会的决议案。继承权问题委员会的建议得到的票数比总委员会的建议得到的票数还多，但是没有得到绝对多数。两个决议案都被否决，代表大会没有就继承权问题通过任何决议。

巴枯宁的第一次示威性的进攻没有取得胜利。但是，这次进攻表明，巴枯宁主义已成为国际进一步发展的严重威胁。马克思说，巴塞尔的斗争“成了同盟对国际进行公开不断的战争的信号，这个战争不仅反对总委员会，而且也反对一切拒绝承认这个宗派集团的纲领，尤其是拒绝承认它关于完全放弃政治的学说的国际支部。”^①

看来，在继承权问题委员会的会议上，也对巴枯宁进行了一些反击，尽管这个委员会的大多数成员都是明显的巴枯宁主义者。9月8日列斯纳在给马克思的信中说：“他〔荣克〕和赫斯昨天晚上在继承权问题委员会会议上好好地收拾了巴枯宁”（见本书第139页。——译者）。

——编者注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16页。——译者注

五

马克思是伟大的组织者。在国际总委员会中，马克思不知疲倦地进行着协会的一切组织工作，他亲自了解一切事情的详情细节，日复一日地、毫不懈怠地建设着历史上第一个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

到巴塞尔代表大会召开的时候，国际已经不是1864—1865年期间那种为数不多而又分散的工人团体的松散联合了。巴塞尔代表大会显示了国际的政治意义的增长。没有马克思和总委员会的五年顽强的组织工作，国际是不可思议的。但是，就是在这种组织工作方面，巴塞尔代表大会也意味着重大的转折点。国际历史上的新的时期要求从组织上巩固国际的队伍，首先是坚决加强总委员会的作用。从这些任务的角度来看，1869年的状况是有待改善的。

由于国际的顺利发展，各地建立了许多新的支部和小组，它们的牵头者往往是些滥用国际名义的可疑分子、资产阶级蛊惑家和投机钻营分子。许多地方分部不仅不服从总委员会的领导和缴纳规定的会费，而且常常连自己的存在也不通知总委员会。1869年3月杜邦在总委员会一次会议上说：“我们在报纸上看到许多加入〔国际〕的声明，但是我们没有收到关于加入的正式通知”。

由于同盟进行秘密活动，总委员会的权利和它同各地方支部的相互关系问题具有特殊的意义。约·菲·贝克尔在这个时期提了一个同国际的组织原则根本矛盾的荒唐的组织方案：把协会变成一个按语言联合的体系，从而帮了巴枯宁的忙。如果把这个方案付诸实现，各支部和分部就会由“按语言组成的中央委员会”来领导，换言之，总委员会的作用将化为乌有，它的地位将由驻地设在日内瓦……的“德语”和“法语”委员会所取

代。马克思和恩格斯刚一收到刊有贝克尔方案^{*}的《先驱者》杂志，他们就立即明白了巴枯宁策划的“这个只有泛斯拉夫主义者才想得出来的极端反动的阴谋”的含义。他们自然对这种阴谋进行了坚决抨击。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爱森纳赫派）在这个问题上支持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日内瓦方案在其他国家也没有找到支持者，因而彻底破产。

离巴塞尔代表大会召开的日子越来越近，马克思就越加坚决地提出协会的集中化和加强它的队伍的纪律问题。总委员会会议记录和马克思恩格斯的通信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没有这种反对小资产阶级分散性、松散性和宗派的局限性的斗争，没有马克思为无产阶级党性进行的这种坚持不懈的斗争，国际就不可能成长和发展。

可惜，从总结报告不能明确地看出巴塞尔代表大会上讨论组织问题的进程，因为为了保密，这些问题是在秘密会议上讨论的。不管怎样，巴枯宁在巴塞尔还未敢在这个问题上摊牌。代表大会通过了若干巩固国际和扩大它的领导机关总委员会权利的决议。决议的第五、第六和第七条授予总委员会可以接收或拒绝接收新的支部、在下届代表大会以前暂时开除支部和解决地方组织之间的冲突的权利，这些条款具有特殊意义。由于这些条款，总委员会获得了以前有争议的全权，这些全权以后在马克思反对“反权威主义的”敌人的斗争中起了很大作用。

在协会后期的历史上那样经常地提到巴塞尔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决不是偶然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的旨在公开反对巴枯宁分子的1871年伦敦代表会议的决议，同巴塞尔的决议是一脉相承的。在国际队伍里进行这场斗争的过程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提供了关于党的基本要点，认为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

* 1869年7月《先驱者》杂志第7期第102—107页，《德语支部中央委员会》决议，署名：贝克尔、列米等。——编者注

部队”①，这些基本要点后来成为列宁和斯大林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学说的基础。

* * *

1869年是国际工人协会整个历史上的转折点。马克思主义在国际中的胜利，特别是粉碎蒲鲁东主义，把协会提高到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巴塞尔代表大会以后，国际内部斗争的中心已经不是所有制问题，已经不是关于社会主义即关于工人运动的目的问题，而是关于无产阶级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问题，更确切些说，是关于把政治斗争作为工人阶级革命行动的方法问题；关于要有一个集中的和有纪律的党作为无产阶级在这个斗争中的领导者的问题；关于把无产阶级专政作为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工具问题。今后这些问题已成为国际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巴塞尔代表大会以后，巴枯宁主义对马克思和总委员会发动了疯狂的进攻战。因此，国际今后的一切发展不能不在反对巴枯宁主义的尖锐斗争中渡过。

可见，巴塞尔代表大会是个重要的分界线，它把马克思在第一国际中为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斗争分为两个阶段。研究巴塞尔代表大会和与它有关的马克思的活动，是正确理解光荣的国际工人协会历史的一个重要条件。而共产国际是这个协会的继承者。

六

巴塞尔代表大会的记录原本没有找到。1869年公布的关于代表大会的报告共有四个版本：日内瓦版、布鲁塞尔版，巴塞尔版和伦敦版。这些版本早已成为珍本，保存下来的只有很少几份。

四个版本之间的差别很大。日内瓦版最短，是代表大会的

① 《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90页。——译者注

代表培列回到日内瓦后做的报告（用法语）。布鲁塞尔版记录的出版有一个过程。还在代表大会开会的时候（9月7日），列斯纳给马克思写信说：“今天早晨就各种问题以及代表大会关于各次会议的报告展开了争论。法国人想承担这个报告的出版任务，可能是为了抬高自己。多数人似乎同意让他们出版。我表示反对，并援引组织条例，建议他们筹集款项，让总委员会出版完备准确的正式报告。刚才决定接受法国人出版报告的建议，但有一个条件：这个报告将不是正式的，并且必须事先把它交给有三个法语秘书即瓦尔兰、罗伯尔和奥布里参加的委员会审查。”^① 报告曾由布里斯美的印刷厂用法语出版。在这个版本中，对巴枯宁分子的发言的报道要比对马克思拥护者的发言的报道详细得多。巴塞尔版是代表大会期间印的公报的汇编；这些公报较详细地介绍了象布鲁因和里廷豪森这些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发言。伦敦版（用英语）是总委员会出版的正式版本。据马克思说，这个版本中公布的报告是总委员会书记埃卡留斯起草的。从马克思1870年7月24日给德·巴普的信可以看出，这个版本的文字是经过马克思审阅并部分修改过的。

由于存在着各种异文版本，最理想的出路是根据各种异文综合出一种最完整的、系统的文本。但是，由于布鲁塞尔版和巴塞尔版有明显的倾向性，这样做未必完全恰当。伦敦版本的文字是经过马克思审阅的，较为可靠，虽然做了一定的压缩。因此，这个集子刊登的代表大会会议记录（包括在代表大会上宣读的总委员会的两个文件）便以伦敦版本为依据，准确进行翻译。

比较复杂的是关于代表大会的决议问题。总委员会没有出版过专门的决议汇编。在伦敦版中，大部分决议是从相应会议的记录中摘引的。本书中关于土地问题和工会问题的决议以伦

① 见本书第136页。——译者注

敦版为依据，关于劳动统计的决议，伦敦版中没有收，则以布鲁塞尔版为依据。最大的困难是无法确定关于组织问题的决定的全文。本书收录的关于组织问题的决定取自伦敦版和布鲁塞尔版；第11条只有日内瓦版中才有，只好以这个版本为准。前面九条的编码依据布鲁塞尔版本。可惜，在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中无疑有一个空白：缺少关于联合会（全国）委员会的权利和义务的条文（或几个条文）。这一条（也许是一系列秘密性质的决定）没有公布，而且在编辑本书时也没有找到”。

代表大会的其余材料（各专门委员会的材料和在代表大会上宣读的文件）是根据布鲁塞尔版和巴塞尔版大会资料以及日内瓦《平等报》公布的。

附录部分收集了同准备代表大会的过程和总委员会在1869年的活动有关的文件。这些文件大部分是阐明马克思作为国际

• 1869年9月11日日内瓦《平等报》清楚地说明，“代表大会明确规定了委员会、地方代表大会和国际代表大会的权利和义务”。马克思在国际伦敦代表会议（1871年）的发言证实了这种说法。9月18日，马克思在代表会议上宣读了总委员会的以下建议：“按照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年）的决定，设有国际经常性组织的各国的中央委员会，今后应定名为联合会委员会，冠以各该国的国名；国际工人协会中央委员会仍用总委员会名称。所有地方分部、支部、小组及其委员会，今后一律定名为国际工人协会分部、支部、小组和委员会，冠以该地地名”。马克思在说明这个建议的理由时指出：“所有分部、支部和小组，今后不得再用宗派名称，如实证论派，互助主义派，集体主义派，共产主义派等等，或者用‘宣传支部’以及诸如此类的名称成立妄想执行与协会共同目标不符的特殊任务的分立主义组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451、452页。——译者注）“在一些国家中，联合会委员会自称为总委员会，这在对伦敦总委员会的态度上产生了误会，因为只有伦敦的总委员会才有权叫这个名字。”（参看《第一国际伦敦代表会议（1871年）记录》1936年俄文版第18页。——译者注。）——编者注

领袖和巴塞尔代表大会的组织者的作用的。这里包括马克思写的总委员会的两个宣言：关于比利时的屠杀的呼吁书和就英美战争的危险告美国工人书；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摘录以及同准备这次代表大会有关的总委员会各次会议的纪录。1869年5月至8月总委员会会议的纪录，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暂时没有掌握；因此本书不得不采用《蜂房报》上发表的关于这些会议的报道^①。1869年9月24日会议记录是根据原件的照相复制品译出第一次发表的。

本书第一次公布的马克思给德·巴普的信和巴塞尔代表大会参加者给马克思的信件具有重要意义。列斯纳在代表大会进行期间写的五封信是列斯纳为马克思作的独特的会议记录。这些信件对会议的进程和列斯纳所了解的代表大会内幕作了生动的描述。拉法格给马克思的信也是第一次发表。拉法格没有出席巴塞尔代表大会，但是出席了1869年9月24日总委员会听取代表大会代表汇报的会议。这段时间马克思外出，拉法格的信介绍了会议的详细情况，是对正式会议记录的补充和说明。

这本汇编没有包括涉及同盟在1868—1869年活动情况的许多重要文件。这些文件同马克思以后在国际中反对巴枯宁派的斗争有密切联系，读者可以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发表的1871年伦敦代表会议记录的附录中找到这些文件^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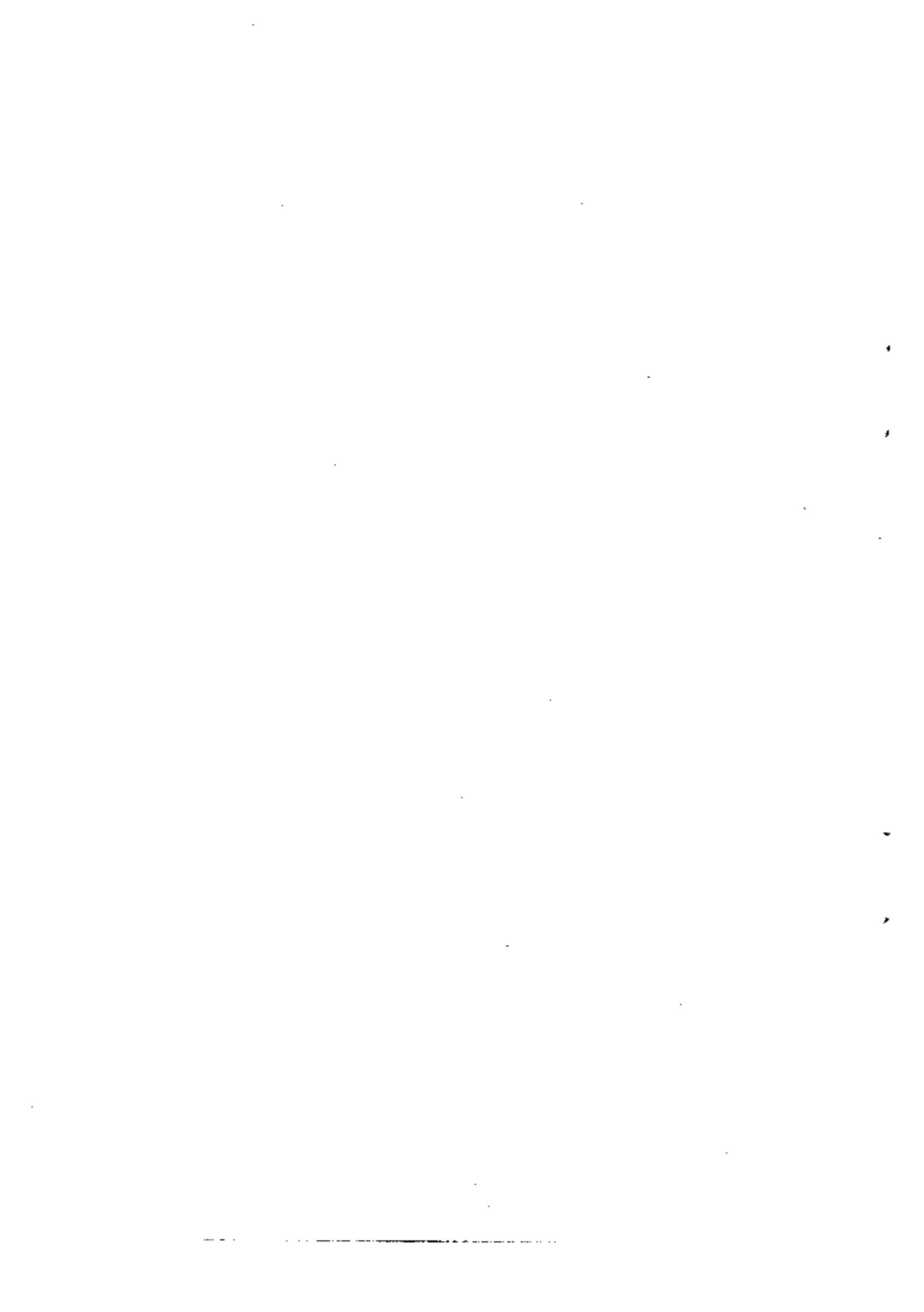
M·佐尔基

1934年7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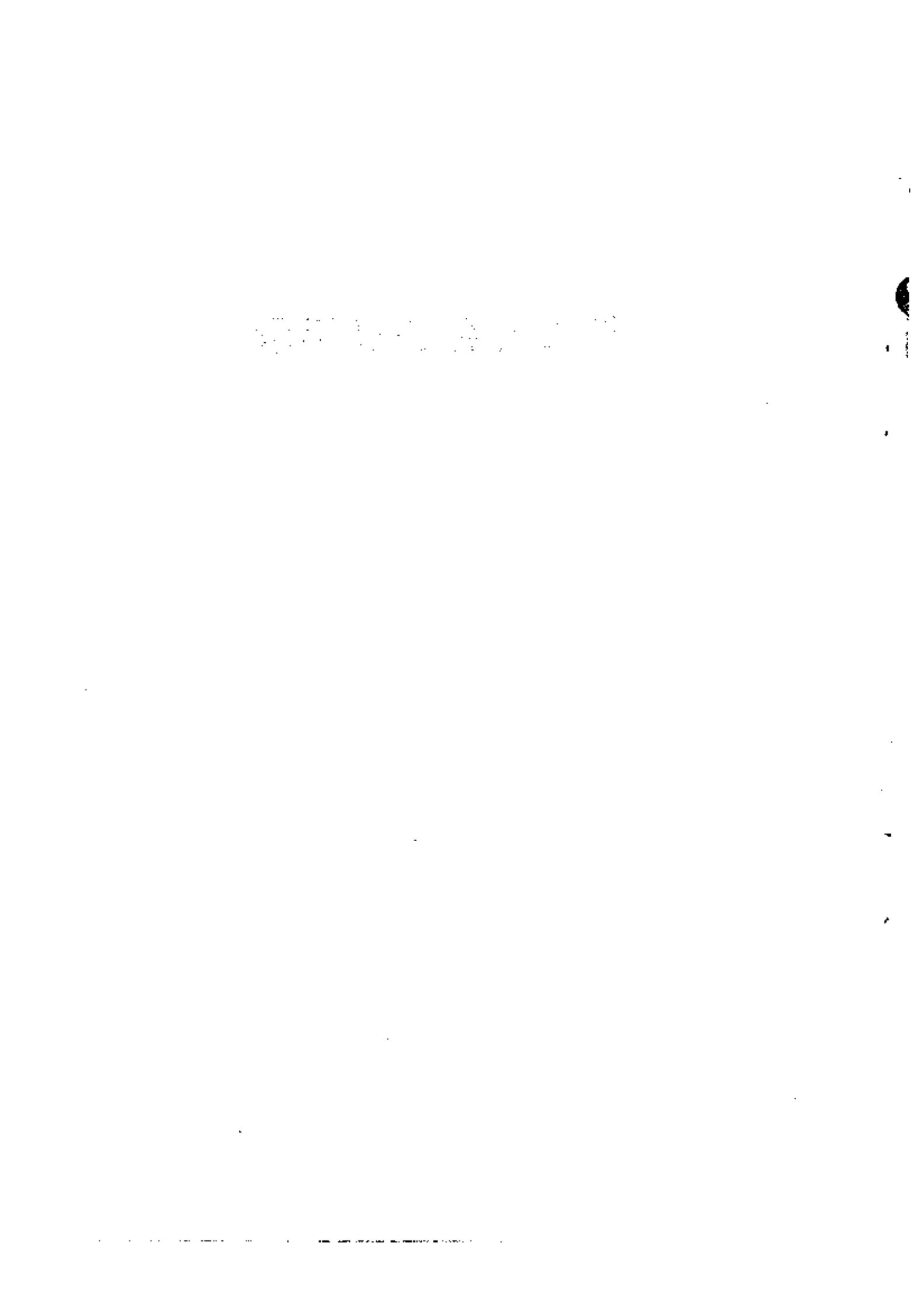
会议记录是由И·巴赫翻译M·佐尔基校订的。索引是H·科夫巴斯做的。

① 苏联马列主义研究院后来掌握了这些记录，发表在1964年出版的《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会议记录（1868—1870）》一书中。《蜂房报》的报道仍有参考价值，本书依然保留。——译者注

② 这些文件收集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中。——译者注



代表大会会议记录



各个国家和不同政治派别的许多新闻记者和报界代表出席了国际工人协会第四年度代表大会。这是协会的意义日益增长的证明。但是，报刊关于代表大会的报道很不完全、很不确切和很不真实。这也许是因为没有充分理解，也可能是出于恶意¹。不过，这一方面是新闻记者及其主子的事情，另一方面是这些刊物的顾主的事情。只要报刊贩卖谎言能带来收入，谎言就会不断制造出来。

会议在“民族餐厅”举行。除了代表大会举行会议的大厅外，还为广大公众另辟了一个大厅，在一个星期中，每天晚上这个大厅都挤得水泄不通。代表们在这个大厅里就没有列入代表大会议程的各种问题发表意见，受到公众的凝神倾听。不止一个资本家来旁听这次代表大会和这些公开会议，以便耳闻目睹工人开会的情况。

星期日〔1869年9月5日〕上午，大多数代表到了以后，举行了预备会议，选举代表资格证审查委员会。下午，代表们在巴塞尔及其郊区各个职工团体的伴随下，打着旗帜，奏着管乐，参加在托马斯花园饭店举行的隆重欢迎大会。在致了欢迎词和握手以后，巴塞尔支部主席布律安先生发表了以下讲话：“劳动者世界的代表们，我代表巴塞尔的男女工人欢迎你们，并向你们说：恭请光临。在目前，还只是劳动大军的先锋队结成了劳动团结的神圣同盟。许多人在听到‘国际’这个词时还在动摇，但我们将是他们所有人的代表。我们是过去的奴隶和农奴的后裔，我们是现在正在进行斗争的千百万人的代表，我们是未来的胜利者的代表。我们协会的历史从今以后将是千百万劳动

者的历史。波里纳日、塞兰、圣太田的暴力行为，奥地利政府对工人的高傲的回答²，——所有这些都是针对我们所有的人而采取的”。然后他详细论证，现代社会的发展始终首先使一小部分人发财致富，使大部分人愈加贫困。最后他声明，只有在工人阶级运用自己的政权来实行社会改革的必要措施的时候，协会的目的才能达到。

安斯（布鲁塞尔）介绍了比利时政府在这个天国圣土里不断迫害国际会员的情况，并且说明，由于揭露了僧侣势力，协会已经发展到农业地区。

埃卡留斯（伦敦）说，他将从布律安结束讲话时提到的问题，即必须运用政权来达到阶级目的的问题谈起。资产阶级掌握政权标志着推翻了封建国家，而工人阶级掌握政权将标志着推翻资本。工人阶级运用自己政权的日子已经为期不远了。在美利坚合众国，争取八小时工作日的宣传鼓动工作已经导致一个不依赖一切旧政党的独立的工人阶级政党的建立³。

在英国不久前进行的争取改革运动期间，自由资产阶级和激进资产阶级的大多数领袖向工人阶级频送秋波，但是长此这样是不可能的。工人需要议会中有自己的代表。发言人不认为，在工人没有自己独立的纲领以前，可以达到这一点。许多人等待激进派的帮助，但是他自己深信，如果不反对激进派采取反对立场，任何一个工人也不可能进入议会。在伯明翰举行的最近一次工联代表大会⁴为这种运动提供了一个起点。代表大会批准了一个工人所做的关于土地国有化的报告，通过了必须把法定的工作日限制为八小时的决议。这就是工人候选人在参加选举运动时所应当提出的要求。一些伦敦报纸问道，究竟谁有能力补偿损失。回答很简单。1846年，不列颠王国有十六个资本家，每人每年的平均纯收入是七万四千三百零二英镑；1866年，一百三十三个资本家每个人的年收入是十万零六百零七英镑。收入从一万英镑到五万五千英镑的中等资本家的数目，在

同一时期从三百一十九人增加到九百五十九人；他们每人的平均收入从一万七千七百英镑增加到一万九千三百英镑。近两年来市场萧条，成千上万的人失业和挨饿。如果说工人状况的改善是以一些人的损失为前提的，那么不难猜想，应受损失的究竟是哪些人。

里沙尔（里昂）说，里昂城的工人很少相信资产阶级领袖，他们更多地相信国际工人协会。七千五百名缫丝女工在协会的帮助下争取到把工作日从十二小时缩短到十小时，这比她们任何时候从争取自由的资产阶级勇士那里所能得到的东西都要多。协会不顾政府的迫害在日益扩大。

阿普耳加思（伦敦）说，他感到高兴的是，各国工人能够会见，亲自交换思想和共诉苦衷的日子终于到来了。过去有一个时候，英国企业主曾威协对自己有不满情绪的工人说，他们要用法国人和德国人来代替他们；既使国际没有带来别的任何利益，那么，无论如何它结束了这种状况。但是它做出的贡献更大。它扩大了英国工联的眼界，向它证明，工会不仅可以用来解决争取工资时所发生的冲突，而且可以用来争取更高的目的，没有国际联合就不可能根除压迫一切人的祸害。我们没有钱给宣传员发薪金，所有的人都由于对事业的热爱而进行工作的；加之，习惯和语言的不同多少阻碍着我们的成功；但是，这些困难将被克服，因为我们中间有几乎掌握着六七种语言的忠诚工人。英国人可以向大陆上的工人学习很多东西，而大陆上的工人也可以向英国人学习很多东西，甚至现在他们就能够互相给予很大支持。发言人说，这次代表大会开得生动活泼，而英国人则不太活泼，不那么热情奔放，他们向来讲求实效，但是他们决不放弃他们已经夺得的阵地。发言人最后希望代表大会将会获得实际结果，并向大会对他的热情欢迎表示感谢。

里廷豪森（科伦）说，只要不是由工人自己制定法律并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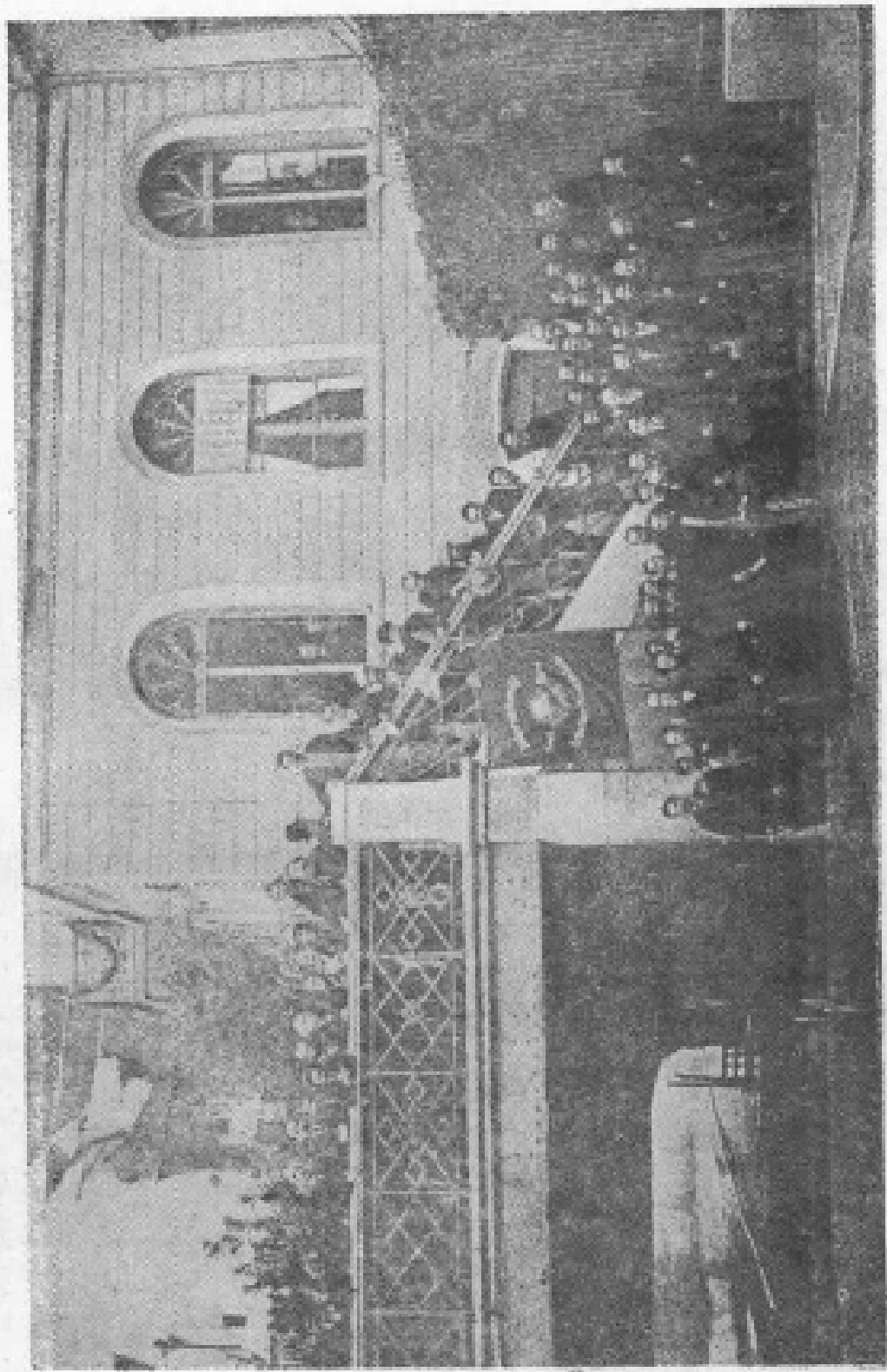
用自己的政治力量作为改造社会的杠杆，工人就不能争得自己的权利。

之后，宣布休会，代表们按照入场时的秩序离开会场。①

① 23—26页原著无标题。——译者注

第一国际 巴塞尔代表大会代表

C根据当时的照片复制





第一 天

9

(1869年9月6日)

〔上 午 会 议〕

星期一早晨布律安简短致词，宣布代表大会开幕，之后，对六十多个代表的代表资格证进行了审查。

在是否允许巴黎的一个叫“实证论无产者”协会的代表参加大会的问题上，产生了一些意见分歧。反对的人认为，这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工人协会，而是一个哲学宗派，而且是没有参加协会的一个哲学宗派。经过一番辩论，这个代表被允许作为一批个人会员的代表出席大会。一致选出了由下列人员组成的代表大会主席团：

主席——海·荣克

副主席——德·布里斯美和卡·布律安

秘书：法语秘书——艾·奥布里、弗·罗伯尔、欧·瓦尔兰

德语秘书——莫·赫斯、威·李卜克内西、施皮尔

英语秘书——约·格·埃卡留斯

西班牙语秘书——加·散蒂尼昂

意大利语秘书——斯·卡普卢索

然后决定下午两点钟继续开会。

下 午 会 议

通过了以下决定：

- 一、在每次会议开始和结束时按代表名册点名；
- 二、代表可以就每个问题发两次言：第一次十分钟，第二

次五分钟；

三、对列入议事日程的问题实行记名投票表决；

四、开会的时间：从上午九点到十二点和从下午两点到六点；

10 五、上午会议是秘密会议，讨论协会的组织问题，下午会议是公开会议，宣读报告和讨论列入议事日程的问题；

六、总委员会提出的问题首先讨论；

七、对列入议事日程的每一个问题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

戈克建议把关于直接立法问题列入议程第六项，并成立一个起草报告的专门委员会。

这个建议引起了热烈讨论。这个问题同不久前在苏黎世州通过的全民公决的法律有关。这个问题的实质在于，立法机关采取的任何一项措施，如果没有得到大多数选民的赞同，就不具有法律效力。多数瑞士德语区代表认为，这是个根本问题；瑞士法语区代表则持另外一种意见；德国代表赞成，法国代表和比利时代表反对，英国代表弃权。有的人认为，这是建立协会时授权每个国家自行酌情处理的那种问题之一。最后大家同意把这个问题列为议程第六项，但不成立关于这个问题的专门委员会。为了成立各个专门委员会，决定呼叫每个代表的名字，被叫到的代表应该说明，他愿意参加哪个委员会的工作。根据报名的结果，各委员会的人数如下：

1. 土地问题委员会——十四人

2. 继承权问题委员会——十人

3. 信贷问题委员会——八人

4. 国民教育问题委员会——十五人

5. 工会问题委员会——十九人

接着决定，所有决议案，在未宣读前应当用三种语言以书面形式提交主席。

会议于六点半休会。

第二 天

11

(1869年9月7日)

上 午 会 议

主席就位。

点名结果，七个代表缺席，其中二人生病。

宣读了昨天上午会议的记录，在做了一些补充后记录被通过。成立了一个起草以后各届代表大会规则的专门委员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建议各分部和支部取消主席和副主席这些职称，因为它们带有君主主义色彩。通过了一些关于保存代表大会文件和公布正式报告的决议。

会议于十二点钟休会。

下 午 会 议

主席就位。

点名结果，六个代表缺席，其中二人生病，但无危险。

12

然后宣读了以下报告：①

25

缪拉说明，第四团并没有象报告中所说的那样被从圣亚田调走②；在里卡马里指挥屠杀的果塞兰大尉获得了勋章。

26

① 下面接着宣读的是马克思起草的《总委员会向国际工人协会第四年度代表大会的报告》。该报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417—432页。——译者注

② 总委员会向巴塞尔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提到，政府不得不把镇压罢工工人的第四团从圣亚田调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426页。——译者注

安斯，比利时中央委员会书记，宣读了一个内容丰富的报告，详细叙述了协会领导人在过去一年中不得不竭力克服的困难；²⁷他证明说，怯懦的政府和下流报刊（不管是世俗的还是教会的）怎样以自己的无耻迫害促进了工人阶级对国际的伟大意义的认识。为了有效地进行宣传，成立了一个由十七人组成的委员会，其专门任务是，在外省召开大会，参加这些大会，促进组织工会及其他工人团体和建立地方中心组织。例如，在沙勒罗瓦区、列日和佛尔维耶建立了联合会。在安特卫普、根特和布鲁日，重要的工会都加入了协会。每个团体独立地管理内部的事务：地方委员会和全国委员会仅仅执行全体大会和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决议。协会共有三家报纸：布鲁塞尔的《国际报》、佛尔维耶的《米拉波报》和安特卫普的《工人报》。

里沙尔宣读马赛的报告，报告说，这个城市中的一些工会不久前加入了协会。法国海员联合会加入协会具有很重要的意义。海员们说：“那些从我们的分裂中获得利益的人的习惯和成见，直到现在还促使我们疏远其他工人。现在是消除使我们分开的那些障碍的时候了；一定要消除这些障碍；我们是工人，我们受的剥削太久了，我们追求一个共同目的：确立正义”。

里沙尔没有提出里昂的书面报告。他声明，里昂工人的革命情绪相当强烈；工人期望政治变动能大大改善自己的状况，但是，环境势力却使人们相信，纯粹政治革命不能改善他们的命运。从最近几次选举以来，共有一万多会员的几个团体已经加入了协会。

李卜克内西说，他事先不知道要做这种报告，所以什么也没有准备，但是他简要介绍了德国工人阶级的现状。已故的斐迪南·拉萨尔曾制定了一个非常狭隘的纲领，并于1863年建立了全德工人联合会。他要求普选权和国家帮助建立合作生产。²⁸俾斯麦庇护了这个运动。在一个有无数农村居民的专制国家

中，普选权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从法国就可以看出来。国家帮助合作生产，这只有在社会主义民主共和国中才有可能。拉萨尔的正直和真诚是不容任何怀疑的，但是他抱着一种幻想来进行活动，似乎他可以利用俾斯麦来为自己的目的服务，但是俾斯麦却利用了他。拉萨尔的突然死去使得运动失去了领袖，组织还没有来得及巩固，领导就落入了冯·施韦泽的手中，他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公开支持俾斯麦的政策。与此同时，很多工人团体仍处于舒尔采-德里奇的影响下。舒尔采-德里奇的政治经济学说，是对英国曼彻斯特学派的混乱的模仿，他认为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对抗，不过是社会主义者杜撰出来的。由于工业的迅速发展愈来愈把这种对抗提到了首要地位，所以舒尔采-德里奇的影响也就消失了。他过去的信徒为新的运动奠定了基础。同施韦泽达成了一个协议：在两个组织完全合并以前，它们将携手前进。但是施韦泽破坏了协议，因此，不久前社会民主党人在爱森纳赫召开代表大会，代表大会接受了国际的纲领，为既保证个人权利又把一切人的力量集中起来而行动的组织奠定了基础。由于法律禁止集体加入国际，所以决定，社会民主党的每个党员同时又应当是国际的个人会员。

发言人反对施韦泽的个人独裁。他表示，不管这种独裁在哪里出现，即使是出于最纯洁的动机和为了最崇高的目的，他都要加以反对。有时候是需要实行独裁的，但不是个人独裁。第一次法国大革命时的独裁是被压迫人民的独裁。这种独裁是可以理解的。

施皮尔，直到现在他一直认为自己是施韦泽的密友，他声明说，施韦泽曾被公开控告在财务问题上手脚不干净，但是施韦泽嘲笑那些恳求他给自己恢复名誉的人。

施维茨格贝耳宣读瑞士库尔特拉里区的报告；报告说，弗兰西奥先生禁止自己工厂的工人正式加入国际的通知书推动了运动。过去一年最主要的成绩是，各种不同职业的工人开始联

合成协会，以便建立各协会联合会，并对社会和政治运动施加影响。为了鼓励合作生产，正在采取措施建立信贷社，它的命运将由不久就要举行的全体大会来最后决定。

帕利克斯作了关于里昂缫丝工人状况的发言。他指出，1848年前，这种有害健康的生产的不幸的牺牲者，为了一先令左右的工资每天工作十六小时。城市和乡村中的熟练工人，一天工作十八到十九小时，一个月只得到十四先令六便士到十七先令六便士的工资。由于1848年罢工和1849年7月第二次罢工的结果，工作日缩短了。现在他们一天工作十小时。工资几乎和从前一样。

巴斯腾宣读了佛尔维耶的报告：如前所述，布鲁塞尔支部有四百个会员；在这个支部之后建立的维兹得拉盆地联合会包括二十一个团体，至少有六千个成员。争取缩短工作日的斗争获得了胜利。

古特代表瑞士裁缝联合会中央委员会报告说，已经开办了几个合作企业，操法语的裁缝打算加入联合会。

戈克声明，他以在瑞士的五十个德国工人团体联合会代表的资格发言。这些团体的成员大部分是年轻的手工业者，他们流浪了几年后回到了家乡去当工匠。他们知道瑞士那种形式的共和国的优点和缺点，因此能够影响本国的运动，那里现在正顺利地进行建立类似机构的宣传鼓动工作。他们花很多力量来促进自己智力的发展：他们有图书馆，举行报告会，有自己的日报。他们知道人空着肚子是不能很好地发展自己的智力的，因此他们举办了自己的食堂和餐厅，这样可以用自己的钱买到更多的东西。英国工人和美国工人之所以精力饱满，是因为他们的生活条件比其他国家好。去年，这些团体在自己的年会上决定集体加入国际，因为在瑞士没有禁止这种联合的法律。

主席〔荣克〕指出，工人代表大会不是赞扬瑞士共和秩序的地方。他自己是瑞士人，根据自己的经验知道，瑞士工人的

生活在许多方面都比其他国家坏。

施维茨格贝耳说，瑞士工人是没有自由的。

里廷豪森声明说，戈克根本不是赞扬瑞士共和国，他只是指出，在瑞士共和国自由比德国多一些。

法尔加宣读了巴塞罗那支部的报告。报告指出，革命⁷以后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团体。为了把它们的活动引向某种有益的目标，在巴塞罗那成立了联合会中央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没有主席，因为这个职位被看做是君主制度的残余。参加联合会的共有三十四个工人团体。报告以下面的话结束：“民主社会共和国万岁！”

会议于六点半休会。

第三天

(1869年9月8日)

上 午 会 议

主席就位。八点一刻点名。九个代表缺席，其中二人生病。宣读和批准了上次会议的记录。然后讨论抵偿代表大会费用的问题。

讨论了关于协会内部组织问题的一些建议，并把这些建议转交给委员会以便起草决议。

重申了在日内瓦代表大会上通过的一项决定，即责成各分部和支部把报刊上出现的所有反对协会的诬蔑性的文章寄给总委员会。

舍马莱说，他寄出了许多[这样的文章]，但是寄到的很少。

为了便于投寄，决定每三个月在协会的机关报上公布一次协会各个管理处〔bureaux〕的地址。

会议于十二点钟休会。

下 午 会 议

主席就位。三点半点名。八个代表缺席，其中二人生病。宣读和批准了上次会议的记录。

大会秘书处通知说，收到了莱比锡和马德里发来的贺电以及以下内容的信件：塔尔塔列从巴黎来信说，由于生病，他未能履行自己的代表职责；巴斯特利卡从马赛来信说，有几个团体加入了协会；巴黎制帽工人对于他们未能派代表出席代表大

会表示惋惜；纽约德国工人联合总会也对同样的情况表示惋惜；休谟从隆格-阿伊连德来信说，美国工人代表大会指定了两个代表出席巴塞尔代表大会；比利时的一个农民合作社建议组织向美国移民；巴黎一个研究社会问题的小组通知加入协会；巴黎一个合作工人小组通知加入协会；巴黎裱糊工人答应支持国际，并于不久后加入国际。

接着继续宣读报告。

培列宣读了日内瓦城建立了联合会的钟表工人的简短报告，并介绍了〔这种生产〕的各个部门的工资情况的详细材料，其中谈到工资最高的是雕版师和表壳装配师，他们每天的收入是五法郎五十生丁，工资最低的是表套工人，每天只拿三法郎五十生丁，这是他们在活儿多的时候的情况，可是停工是经常现象。

德·巴普说明，报刊的诬蔑攻击如何促进了博里纳日事件^①的发展。

布律安对于贬低瑞士工人所享有的政治特权的意义的批评意见表示遗憾。他并不否认，从社会状况来看，他们象各地一样，处境很坏，但是他们掌握有排除灾祸的手段。他们自己委派自己的立法者、自己的法官，如果他们想为了共同的利益联合起来，他们会纠正一切。巴塞尔人是新参加运动的。他们在开始斗争的时候，对于国际掌握的资金抱有一些奇怪的幻想。但是，过去十二个月的经验使他们对自己的状况有了较明确的理解。他们向议会提交了一项工厂法，这项法律的命运不久后即

^① 1869年4月，比利时博里纳日采煤工人实行罢工，政府进行镇压，屠杀工人。马克思在他起草的《总委员会向国际工人协会第四次年度代表大会的报告》和总委员会告工人书《比利时的屠杀》中揭露了比利时反动政府的这种暴行（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417—432页和第395—400页）。——译者注

将决定。发言人代表巴塞尔支部，对于在同盟歇业期间给他们提供帮助的其他国家的国际会员表示感谢。

罗班通知说，法国警察没收了他的委托书、报告和二百份印刷品，虽然他交验了直达车票，而且下一站就会离开法国国境。³³ 外省的一切职工团体在列日联合会委员会的领导下成立了联合委员会。它们在各地每周定期举行会议；各工会组织在顺利向前发展。

卡普卢索通知说，在他们意大利，现在资产阶级政府同各国政府是一丘之貉，所以在社会问题上他们进展得非常迅速。一月份他们在那不勒斯成立了国际支部，这个支部已经有六百个会员，他们还建立了分部；他们派代表参加代表大会，是为了使自己的力量加入到为确立人民的经济统治而建立的世界联合会中来。

缪拉说，他没有准备报告，但是他想提出以下问题：《觉醒报》总的来说对协会的态度是友好的，但是在巴塞罗那罢工的时候，它的通讯员声明说，罢工不是保皇派组织的，就是波拿巴主义者组织的，或者是由国际组织的。国际的巴黎会员对此事进行了调查，以便驳斥这种指责，但是他们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

法尔加说，他知道这次罢工，任何一个国际会员都没有参加这次罢工。巴塞罗那工人既不喜欢君主制度，也不喜欢波拿巴主义，但资本主义报刊到处都一样，它们惯于撒谎，《觉醒报》的通讯员可能重复了他在别的地方读到的东西。

菲·贝克尔声明，他同协会在纽约、旧金山和芝加哥的德国人支部有通讯联系，他在德国各地征集到了二百五十个会员，他们促进了爱森纳赫代表大会的顺利召开。

格罗斯兰以日内瓦市十七个工会联合会的名义报告说，从上次代表大会以来，它们开设了一个合作面包店和两个食品杂货店。由于建筑业的企业主不正确地解释 1868 年的协议，建

第一国际巴塞尔代表大会代表 一



阿普耳加思



卡尔·马克思



列斯纳



鲁克拉夫特



费 克



斯特普尼



贝克尔



卡尔·马克思



卡尔·马克思



筑工人被迫再次实行罢工并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他们创立了自己的报纸《平等报》，而排字工人通过罢工建立了一家合作印刷厂。

34

昆舍以巴塞尔綬带工人协会的名义报告说，在同盟歇业期间，当局想尽一切办法挑拨他们采取暴力行动，但是他们经受住了考验。他们还负有五百法郎的债务，许多人已经离去，因此债务落到了少数人身上，但是他们毅然决定坚守自己的岗位。

弗拉奥宣读了巴黎大理石工人坚持斗争的长篇报告。这个协会还很年轻，因此自然缺乏资金。在罢工期间，警察没收了他们的一切书籍、文件、私人书信及其他东西，但是在报纸发表了其他职工团体的一致抗议书后，警察把书籍和文件退给了他们。经过两个月的罢工，他们争取到废除额外工作和星期日工作，并把每日的工资提高一法郎。

瓦尔兰通知说，逮捕巴黎委员会委员和法院关于解散协会的决定立刻使得在巴黎的宣传大见成效。许多从前袖手旁观的人现在开始积极参加运动，大多数工会团体都在询问如何加入协会。成立了一些经济问题研究小组，会员人数在不断增加。

诺马耶说，由于社会民主主义读物只能偷运入奥地利，所以维也纳工人很长时期不知道协会的存在。他们从艾希霍夫写的国际工人协会史⁶知道了协会的存在后，便立即得出结论：工人问题只有通过国际主义途径才能获得解决。作为组织工人运动的第一个尝试，他们取消了由工厂主掌管的保险储蓄会，建立了由工人自己领导的互助会。当互助会的规章制定好了以后，一个大机器制造企业的经理建议，如果工人同意放弃政治，他就代表企业主先为互助会拿出一万弗罗伦的资金，但是工人拒绝了这种贿赂。现在这些互助会共有四千六百个会员，拥有一万二千八百弗罗伦的基金。所有维也纳工人协会都挂红旗，因此，它们的敌人称它们为《红旗帮》，它们的运动完全以

35

国际主义原则为基础。在目前情况下它们还不能集体加入协会，但是发言人表示，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它们会有足够的力量，可以不顾政府的意愿而宣布自己加入协会。斯拉夫民族的工人仍然处于种族和民族的魔力之下。如果巴枯宁能尽力向它们解释，让他们加入的并不是德国的协会而是工人运动，他就算帮了大忙。

巴枯宁听到这种声明很高兴。他说，奥地利的国际主义工人运动是反对扩大俄国势力的最好保证。他答应将做他力所能及的一切。

弗洛凯通知说，在洛克里经常举行讨论各种问题的会议，工人已同资产阶级的和民族的政策彻底决裂。

阿普耳加恩说，他的报告将同他在这里听到的报告略有不同。在英国，他们可以建立组织和自由集会，不必取得警察局的特别准许。为了使大家了解英国的工联主义运动，他介绍了他担任书记的一个联合会的情况⁹。1860年这个联合会开始活动时有五百个会员，但是没有一点资金。现在它共有九千个会员，不仅在英国各地设有分会，而且在爱尔兰和美国也设有分会，掌握有一万七千英镑的资金。对于联合会会员（失业、生病、遇到不幸事故和丢失了工具等）的补助费总数达到三万英镑。他们同其他工会一起建立了保险基金会，并深信这种制度是有益的。这些基金会没有高薪管理人员，它们的管理费用比大保险公司少得多，并且指出，对工联的调查以敌对的精神开始，以声明工联必须得到法律承认而告终¹⁰。他还介绍了工联在争取改革运动中的作用，说它们善于利用自己的政治权利。现在，它们具有各种优异条件，在出色地进行工作，不管报刊，还是议会都感觉到了它们的力量。现在它们能够起到掣肘的作用，迫使议会实行有利于它们的法律；为了使工人进入议会以便取消有害的法律，建立了工人同盟。

会议于七点钟休会。

第四天

37

(1869年9月9日)

上 午 会 议

主席就位。点名结果，十六个代表缺席，其中二人生病。

批准了以后举行代表大会的一些规则；各地方支部的一切报告仍和以前一样，至少在代表大会前两个月送交总委员会；总委员会应当把它们综合为一个总报告。

决定在星期五和星期六的上午会议上讨论列入议程的问题，在下午会议上讨论组织问题。

会议于十二点三刻休会。

下 午 会 议

主席就位。点名结果，九个代表缺席，其中二人生病。

大会秘书处通知说，收到了维涅尔-诺伊什塔得工人大会和赖辛贝尔格（波希米亚）社会民主党人发来的两封电报，他们表示愿意在社会复兴的伟大事业中实行合作。索恩河畔涅维列城印染工人协会来信声明无条件加入国际；这个城市的“一群不可救药的社会主义者”来信，对由于法庭和警察当局的迫害而不能派代表出席代表大会表示遗憾；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来信向代表大会致兄弟的敬礼并表示良好的祝愿；不伦瑞克社会民主主义联合会和沃劳毕特尔社会民主主义协会的九个成员来信祝愿代表大会获得成功。

然后，土地问题委员会提出自己的报告。委员会认为，因

38 土地私有而产生的极端贫困是人所共知和显而易见的，因此可以立即提出一个问题，“社会是否有权消灭土地私有制并把土地变为公有财产”。委员会的两个委员认为，不把土地变为公有财产，也可以消灭如今同土地私有制相联系的贫困。他们证明说，土地是根据自愿契约成为私有财产的。多数派的代表证明，暴力和欺骗是把土地变成私有财产的主要手段，而且在许多场合，是被剥夺了土地的人民进行了多少世纪的反抗后才得以实现的。在大家同意了社会有权消灭土地私有制以后，委员会讨论了以下问题：“社会消灭土地私有制是否是必要的？”极少数人提出了否定的答案。大多数人坚持这样一种意见：土地私有制剥夺了绝大多数居民对原料的占有权，因而是雇佣奴隶制度的根本原因，只要这个制度还存在，对工人状况的任何持久改善都是不可能的。经过长时间的辩论后，少数人让步。

关于使用和耕种土地的形式问题没有达成任何协议。委员会的提案大体上归结如下：

一、代表大会声明，社会有权废除土地私有制并把土地变为公有财产。

二、代表大会声明，这种改变是必要的。

[委员会的]多数派八个委员坚持这样一种意见：土地将来必须由联合的公社耕种。

[委员会的]少数派五个委员主张：根据情况，把土地或者租给单独的土地所有者，或者租给农业合作社（租给后者比较好），由他们给社会交地租。

39 [委员会的]一个委员主张只要简单地重申布鲁塞尔代表大会的决议^{*}就行了。

* “鉴于生产的需要和已经判明的农艺规则的使用，要求大规模地耕种土地，并产生了采用机器和把农业劳动力组织起来的必要性，并

埃卡留斯通知说，总委员会赞成从实质上重申布鲁塞尔代表大会的决议¹¹，但须采用另一种措词。把这个问题再次列入代表大会议程的原因是，六十四个代表中投票赞成决议的只有三十四个，而处于少数地位的人提出抗议并抱怨说，没有让他们准备。所以委员会认为最好是给他们提供就这个问题再次发表意见的机会。希望那些赞成废除土地私有制的人暂缓发言，而让自己的反对者陈述他们不赞成的理由。

施皮尔说，为了让没有参加过布鲁塞尔代表大会的代表以及公众了解情况，希望先介绍一下支持布鲁塞尔代表大会决议的理由，然后再让那些反对的人进行辩论。

缪拉和舍马莱建议宣读有关这个问题的所有文件。

这个建议以多数票通过。

里沙尔宣读里昂支部的报告，报告指出，土地私有制支配着其他一切经济事实。它是我们的社会制度的起点，因为它发生在劳动分工、机器、竞争、垄断和与现代状况有关的一切东西之前。剥夺土地以利于少数人而损害多数人是一切形式的奴隶制的源泉，只要奴隶制还没有消灭，任何合理的社会形式都是不可能的。这也就是社会和平和公平分配劳动产品的必要条件。

40

德·巴普宣读布鲁塞尔支部的报告。这个报告首先重申了在上次代表大会上的声明，即以前促使建立土地私有制的那些需要和要求，现在又促使废除它。在那些小所有制占优势的地方，对土地的分割必然要导致合作耕种，而合作耕种会创造一种集体所有制；在英国，所有者的数目在不断减少，有朝一

且一般说来，现代经济的发展将导致大规模的农业生产，——

代表大会认为，现代社会经济的发展提出了一个社会要求：把耕地转归社会掌握，并在合理耕种的条件下由国家将耕地租给农业协作社使用。”（这个脚注摘自1868年第一国际布鲁塞尔代表大会决议，是巴塞尔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869年伦敦版编者所加。——编者注）

日，任何一种所有者都不存在了，土地就转归国家所有。

关于个人土地所有者的权力界限问题，报告说：“所有者的权利包括破坏和甚至消灭的权利，所有者根据自己的权利，可以让土地荒芜而不耕种，把森林变为草场，把耕地变为草原，把肥沃的土壤变为沙漠，——任他随意处置，他可以把土地分成很小的小块”。这种状况同现代的要求是根本不相容的，这是应当废除土地私有制的原因之一。然后，报告人转而详细论述地租问题，他证明说，地租或者是不为个人的权力所左右的自然原因造成的，或者是那些被剥夺了享受自己劳动果食的权利的人的劳动结果。最后报告人声明，土地应当变为公有财产，并根据既能保证社会的权利，又能保证农民获得劳动果食的互利契约，把土地交给个人或合作社单纯使用。

41 奥布里宣读鲁昂支部的报告，报告说，只有劳动产品才能成为私有财产，任何一个文明社会，如果其中绝大多数人民受剥夺，它就不能自由地掌握自己的命运；土地应当成为集体财产，但是应把它交给联合的公社经营。

亨格宣读了一个很短的报告，这个报告是日内瓦支部大会一致赞成的，其中建议重申布鲁塞尔代表大会的决议，并提出这样一个意见：一切生产资料应当成为集体财产。在日内瓦的意大利人支部提出了一个同样精神的决议案。

安斯宣读了布鲁塞尔支部特别会议上通过的一系列决议案，谈到了关于在土地私有制消灭以后对土地的经营问题，——这个问题还根本没有得到研究。这些决议案的实质是，自己耕种土地的所有者应当保留终生占有土地的权利；应当给予个人所有主以终生租借权；同双亲一起劳动的儿童，在转交这块地段时，首先获得使用它的权利；合作社应当比个人租借者具有优先权，出租土地的权利等事项应当归公社委员会掌握；土地应当由特设的法庭定期地重新估价。

舍马莱第一个发言辩论。他说，给他十分钟发言时间使他

不能把问题讲深讲透，甚至来不及看完对他的报告提出的批评意见。人们想使每一个人都成为自己的劳动资料的所有者，这同土地公有制未必是相符合的，因为土地也是劳动资料。有人说，私有制使所有者有可能占有别人的劳动产品。可是究竟什么时候试行过集体制原则呢？没有试验过——它从来没有实行过，而且也不能实行。工人是劳动资料所有主的奴隶。如果农民依属于集体，那么他做奴隶的程度是否就会小一些呢？有人想让每一个有可能以自己的劳动创造价值的人都掌握原料。难道能够把农民从这一类人中排除掉吗？发言人建议用互相保障和信用贷款的办法来达到这一点。如果土地私有制将被废除，——那时候任何信贷机构都根本不需要了，——那么这从逻辑上必然导致共产主义。

斯特普尼说，他不想否定布鲁塞尔代表大会的决议，他认为这些决议是一个整体。集体的智慧始终高于个人的智慧——单个人的利益应当服从社会的利益。发言人证明说，个人主义在许多方面是由于习惯势力而被保持下来的。红种印第安人厌恶单独劳动。他在威斯康星州看到过一个传教士组织的企业，其中有一千个奥涅伊德部族的人劳动。在那里，有多少家庭，就把土地分成多少小块交给他们耕种；但是谁也没有去单独耕种自己那块土地。他们始终一起劳动，按次序来耕种那些地段。他们也不大急于去接受牧师们向他们宣传的宗教，在八年中只有五个人信了基督教。

戈克说，同世世代代遗留下来的概念和成见进行斗争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进行这种斗争的是一些勇敢的人，他们是值得尊敬的。一方面，过分多的财富，另一方面，是贫穷和不幸，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明显的对立的现象呢？土地是自然界给人类的礼物，任何人都无权掌握超过他的耕种能力的地段。在古时候，人很稀少，土地够所有的人耕种，就象现在美洲的情况一样。没有劳动土地就一文不值。人如果不用自己的手去

耕种，他即使占有十万英亩土地，仍然会饿死。人类在暴力和宗教的压迫下备受奴役和被迫为那些穷奢极欲的老爷们耕种土地，而劳动者却在贫困之中生活和死亡。随着时间的推移，奴隶制度被废除了，而代之以农奴制度。农奴根据苛刻的条件来耕种土地，即他们要把一半劳动产品交给地主。农奴制度又被雇佣劳动所代替。四年前，在美国也废除了奴隶制度，但是雇佣劳动毕竟是奴隶制的一个变种，因为大多数耕种土地的人不是为自己耕种，而是为别人耕种。只要雇佣劳动还存在，劳动者就逃不脱遭受贫困的命运。土地私有制和雇佣劳动应当废除。劳动产品应当属于它的生产者。

鲁克拉夫特说，他主张土地应当成为国家的财产，并且由国家来耕种以造福整个社会，——但不是在执掌国家政权的享有特权的少数人的领导下进行，以损害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而是在负有关心全社会福利的使命的政府领导下来进行。那样多的人生活贫困，是由于土地归少数人所有而造成的。发言人不赞成有多少农民就把土地分成多少块地段。他主张大规模地耕种土地，并尽可能使用能够节省劳动的机器，以便使科学能为大家的福利服务。舍马莱举出非常可笑的理由来反对这一点，说什么从前没有试验过。如果由他来领导运动，那么永远也不能取得任何改善。发言人说，他来时经过法国，看到整英里整英里的肥沃土地被分割成细长的小条，这意味着既浪费劳动，又减少劳动产品。在一个地方，他见到一个姑娘在看着一条瘦骨嶙峋的牛，不让它踩踏自己主人的土地。只要改变制度就可以把现在所花的劳动节约一半，为什么人们还要容忍这种现象呢？如果国家是由人民管理的，人民就可以关心任命一些管理人员来监督国家的事务，但不是像现在那样，部长之所以能当部长，仅仅是因为他属于一定的家族，或者因为他能说会道，并且仅仅是为了能得到优厚的薪俸。人民会成立一个食品生产部，任命一个有实际经验的农学家来做部长，并对议会负

责。内行人会知道任命什么人来主管各个部门，而且这一点也完全适用于农民本人。到现在为止，国家只是利用自己的有组织的力量来消灭人的生命。现在是应该采取某种措施来保护生命，使人们生活得较幸福的时候了。

44

会议于六点钟休会。

晚 上 会 议

副主席布里斯美主持会议。八点钟点名。十二个代表缺席。

晚上会议主要是讨论和批准以下决议案：

1.“总委员会有权接受或不接受新的支部或小组，但它们有权在下届代表大会上对这个决定提出申诉。在设有联合会委员会的地方，总委员会在通过这类决定之前须听取它们的意见；但总委员会仍然有权做出临时的决定”。

2.“总委员会也有权暂时开除支部，直到下届代表大会为止。全国性组织也有权从本联合会开除个别团体，但被开除的团体仍旧是国际的支部。全国性组织可以建议总委员会把这些团体暂时开除出国际”。

3.“总委员会有权解决一个全国性组织所属的各个团体之间或各个全国性组织之间的冲突；双方均有权在下届代表大会上对这种解决办法提出申诉，由代表大会做出最终决定”。

会议于十点钟休会。

第五天

(1869年9月10日)

上午会议

主席就位。九点半点名，九位代表缺席，其中二人生病。
宣读和批准了上次会议的记录。

托伦发言，继续进行关于土地问题的辩论。他说，要在十分钟内来回答反对者的论据是绝对不可能的。他声明说，代表大会无权在没有农民代表出席的情况下通过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社会是个抽象的东西，个人是它的现实的活的部分。一些比别人具有更多智慧的人，绝不会容忍把他们和其余的人等量齐观，而取消土地私有制的结果就会发生这种情况。所有制问题是个科学问题，它不可能由某个代表大会来解决；所有权是建立在相互协议的基础上的，而科学是否定公有制的。

里沙尔驳斥托伦和舍马莱的观点。他说，个人主义者和集体主义者辩论的是从未经过试验的制度。如果说没有如何实行集体所有制的经验，那么却有如何实行私有制的丰富经验。他还希望每一个工人都有自己的劳动工具，但是土地和过去许多代人创造出来的财富，是全社会的劳动资料。他希望每一个人能够支配自己的劳动产品，但是个人的权利应当服从社会的权利。个人主义者对于个人权利和社会权利的看法是不合逻辑的，他们想用信贷制度来纠正对财富的不平等分配，但是集体主义者并不想把社会划分为债权人和借贷者，——这会是对自由本身的否定。如果社会权利将由劳动资料公有制来保证，并把这种权利变为相互的经济契约的基础，那么自由和竞赛将会永远存

在。

朗格鲁瓦一开始就宣读了一整篇论文，从中可以看出，他认为集体无权侵害作为集体成员的个人的自然权利；自然权利是天赋的，对一切都是平等的；手工业者或农民都作为一个生产者和自己劳动产品的全权主人，为了能够交换产品，是需要信贷和土地的；有些生产部门需要几个人联合起来干，但这种情况实际上根本不会改变个人财产；代表大会应当声明，为了解放农民，必须把一切雇佣契约变为简单的买卖契约。经常处在运动中的财产将不再为违法乱纪提供基础，而工人只要有需要就可以联合起来。他补充说，如果通过一项同布鲁塞尔决议相似的决议，就会象1848年那样把农民推到反动党派的怀抱。他反对能够导致共产主义的任何东西；共产主义是一种权威主义的组织形式。“国家所有制”这个词的意思就是把国家变成土地产品的主人；逻辑上这将导致共产主义——导致个人自由的灭亡。在上面将是长官和军官，在下面将是士兵。所有者的特权可以用征收地租累进税的办法来消灭，但是发言人反对政权对买主和卖主之间的关系进行任何干涉，他主张买卖自由。

布律安说，土地并不是由人创造的，但是土地法却是由人创造的。在每个历史时代，作为社会总和权力的国家根据社会的需要创造了法律。在野蛮状态中人可以自由地由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随着时间的推移，确定了一定的界线，在这个界线内各个不同的部族开始耕种土地，其办法是或者共同耕种，或者暂时把土地分成地段。由于战争和掠夺，一些人逐渐地被剥夺了土地，变成了奴隶。在古罗马，少数人逐渐把土地攫为私有；封建国家根据教阶制度在地主之间，在自由民和农奴之间重新分配了土地；现代国家粉碎了把地主和农奴联系在一起的枷锁，把土地变成了可以买卖的商品。大规模农业比小农业的生产效率高，大规模农业使小农业遭到的命运，就象工厂工业对待小手工业者、小店主和小商人一样。结果，耕种土地愈来

愈集中在为数不多的人手中；由此便产生了改造的必要性。人民的福利是最高的法律，既然土地私有制同居民的要求是不符合的，它就应当被废除。但是，这只有在考虑到人民的自由意志并且使现在的所有主得到补偿时才是可能的。

巴枯宁说，不能根据没有农民〔代表〕这一点就否认代表大会有权通过关于所有制问题的决议。出席代表大会仅仅是少数人，但是在一切历史时代，人民的利益整个说来常常是由某些少数人代表的。在1789年，资产阶级少数人代表了法国和全世界的利益；它创立了资产阶级国家。为了无产阶级的利益，巴贝夫反抗资本的统治；制宪会议的成员仅仅是他的继承人，但是他们的微不足道的少数很快就会变为多数，因为他们代表欧洲全体劳动人民。与前面的说法相反，集体是个人的基础。社会创造了个人，孤立的人甚至不能学会说话和思想。天才人物——伽利略、牛顿等——如果没有前辈的成绩，就不可能有任何发明和发现。比伏尔泰更聪明的人是有的，这就是全人类。伟大的天才如果从五岁起就生活在沙漠中，那他什么也不会创造。私有制过去和现在都无非是个别人占有集体的劳动。发言人主张土地和一切社会财富的集体所有制，他把这叫做社会清算。他所谓的社会清算，指的是废除那种批准和保证少数人占有多数人的劳动成果的政治的和法律的国家。任何一种生产劳动主要都是社会劳动，只有把前辈的劳动和当代人的劳动结合起来，生产才是可能的；我们错误地叫作个体劳动的东西是根本不存在的。他拥护多数人的建议，并坚决主张公社的联合是以自下而上地^{*}组织社会为前提的，而少数人的建议却仍然谈的是国家。他要求消灭一切民族的和领土的国家，并在它们的废墟上建立千百万劳动者的国际性的国家，国际的任务就是建

48 * 1869年伦敦版中是“自上而下”，这显然是印错了。——编者注

立这样的国家。

主席（荣克）用三种语言通知说，美国全国劳工同盟的一个代表来了。这时从芝加哥来的凯麦隆先生走进大厅；他受到最热烈的欢迎；他走到主席跟前，以新大陆劳动人民的八十万儿女的名义向主席——旧大陆男女工人的代表致敬。争取劳动解放的这两个战士紧紧地握手，互相端详着，好象要证实这一切绝非梦幻，会场一再发出欢呼声。

在欢呼的风暴过去后，恢复了辩论。

缪拉对公平的描绘同里沙尔完全不同。在里沙尔看来，公平无非是由社会产生的一种分配，它起着某种理想的神灵的作用，而发言人则把公平理解为由人们的相互关系中产生的某种东西。他对巴枯宁的未来国家提不出什么意见，但是，举例来说，如果人是从猿变来的，那么显而易见，从来也没有就这种转变向某个集体征询过意见。人依靠科学创造了社会，社会反过来也影响人。

列斯纳说，他认为问题已由布鲁塞尔代表大会的决议解决了，但是他想谈几点关于共产主义的意见。他不知道，舍马莱及其他对这个字怎么理解。发言人自己对共产主义是这样理解的：诞生的每一个孩子都有权获得良好的教育，每一个有劳动能力的人都有权获得劳动资料，以便他能过人应当过的生活。个人主义只有在不危害全社会的情况下，才可以卖弄自己。有的人由于害怕得罪农民而不想通过决议。如果农民没有认识到自己的状况，就应当开导他们，向他们说明，改造将是符合他们的利益的，那时他们就不会反对了。在英国，大农业排挤了小所有者。一百年前共有二十五万个土地所有者，现在已经减少到三万个，天晓得其他国家的农民是否也会遭到同样的命运。大农业比小农业有利得多，但是现在大农业带来的一切好处都落入少数人的口袋。他同意，不能采取反对大多数人民的意志的任何措施，但是代表大会有责任讨论这些问题。

题，通过关于这些问题的决议，并让人民了解这些决议，以便取得他们的同意。科学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它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是有利于土地公有制的。

贝克尔认为这里产生了误会。按规定，任何人的发言都不应超过十分钟。但是这似乎被理解为每个人必需讲完十分钟。这样讨论问题是无益的，对主要问题没有任何重大的反对意见。只需要重申布鲁塞尔代表大会的决议。代表大会没有义务为未来确定条条框框。事变的进程和环境的力量将表明如何实现原则。

塔尔塔列认为，社会有权消灭土地私有制。但是，公有制的原则如果将被通过，就必须寻找实现这种改造的方法。在反对土地私有制和拥护土地私有制的人之间正在进行着斗争，前一种人把土地私有制看作掠夺的结果而加以攻击，后一种人则

50 把土地私有制看作是智慧和劳动的成果而加以保护。但是，在土地所有者和没有土地的人之间进行着更为激烈的斗争。这种不断的和殊死的战争是争取政治权利的很大障碍。代表大会的目的就是要结束这种充满了不公平和贫困的状况。如果采用巴枯宁的建议，这是很容易做到的：诉诸人民并通过普遍投票来解决，因为占有土地是一切人的自然权利。但是，尽管广大群众备受压迫，但人民在心中仍然非常尊重私有制，因此这条道路是很危险的。发言人象朗格鲁瓦一样认为，这会导致六月战斗的重演。人民需要有进行改造的思想准备。在新国家中，依靠一批忠实的、没有受到私有制原则腐蚀的人，很容易实现这种改造。但是在旧国家中——不管是帝国还是共和国，反正一样——财产的特权被法律神圣化而损害群众的利益，现在就立即实行这种改造是不理智的；这是一个国际性的问题。发言人认为，现在只能做一件事：把一定数目的地租变为为集体利益而赎买土地的基金。如果把土地变为公有财产的原则将获得通过，那么未来的各次代表大会就应当把制定实现这个原则的实际计划

第一国际巴塞尔代表大会代表 二



德·巴普



布里斯美



安 斯



培 列



施维茨格贝耳



格罗斯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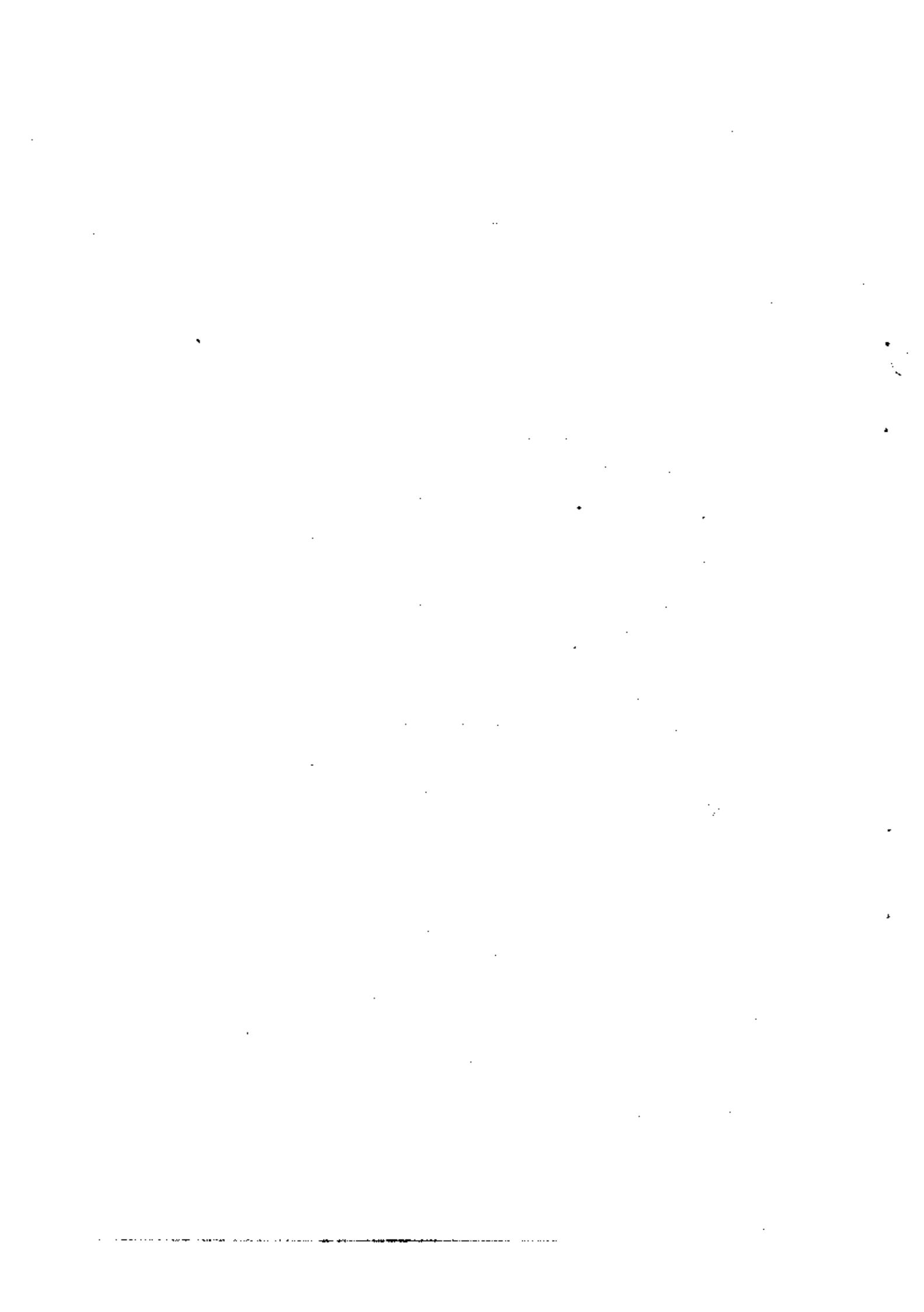
里廷豪森



戈 克



诺马耶



作为自己的经常任务。

安斯说，去年他和个人主义者一起投票，今年他已变成了集体主义者。当布鲁塞尔支部讨论所有制问题时，他们向自己提出一个问题：如果个人离开社会保障就不能存在，那么是否可以制定一种既可以保证个人权利又可以保证社会权利的制度？重新划分土地只会导致目前状况的重演，因为同样的劳动在不同的地区提供不同的成果，所以在农民之间会出现更大的不平等。根据土壤的肥沃程度按比例收地租会使所有农民的条件相等。在目前状况下，天然的较肥沃土壤的额外生产力被少数人利用去增加自己的利益。个人主义者和集体主义者都认为，谁也没有占有他自己没有生产的产品的合法权利；这使发言人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为了社会的利益按土壤的肥沃程度收地租，既可以保证个人的权利，又可以保证社会的权利。因此，他主张废除土地私有制。如果这从逻辑上导致共产主义，那就是说共产主义应当成为未来社会的形式，而这将是人类的幸福。长期以来，发言人对于能够实现这种改造的手段曾持怀疑态度。但是，对法国革命史的仔细研究，使他明了社会改造可以用什么方法来实现。

会议于十二点钟休会。

下 午 会 议

主席就位；两点钟点名，六个代表缺席，其中二人生病。

秘书通知，记录还没有整理好。决定在下一次上午会议上宣读记录。

埃卡留斯发言，继续辩论土地问题。他对过去一年中有了新的皈依者表示高兴。托伦的反对意见是他所听到的反对意见中最荒唐的。逻辑结论应是停止任何鼓动工。作如果因为没有农民——土地所有者出席就不能通过关于土地的决议，那么没有

主教和红衣主教出席也就不能通过关于教会的决议，没有银行经理出席也就不能通过关于信贷的决议等等。巴枯宁在他同法国人的谈话中显然染上了他们对国家的恐惧病。看来，法国工人一想到国家，长筒马靴和拿破仑帽的怪影就会出现在他们面前。如果站在国家一边，就不能改造国家，而社会改造只有靠工人阶级在国家中掌握的权力才能实现。一切巨大的社会改造都是从改变土地占有形式开始的。封建制度代替了自由地产^①制度，现代私有制又代替了封建制度，而现行制度所导致的社会改革将从废除土地私有制开始。至于补偿，这将视情况而定。如果这种废除能和平实现，现在的所有者将得到补偿。在伯明翰¹²曾做过一个报告，其中指出，每一英亩土地得到多达四十英镑的补偿。如果美国的奴隶主拥护林肯当选，他们会因失去奴隶而得到补偿的。他们的反抗导致了对奴隶制实行没有补偿的废除。最后，他举出了一些事实来规劝保护小块土地的人；这些材料是从官方报告中摘引来的：

	联合王国	法国
可耕土地（单位英亩）	45 491 097	82 661 408
谷物用地	11 431 940	40 273 378
饲料作物用地	4 951 796	6 221 243
养大牲畜用地	8 731 473	14 197 360
养羊用地	33 817 951	33 281 592
小麦（每英亩）	32普式尔	15普式尔

由此可见，在英国经营制度下，一千九百万英亩土地生产的小麦同法国制度下四千万英亩土地生产的小麦相等。同英国土地耕作制度相比，法兰西民族白白耕种了两千一百万英亩土地，这些土地本来是可以用作牧场的。两个国家的经验证明，

① 自由地产（Freehold）是小地产的一种，这个名称起源于中世纪的英国。自由地产的所有者向贵族缴纳少量固定的货币地租，有权自由支配自己的土地。——译者注

产品的数量取决于耕种的方法和肥料。

莫兰说，他主张一只脚踩在共产主义者阵营中，而另一只脚踩在个人主义者阵营中。他希望代表大会否定任何形式的政府的干涉。政府的全部任务就是保护个人自由。他建议西方无产者研究实证论，因为它囊括了一切社会问题。

弗留诺说，工人阶级受外交界的伯爵们和政治经济学的侯爵们摆布的时间太久了，现在是工人阶级自己掌握自己的事情的时候了。因为土地是自然界的礼物，所以它理应仅仅通过自由契约关系成为私有财产。然而它却由于暴力而成为私有财产。那么是否可以用共产主义来纠正这一点呢？共产主义会吓倒农民。至于革命，那么发言人是反对它的——这并不是因为他害怕街垒，而是因为革命总是仅仅使野心家飞黄腾达，而那些进行了斗争的人则被流放到卡因纳去。他认为，交十四年地租的租佃者应当成为自由的所有者。

罗谬说，并不是共产主义的幽灵在1848年激怒了农民，而是为证券交易所投机者的利益而征收的臭名昭著的四十五生丁税，征收这四十五生丁税是为了防止可恶的怪物——破产。1850年，为了防止农民和社会主义者一起投票，选举权受到了阉割。现在，小所有者虽然也希望保存自己的一小块土地，但他们拥护剥夺大所有者，而雇农则拥护公有制。

格雷利希要求停止辩论。托伦和布里斯莫反对，李卜克内西赞成。这个建议以大多数对两票获得通过。

投票赞成“社会有权废除土地私有制并把土地变为公有财产”的有五十四人。舍马莱、弗留诺、潘迪和托伦投票反对。奥布里、博尼、克列佐、多布尔、杜朗、格罗斯兰、兰德林、朗格鲁瓦、莫兰、缪拉、鲁塞尔、培列和比顿弃权。

投票赞成“废除土地私有制并把土地变为公有财产是必要的”的有五十三人。博尼、舍马莱、弗留诺、瓦格鲁瓦、缪拉、比顿、潘迪和托伦投票反对；奥布里、克利佐、多布尔、杜朗、

弗拉奥、格罗斯兰、兰德林、莫兰、鲁塞尔和培列弃权。

卡普卢索建议，每一个支部在下一次代表大会以前制定一个为了解决公有制问题而必须实行的实际措施的方案。

这个建议经举手表决通过。

然后决定，推迟讨论委员会提出的其他建议。

关于继承权问题

决定只宣读总委员会的报告和继承权问题委员会的报告。

总委员会的报告¹³

1. 继承权之所以具有社会意义，只是由于它给继承人以死者生前所有的权利，即借助自己的财产以攫取他人劳动成果的权利。例如，土地使所有者在生前有权以地租形式毫无抵偿地攫取他人劳动的果实。资本使所有者有权以利润和利息的形式获得同样的果实。国家有价证券所有权使所有者能够不劳而获地专靠他人的劳动果实过活等等。

继承并不产生这种把一个人的劳动果实转移到别人口袋里的权利——它只涉及到具有这种权利的人的更换问题。同所有一般的民法一样，继承法并不是一种原因，而是一种结果，是从现存社会经济组织中得出的法律结论，这种经济组织是以生产资料即土地、原料、机器等的私有制为基础的。这正如继承奴隶的权利并不是奴隶制度的原因，恰恰相反，奴隶制度才是继承奴隶的原因。

2. 我们应当同原因而不是同结果作斗争，同经济基础而不是同它的法律的上层建筑作斗争。假定生产资料从私有财产转变为公有财产，那时继承权（既然它具有某种社会意义）就会自行消亡，因为一个人死后留下的只能是他生前所有的东西。

55 因此我们的伟大目标应当是消灭那些使某些人生前具有攫取许多人的劳动果实的经济权力的制度。在社会处于相当的发展水

平而工人阶级又拥有足够能力来废除这种制度的地方，工人阶级就应当用直接的手段来达到这一点。例如，废除国债，自然就同时避免国家有价证券的继承。另一方面，如果工人阶级没有足够的权力来废除国债，那么，要想废除对国家有价证券的继承权，就是愚蠢。

继承权的消亡将是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改造的自然结果，但是废除继承权决不可能成为这种社会改造的起点。

3. 大约四十年前圣西门的信徒们所犯的错误之一，就在于他们不把继承权看做法律后果，而把它看做现今社会组织的经济原因。这丝毫没有妨碍他们在自己的社会制度中把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永世保存下来。我们认为，可以有挑选出来的终身所有者，就好像曾经有过挑选出来的国王一样。

承认废除继承权是社会革命的起点，只能意味着引诱工人阶级离开那实行攻击现代社会真正应持的阵地。这同既要废除买主和卖主之间的契约法，同时又要保存目前的商品交换制度一样是荒谬的。

这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反动的。

4. 我们在考察继承法时，必然要假定生产资料的私有制继续存在。如果私有财产在人们生前已经不存在，那么它就不会被人转让，同时也不会在人死后从死者那里传给别人。因此，有关继承权的一切措施，只能适用于社会的过渡状态，那时，一方面，社会目前的经济基础尚未得到改造，另一方面，工人群众已经积蓄了足够的力量来强迫采取旨在最终实现社会的彻底改造的过渡性措施。

56

从这方面来考虑继承法的修改，只是所有导致同一目的的其他许多过渡性措施中的一种。

在继承方面这样的过渡性措施只可能是：

(1) 更广泛地征收在许多国家中业已存在的遗产税，把这样得来的资金用于社会解放的目的；

(2) 限制遗嘱继承权，这种继承权不同于没有遗嘱的继承权或家属继承权，它甚至是私有制原则本身的姿意的和迷信的夸张。

继承权问题委员会报告

鉴于：同私有制不可分割的继承权促进土地和其他社会财富转入少数人手中而危害多数人的利益；因此，继承权是土地和其他社会财富向公有制过渡的障碍；不管怎样限制继承权，它总是一种特权，而特权的大小并不能消灭它的不公平，而这种不公平是对社会权利的经常威胁；此外，一切形式的继承权是一切社会和政治不平等的重大因素，因为它阻碍个人平等地利用精神和物质发展的资料；

最后，鉴于代表大会已经声明它赞成土地公有制，而对这个声明如果不作进一步的论证，它就是不合逻辑的，——

代表大会声明，必须彻底废除继承权，因为废除继承权是解放劳动的一个必要条件。

一致决定不宣读任何报告。

舍马莱发言，开始辩论。他说，通过一个在半年之后就无用的决议是无益的。继承权同私有财产权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它只能同私有财产权一起消亡。如果劳动资料成为集体财产，那末私人就不能继承任何东西。如果只有土地成为集体财产，那么同农民-生产者相比，产业工人将处于特权地位，因为他将是自己劳动工具的私有者，就是说他将成为自由的生产者，而农民将成为雇佣工人。巴枯宁在上午会议上指出，法律始终是由聪明的少数人制定的，发言人会这样回答：正因为聪明的少数人始终制定法律，所以他和他的朋友们在这里反对多数人的决定；他们将象过去一样继续反对这些决定。废除继承权的借口是，还没有实现把个人所有制改造为集体所有制；难道投票反对继承权将比投票反对私有制具有更大的力量吗？

德·巴普说，在事件的整个进程将要产生的社会制度中，土地、机器和其他生产工具将成为合作生产者的财产，在那里每个人将依靠自己劳动的成果生活，而不象现在那样依靠别人的劳动生活；在这种社会制度下，将不可能有私人积聚财富的情况，因为除了不能用来攫取他人劳动果实的个人用品，如家庭用具、衣服及其他细软，将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继承；所以继承权将完全丧失它的社会意义。祸害的根源在于人们划分为资本家和雇佣劳动者。怎样消灭这种划分，——这就是需要解决的任务。继承权仅仅是这种状况的结果，废除继承权并不能消灭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差别，所以是无益的。

继承权的反对者把希望寄托在资本家和工人阶级可能达成的协议上，就是说，资本家将终生保持依靠穷人劳动积累起来的财富，在他们死后这些财富将转归公有。这样，废除继承权就会成为实现社会清算的手段。但是，这起码是以资本家阶级的让步为前提的。可是，直到现在，不管在什么地方，不管工人提出什么要求，都遭到了拒绝，而有的地方则用火药和铅弹来回答他们。资产阶级是绝不会让步的。它宁愿宣布战争，而它得到的回答也将是战争。不需要预言家就可以预见到，除了工人已经具有充分政治力量的一些国家外，为了影响立法，无产阶级不得不仿效资产阶级而采用暴力。在法国大革命时期，资产阶级就用没收教会和贵族地产的办法消灭了封建国家。

里沙尔说，总委员会和德·巴普在自己的报告中把工人掌握自己劳动果实的权利和构成从来什么也不生产的人的特权的权利混淆起来了。社会应当掌握人的精神和物质发展的资料，而不是个人的随心所欲。如果继承特权的拥护者认为这种资料是不重要的，那么就有更多的理由拒绝它们。如果他们是平等的朋友，那么他们就应当尊重一切平等的起点：走上生活道路的平等的条件。

59 瓦尔兰说，如果一切劳动资料变为公有财产，继承权显然就会失去意义。但是，在大部分生产资料甚至在原则上还不能被认为是公有财产的情况下，如果保存继承权，子女永远也不会在平等的条件下开始自己的生活；一些人将被剥夺精神和物质发展的任何资料。人们说，无息信贷将使他们获得劳动资料，但是他们必须偿还贷款，因此他们将会落到比别人更为不利的地位。发言人从来还没有听到关于子女有权获得自己父母财产的郑重的论据。如果父母为了自己的子女的利益而掌握财产是正确的，那么为了兄弟姊妹的利益这样做也是正确的。权利的让渡应当是没有限制的。发言人不认为这样做是正确的。他既不承认遗嘱权，也不承认别的继承权。

缪拉说，继承权问题委员会的结论是已经通过的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的合乎逻辑的产物。瓦尔兰否认子女获得父母财产的权利。他大概忘记了，在农村中子女到处是同父母一起劳动的，有时直到二十岁以前都是这样，所以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共同占有财产的权利。如果承认人们掌握自己劳动成果是正确的，那么同父母一起劳动的孩子就有获得父母遗留下的财产的权利。至于里沙尔，那么发言人不能理解他的意思。因为，如果农民可以成为自己劳动产品的所有者，并且用不完他所生产的全部东西，他为了回避继承法，可以把这些多余的东西送给人或者在临死前卖掉。这会促使欺骗和不道德行为盛行。如果每个人象发言者所建议的，成为自己劳动工具的所有者，那么一切困难都会消失，而继承法也可以在丝毫不损害平等的情况下保存下来，这样做会提高社会的道德水平。

60 巴枯宁说，在公有制的拥护者中间是有分歧的。他们中的一方不愿意探讨继承权，而注重研究土地及其他劳动资料已经成为集体财产的时候将是什么状况。可是发言人却从它目前现存的情况、在它正盛行的时候来观察它。总委员会在它的报告中证明，继承权仅仅是现存制度的结果。在这个制度被消灭以

后，继承权就会消亡。毫无疑问，在历史上，事物的现实状况始终先于法律权利而存在，前者始终是由后者批准的，但同样无疑义的是，从前一度是结果的法律权利，也会变成其他结果的原因；为了获得其他结果，就必须把它们变成自己的对立面。这样一来，得到国家保障的继承权就成为劳动资料私有制的基础和主要条件。有人对发言人说，宣布废除继承权会是不现实的，因为既然工人有充分的权力消灭继承权，那么他们也就有充分的权力消灭这个权利的原因本身。但是不管是他还是他的朋友们建议废除继承权首先正是出于实际的考虑。他听到有人谈论对小农和小土地所有者实行剥夺的困难，毫无疑问，实行这种剥夺的企图会把小农推到反动党派的怀抱中去，而这正是需要避免的。将来起码要使小农成为现在归他所有的那块土地的实际上的终生占有者。如果继承权保存下来，农民将不仅仍然是占有者，而且是所有者，并且将把这种称号传给自己的子女。如果这个权利、这个法律权利被取消了，如果它不再被国家用暴力强加于人，——他们的地段将不可避免地转归公有。

一些代表要求停止辩论。另一些代表反对，认为问题还讨论得不充分。

李卜克内西（北德意志国会的议员）声明，这个问题并不十分紧迫，可以让将来的各次代表大会再去进行二十次讨论。如果他们现在把这个问题再讨论上一个星期，而得出的结论也不会同现在立即进行表决得出的结论有什么不同。议事日程中还有三个问题没有讨论，而讨论这些问题的时间只剩下一天了。还有一个工会问题，他认为这是所有问题中最重要的问题；整个德国都在积极迅速地建立和组织工会，而他等待这次代表大会给这个运动以某种实际的帮助。

61

吉约姆主张停止辩论。舍马莱代表个人主义者声明，继承权问题委员会的结论同关于土地的决议是符合的。剩下的问题

就是让那些意见有分歧的集体主义者互相说服，但这希望不大；要说服互助论者也是办不到的。

朗格鲁瓦反对停止辩论。他说，人们投票赞成土地公有，但不是赞成一切其他东西公有，因此继承权问题的决议仅仅涉及到土地。如果他们投票赞成一切财产公有，那他们就不应当研究下一个问题，即关于信贷问题，因为财产公有是对信贷的否定。

塔尔塔列支持朗格鲁瓦。他不理解，为什么要停止关于这样重要的问题的讨论。

托伦对于好几次把他叫作“个人主义者”提出抗议。

对停止辩论的建议进行表决。

记名投票的结果：三十二票赞成；二十三票反对；十三票弃权。因为没有绝对的多数，建议被否决¹⁴。

根据弗拉奥的得到了一些人支持的建议，决定完全取消关于信贷问题和关于国民教育问题的讨论，因为这些问题已经是第三次（在代表大会上）讨论了，而工会问题，即大会要讨论的最后一个问题，将在明天上午会议上讨论。会议于七点钟休会。

晚 上 会 议

主席就位。点名结果，二十一个代表缺席，其中三人生病。

宣读和批准了上次会议的纪录。

一致通过了关于新支部以后要把自己的成立通知总委员会的建议。提出这个建议的原因是，报纸经常报道支部成立和协会加入国际的消息，但是以后在总委员会的登记簿中却找不到它们的名称。会议指出里昂缫丝工人是值得效法的榜样，他们在通知自己成立的同时，还寄来了入会的会费。

还通过了一项决议：在法律禁止集体加入任何团体的一切国家中，工人团体可以派自己的代表出席国际的代表大会，参加对共同问题的讨论，但是它们不能参加关于组织问题的会议。

会议于十一点钟休会。

第六天

(1869年9月11日)

上 午 会 议

主席就位。九点半点名，六个代表缺席，其中二人生病。
宣读和批准了昨天的记录。

工会问题委员会提出了以下决议案：

“代表大会声明，各种职业的工人应当努力建立同业工会。

这种工会一经产生，就应当立即同其他地方已经存在的同业工会建立联系，以便建立全国性的联合会；这些联合会的特殊任务是：收集涉及它们工业部门的一切统计资料和其他资料，同时应尽力提出保护工人阶级共同利益的措施；它们应当尽最大努力使这些措施获得成功，直到雇佣劳动制度被合作化的自由劳动制度所代替。

鉴于劳动和资本的国际性质要求建立国际工会组织，代表大会委托总委员会建立国际工会联合会。”

库尔特拉里地区支部起草的报告中指出，罢工基金问题是一个重要问题，它的实际解决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经济学家尽管可以写整卷整卷的著作来证明工会不能改变工资定额，但是每天的经验都证明相反的情况。只要存在着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为了反击资本的进攻，就必需有工会和基金。资本的统治产生了把劳动者组织起来的必要性，因为只有当工人组织起来并掌握有可以依靠的基金的时候，他们才有希望争得老板的某种让步。为了取得胜利，工人组织应当成为国际性的。但是，

既然工会已经建立，那么它们除了工资问题外，还应当做其他事情，并越来越多地具有争取社会和政治改革的普遍组织的性质，从而构成未来社会组织的基础。考虑到可能发生各种事件，建议建立国际罢工基金。

巴黎铜匠的报告这样开始：“工会活动的顺利发展已经表明了它们将在工人阶级解放中起什么作用，而劳动人民反对资本主义压迫的斗争，为工会的顺利发展奠定了基础。”有人说什么工会会员造成物价上涨，从而使得提高工资徒有其名。为了回答这种责难，报告人指出，罢工常常是由投机造成的生活必需品价格的上涨引起的，因此，罢工并不是物价上涨的原因，相反地，物价的上涨是罢工的原因。所以，孤立地运动，甚至工会也不大可能坚持长期的反抗，因此才想把巴黎的工会联合起来。政府竭力阻碍这种联合。但是，尽管如此，它们并没有丧失成功的希望。社会制度的牺牲者应当研究自己贫困的原因，而由于铜匠组织的发展所引起的辩论，提供了以往历史的宝贵教训，为了未来而用知识武装了他们。

李卜克内西首先发言辩论。他指出，需要有两种组织。第一，每个国家的所有职业团体应当在全国范围内组织起来；第二，各种全国性组织应当在国际范围内联合起来。德国资本家不久前开始输入瑞典人。如果瑞典的职业团体自己组织起来，并同其他地方的类似组织联合起来，这种事情就不会发生。在每个国家中必需有一个中央执行机关，也必需有一个总委员会，由它来主持各国间的联系，——国际的总委员会可以完成这个任务。在英国，工联几乎有整整一个世纪的历史了，那里的组织几乎是完善的。在德国，已开始按英国和美国的榜样组织起来，法国也不会长久落后。

65

舍马莱说，他只想讲一点意见：资本已经集中起来了，劳动也应当集中起来。他不准备详谈工会的利益问题，而仅限于支持专门委员会的结论。他不认为工会除了进行争取工资的罢工

和斗争外，还适合于做别的事情，在社会民主主义国家中它们将消失。

卡普卢索说，意大利工人今天第一次在国际的代表大会上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大概任何地方也没有象那不勒斯那样需要工会组织。贸易自由并没有给那不勒斯的劳苦大众带来任何利益，相反地，它给他们带来了很大困难。整个意大利南部是农业区，贸易自由造成大量出口食品和大量进口工厂制品，而那不勒斯的工人则在挨饿。近几年来，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差不多增加了一倍，可是工资却仍然停留在原来的水平上，一个熟练工人每天的工资是二到三法郎。那不勒斯共有六十万居民；他们的构成如下：流浪汉或无业游民十五万人；所有主和投机商十万人；小商人和小高利贷者十五万人；其余二十万人是正直的劳动者，他们必须供给所有人的衣、食、住。在有工作的时候，他们常常每天工作十五小时。此外，房租很贵，房子很小，以致大多数人不得不居住在郊区。这样，为了勉强糊口，

66 加上路途往返的时间，一天二十四小時中，他们要花去十八到十九小时。大资本家联合起来了，组织了各种各样的联合会，而工人只是在不久以前才开始建立组织。在国营工厂中，他们被当作罪犯，所有的工头和监工——宪兵都把他们当野兽看待。他们对于让资产阶级来减轻自己的苦难已不抱任何希望。即使明天就宣布共和国，这也不会改变他们的命运：这不过是用一种剥削代替另一种剥削罢了。至于罢工，那是根本谈不到的：他们没有一点积蓄，甚至连一天也不能停止工作。如果国际工人协会能够帮助什么地方的工人的话，那么再也没有比那不勒斯更需要这种帮助的地方了。

巴格宁指出，景象的确是阴郁的。他很了解这个发言人，因此不怀疑他的讲话。他确实希望欧洲工人应当采取什么措施来帮助那不勒斯人争取缩短工作日和获得较高的工资。

尖斯说，他不同意把工会仅仅看作是实行罢工和争取提高

工资的团体；他也不赞成建立把各种工会联合起来的中央委员会。现在的工会有朝一日会彻底推翻现在的政治组织形式；它们是未来的社会和政治组织。所有的劳动者都根据相应的职业划分为不同的团体，结果就会产生新的社会政治组织。他不希望国家干涉，在比利时，劳动者已经尝够了国家干涉的苦头。至于中央委员会，那么每种职业在主要工厂中心都应当有自己的中央委员会。棉纺工业中央委员会应当设在曼彻斯特，丝织工业中央委员会应当设在里昂等等。他不认为工会在某种程度上脱离政治有什么害处，起码在他的祖国是这样。企图改造国家或者参加它的政权机关，实际上就是承认它存在的权利。不管英国人、瑞士人、德国人和美国人想利用现代政治国家来达到什么目的，比利时人是拒绝自己现在的政治国家的。

弗拉奥说，不应丧失时机，建立工会和把工会联合起来是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事情。只要还没有普遍联合起来，就什么也争取不到；联合起来，工人阶级的行动就能具有社会和政治意义。没有这种联合什么也争取不到。

杜朗（巴黎）警告，不要赋予工会以过大的意义。人们很快就会相信，工会并不是解决将要产生的问题的最好工具。他认为，与其积蓄钱来举行罢工，不如组织合作生产，或者把钱贷给合作社，既然工会自己不利用这些钱。以前那种形式的合作社只会产生雇主，而不是排挤他们。合作社应当成为工会的共同事业。在巴黎，它们不得不对付妇女劳动的激烈竞争，这是工会应当研究的一个问题。发言人赞成建立工会，因为它们可以使人们互相交往和了解。国际联合还可以在一个方面起有益的作用，即它自己所进行的联合的工作。德国人购买所谓的“巴黎的半成品”，把它们加工成成品，然后冒充为巴黎货出售，比巴黎人的售价便宜得多。

托伦听到有人说要限制徒工；他希望不要讨论这个问题。在目前混乱的社会状况下，除了让这种现象听其自然地发

展外，别无其他办法。他不想断言，在有非常确切和充分的统计资料的情况下找不到比现在更好的分配学徒的方法。但是，无论如何不能授权工会来决定需要学徒的数目。他不同意安斯的意见：未来人类的未来制度将是工会的简单的总合，人类将是卖肉的人、面包师、钳工等等的总合。还有一些高于卖肉的人或面包师的利益的其他人类利益，这些人类利益把人们联合起来，并决定着他们的社会和政治关系。

弗留诺声明，在巴黎什么事也做不成。木匠积蓄了一些资金，政府把它没收了。允许雇主联合，而不许工人联合。一些巴黎团体想组织联合会，但是资本家竭力阻挠，警察也帮助他们。他不赞成募集资金来支持罢工，他主张没有基金的道义上的组织性。他赞成建立地方性的联合会，但是他不相信任何广泛的联合制度。如果地方性联合会互相通信，它们会帮助工人从人手太多的地方转到别的地方去。

赫斯建议停止辩论。

布里斯美反对。他一个星期都没有发言，如果不让他对这个问题发表意见，那么他最好待在家里。

会议于十二点钟休会。

下 午 会 议

主席就位。两点钟点名，七个代表缺席。

缪拉发言恢复了辩论。他只想讲一件关于比利时矿工的事情：让孩子们一早就和男人们一起下〔矿井〕，让他们在地下一直干到晚上男人们上来的时候。工会应当对这种事进行干预。

69 塔尔塔列主张成立工会，但是不能损害其他事情。在巴黎，人们谴责它们照搬不列颠联合会的规则和企图采用恐吓¹⁵的方法。还谴责它们企图复活中世纪的同业公会。它们只希望能够保卫自己的自由人联合起来。

布里斯美说，任何工会都不会使工人阶级摆脱资本的统治；只有改造劳动资料私有制才能达这个目的。至于罢工，布鲁塞尔人已经做了他们所能做的一切。他们有一个专门委员会，由每种行业各派三个代表组成。这个委员会决定是否值得举行所建议的罢工。巴黎人断言，他们不能组织任何工会；他对这点表示怀疑。这里就有巴黎协会的六七个代表。在工会中，人们无疑会养成一种组织习惯。

格雷利希认为，代表大会不应制定关于未来的理论，而应当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当前的状况上。很难预见，在机器和科学发现进一步发展的情况下，现在的职业在下一代将会成为什么样子。他不认为工会能在社会中起决定作用。妇女劳动问题是很容易解决的。现代工业使妇女脱离家务进入工厂。在这方面一切都应当效法美国国会，美国国会决定，在政府部门中工作的所有妇女，都和男子同工同酬。最近一次美国工人代表大会肯定了这项决议，主张在私人企业中加以实行。工会的任务就是把这点付诸实施；它们不应阻挠妇女劳动。他反对限制徒工。至于巴黎职工团体的基金问题，既然大陆的帝王们觉得自己的珍宝不安全时，就把它们送往国外，存入英国银行，那么巴黎的职工团体也可以照此办理。

70

格罗素兰说，一些新成立的联合会总是热衷于罢工，而不大注意很好地组织起来或者积累采取行动所必需的资金。瑞士人已经克服了这种缺点，他希望他们的经验对其他人是不无用处的。工人绝不应接受业主给自己保险基金的捐款，因为这会使他们成为附庸。他同意前一个发言人关于妇女劳动的主张。

列斯纳认为，关于组织工会的问题已经由布鲁塞尔代表大会的决议解决了¹⁶。工会绝不是现代运动的目的，它们只是手段；目的是消灭雇佣劳动。

阿普耳加思希望辩论实际一些，为此他提出以下决议案：

“一、现在是竞争的世纪，为了竞争，企业主不仅进行疯

73

狂的投机和玩弄恶毒的金融诡计，以便压低价格击败竞争者而获得订货，而且在许多场合挑唆各国工人互相反对。因此，在每个国家建立保护工人的工会是绝对必要的，而建立一切国家的工会联合会则成为当前的迫切任务；

二、由于全世界工人的利益是一致的，代表几乎所有国家工人利益的这次代表大会，坚决主张没有工会的各行各业请求现有的工会提供情报和进行协助，以便在每一个国家的每一个工业部门内组织工会，不管那里采用的是男人劳动或妇女劳动；

三、代表大会坚决主张各国的工会组织成为工会联合会，用交换信件或每月提出报告的办法来建立联系，互相交换各种情报，例如关于工资、关于工作日多长或者关于每一个国家的雇佣劳动的一般条件的情报；

71 四、国际协会的各个支部应当促进建立联合会；各支部和总委员会应当提供帮助，提供需要的地址和转递通知；

五、代表大会提请各工会注意：开始运用仲裁来解决与生产有关的冲突是多么重要，并希望在尽可能短的时期内采用合作生产的原则并利用工会的基金来达到这个目的；

六、如果现在的竞争制度将被合作生产所代替，那么显而易见，根据过去的经验，工会是第一个和最自然的组织形式，只要现在的竞争制度还没有消失，工人就应当象过去一样诉诸这种组织的保护，这种组织无疑是培养组织性和纪律性以及对整体利益严格尊重的最好的工具，而整体利益是合作生产成功的必要条件；

七、代表大会坚决请求各工会以后把实行国家义务世俗教育制度的要求列入自己的政治纲领；满足这个要求是任何一个大的社会改革或政治改革的前提，并且是使这种改革得到成功和巩固的唯一保证。”

阿普耳加思认为讨论工会的必要性是多余的，它们之所以

存在，正是因为它们是完全必要的。他有多年的经验，只要目前的劳资相互关系继续存在，工会就是必要的。应当教育正在成长的一代，使他们能够适应社会组织更高发展阶段的生活。如果我们能够通过教育把工人提高到进行合作生产，那么组织工会的绝对必要性对他们说来就不成问题了。发言人说，他的决议案是以在英国工联中多年的工作经验为依据的；在这些决议案中他不仅从工会的起源的观点阐明问题，而且还试图表明，工会怎样才能具有国际性质，并从自己的最初形式发展为高级的和最好的组织形式，以及如何利用它们的影响来普及教育。

由于会议上有人要求立即停止辩论，决议案没有得到认真的讨论。“表决！表决！”的喊声迫使辩论停止，工会问题委员会提出的决议案经举手表决获得通过。

然后主席（莱克）请美国代表凯麦隆先生发言。凯麦隆发表了如下的讲话：“主席先生和第四次国际代表大会的代表们！我很高兴借此机会以美国工人的名义并代表他们向你们表示深刻的同情，并祝你们在你们所从事的崇高事业中取得胜利，这个崇高的事业就是争取改善全世界千百万劳动者的状况和使他们获得解放，就是争取四海之内皆兄弟这样美好日子的来临，那时候将铸剑为犁，锻矛为镰；那时候任何暴政和任何压迫都将被连根剗除和消灭，那时候有文化的和自由的劳动者将占据宇宙的创造者给他们安排的位置，能够享受自己的全部劳动果食。代表同志们，我今天出席这个大会，证明你们在新大陆上的朋友承认全世界劳动者之间具有共同的利益，他们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他们的队列将在写着“真理、正义和平等”的旗帜下结成统一战线，并满怀信心地走向胜利。我们认为，劳动的利益，不管在我们的国会中，还是在各州的议会上，劳动的利益都应当由工人中选出的人来代表，我们协会的工人已经同至今一直占据显赫地位的两个政党断绝了关系；我

73 们的法律是由这样一些人制定的：他们的利益在我们的恶劣的社会制度下同我们自己的利益是敌对的，他们的自私自利要求使这些法律永世长存；期待那些给我们制造了灾祸的人来满足我们的要求是不可能的，是根本不可能的，只能是按照如下的原则行动：以牙还牙，——我认为我们早就承认了这个原则。我马上就结束自己的讲话。在大洋彼岸——

凡是愿意劳动的人都可以成为人，
每一个穷人都能收获到土地的果实，
我受委托向那些想离开旧大陆人口拥挤的住区，到海外寻找祖国的人们转致衷心的邀请和热烈的欢迎：“恭请光临”。我向你们所有的人声明：“你们会找到朋友和兄弟，他们准备向你们伸出手来”。我们只要求你们做到一点：你们做为朋友而来，愿意加强我们的行列和支持我们的正义要求；我们再没有别的要求；希望你们不要使自己成为阴谋家的工具，他们在为你们的利益服务的漂亮借口下，只是力图败坏和贬低你们的最好的和最忠实的朋友——美国工联成员的目标。受美国劳工同盟和国际工人联合会监督的侨民委员会的建立，依我的浅见，将会产生最幸运的结果，因为从那里随时可以得到最可靠的资料。我觉得自己有责任宣布，你们在这方面的每一个建议都将得到我们执行委员会的热烈支持。我感到如果不对我们敬爱的领袖西耳维斯先生的早逝说几句话，我是不好结束自己的讲话的。西耳维斯先生是一位世界知名人士，他的众所周知的名字已成为一个同争取改革的工人运动密切相联的普通名词。他具有无穷无尽的精力，非凡的毅力和组织才能。在所有的领袖当中，他是最能组织和巩固新大陆的工人的人。他在誉满全球的时候赍志而没，他临死时，富有成果的生活才在他的面前展开，他的努力才开始提供自己的果实。这个损失对我们来说几乎是不可弥补的。但是我们相信，将有别的人来接替他的职位，

74 他的死将促使他的追随者采取更团结和更坚决的行动。最后，

第一国际巴塞尔代表大会代表 三



潘 迪



缪 拉



舍马 莱



里沙 尔



巴 枯 宁



罗 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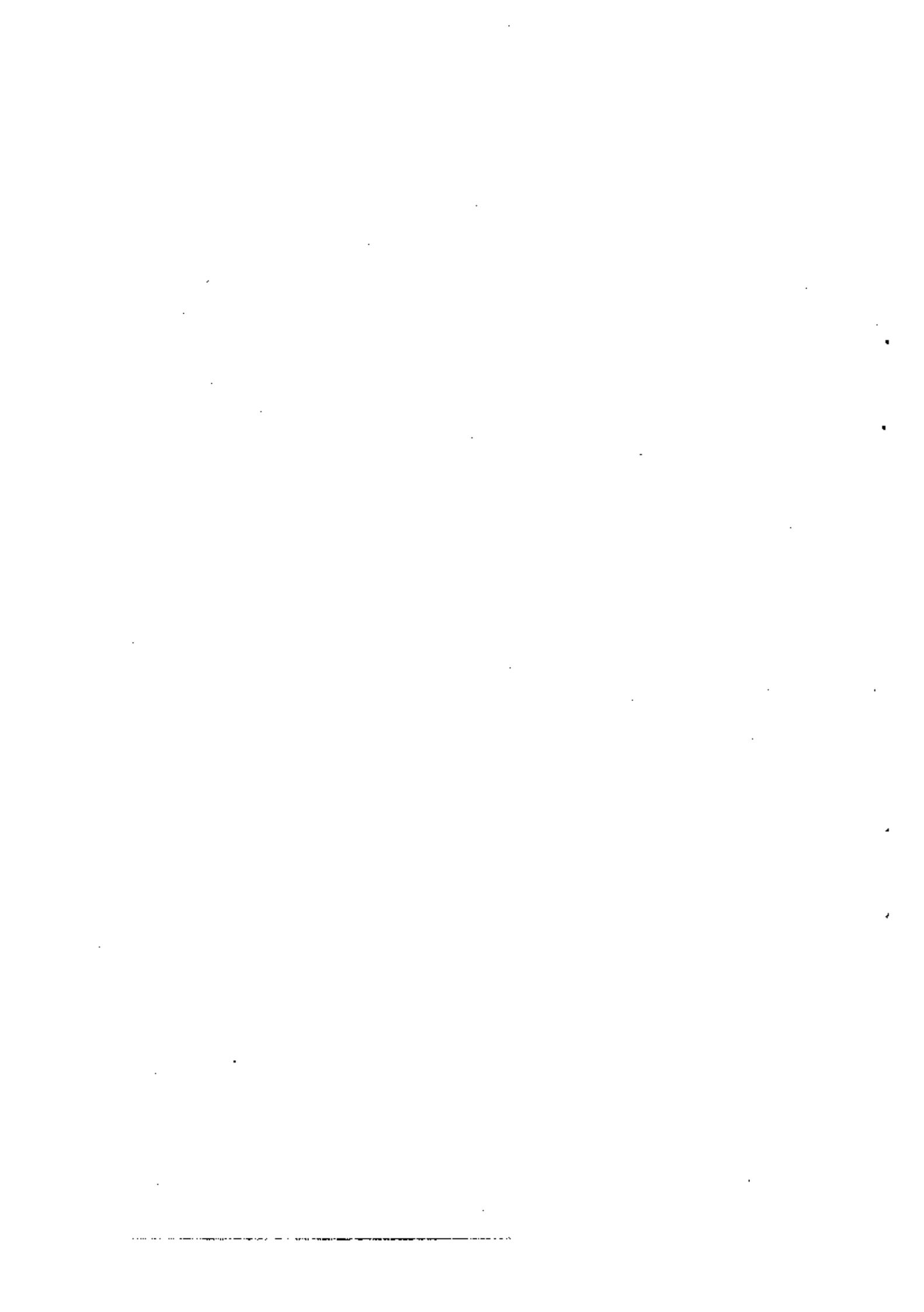
法 尔 加



敗蒂尼昂



凱 奎 隆



我的朋友们，请允许我对你们的盛情接待再一次表示我们的真挚的谢意，我将满意地把这种盛情接待的情况告诉给派遣我的同志们。先生们，让我的来临成为保证两大陆的代表出席我们以后举行的年度代表大会的惯例的开端吧，因为这种兄弟般的会见会带来最幸福的结果。因此，我希望你们能象我们派代表到这里来出席大会那样，出席我们将于1870年8月在辛辛那提举行的代表大会¹⁷。我们将高兴地报答你们的欢迎，用真正西方的“恭请光临”来回敬你们的代表。再一次请接受我和我所代表的人的祝愿，祝活动卓有成效，诸事如意”。

这个发言被译成了法语和德语，并受到了象凯麦隆先生本人在门口受到的那样热烈鼓掌欢迎，不同的是，掌声不是整齐一致的，因为并不是所有的代表都懂三种语言，每个人都不得不等待听懂了发言的意思后才鼓掌。

主席（荣克）对凯麦隆的发言表示感谢，并表示希望，欧洲的代表来年在辛辛那提将能答谢他的贺词，同时请凯麦隆先生相信，欧洲工人特别是协会的会员，理解到西尔维斯的逝世对他们意味着什么。西半球的工人运动所遭到的任何严重的损失都必然要影响到东半球；同样的，东半球取得的成就在一定程度上也会推动西半球进行新的努力。

然后解决了一些小问题。休息后主席（荣克）用几分钟时间整顿了一下会场秩序，并说：

“代表同志们！许多人向我要求作总结发言，但听取所有的人的发言太费时间，所以为了避免抱怨，我自己决定作总结发言。三年前当我们在日内瓦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时候，人们把我们看作是大傻瓜。报刊对我们采取轻视的态度或者嘲笑我们：当我们宣布了在伦敦通过而要在代表大会上批准的那些原则¹⁸时，连我们自己的朋友也对我们持怀疑态度。现在我们的原则被毫不犹豫地讨论着，我们的原则被到处宣布，欧洲报刊也报道我们的行动，虽然有时口气不太友好，但是很明显，

我们已成为一种力量。我相信，我们的成功已超过了最大胆的期望。不管发生什么情况，我们是充分强有力的，不会因精力衰竭而死亡，我们是富有生命力的，警察和政府的迫害是消灭不了我们的。我们克服了第一个障碍，从而打下了巩固的基础。通向目的道路展现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携起手来向这个目的前进。我们宣布国际工人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公开会议到此结束”。

会场上响起了响亮的、长时间的“万岁”声，最后高呼“民主社会共和国万岁！”——这就是代表们的回答。

晚 上 会 议

主席就位。八点半点名。

维也纳代表奥伯温德曾由于翻印被禁止的杂志上的文章而被判处一个月监禁，只是在来巴塞尔的前几小时才被释放，他现在仍然卧病在床。

由于还有一些代表今天离开，所以没有指出缺席人数。

宣读和通过了尚未整理的纪录。

杜朗宣读了白天从巴黎收到的一封信，信中通知说，一个有四千会员的团体加入了协会。

巴斯腾建议在维尔维叶召开下一次代表大会。

76

许多代表主张在巴塞罗纳举行。

李卜克内西希望代表大会在德国举行，或者在同它较近的邻国举行。

一个巴黎代表认为可以在巴黎举行，并建议让总委员选择开会的地点。

巴枯宁支持这个建议。

埃卡留斯说：章程授权总委员会在需要的时候可以改变召开代表大会的地点，但不能改变召开的时间。如果情况有利的

话，总委员会可以把召开代表大会的地点改在巴黎或现在将要确定的任何一个地方。

安斯坚决建议国际工人协会第五次代表大会于1870年9月第一个星期一在巴黎举行。（长时间地鼓掌）

鲁克拉夫特支持这个建议。法国的自由主义在向前发展；这个建议本身可以影响和迫使皇帝放松警察规定，以便让代表大会能够召开。更奇怪的事情过去也是常有的。我们生活在变动的时代，谁也不能预言，一年后的情况怎样。此外，如果仅仅去做暴君所允许的事情，那么进展就会很慢。

阿普耳加恩不理解，为什么下一次代表大会不能象代表们所希望的那样，在巴黎或任何一个别的地方举行。如果法国的法律不允许法国人为此目的举行人数众多的集会，那么他们当然不能禁止英国工人和其他国家的工人这样做，那时法国工人将作为客人受到邀请。每一个国家的有产阶级可以人数不拘地随时到法国去消耗自己的金钱；为什么工人在那里不能象在英国或其他国家那样开会发表自己的意见？让别人去说这些意见是不文明的和不实际的去吧，这是他们的权利，但是工人阶级也有权发表他们想要发表的意见。国际的存在是对战争的经常抗议。我们想用道义手段来达到我们所希望的变革，因此在巴黎就象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一样，我们也有权集会并表达我们的信念。发言人相信，人们没有必要在那些允许他们集会和显示自己力量的国家中去显示自己的力量。因此，下一次代表大会应当在巴黎举行。

接着，对在巴黎举行下一次代表大会的建议进行表决，在热烈的掌声中通过了这个建议¹⁹。

然后宣读并批准了总委员会的财务报告。

鉴于巴塞尔支部处境困难，决定每个代表缴纳五法郎以抵偿代表大会的费用。

伦敦仍被指定为总委员会的驻在地。总委员会的原有成员

全部重新当选。

然后国际工人协会第四次年度代表大会宣布闭幕。

主席 海尔曼·荣克

书记 约翰·格奥尔格·埃卡留斯

代 表 名 单*

78

姓 名	职 业	地 区	代表的组织
美 国			
1. 凯麦隆	《工人辩护士报》编辑	芝加哥	美国全国劳工同盟
比 利 时			
2. 巴斯腾，尤贝尔	纺织工人	涅桑维尔-列-佛尔维耶	维兹得拉盆地联合会支部
3. 布里斯美，德吉列	印刷工人	布鲁塞尔	协会布鲁塞尔联合会支部
4. 德·巴普，塞札尔	排字工人	布鲁塞尔	协会沙尔勒鲁区支部和东部联合会
5. 安斯，欧仁	教 师	布鲁塞尔	比利时中央委员会
6. 罗班，保尔	教 师	日内瓦	协会列日支部
英 国			
7. 阿普耳加思，罗伯特	木工联合会书记	伦 敦	伦敦总委员会
8. 埃卡留斯，约翰·格奥尔格	裁 缝	伦 敦	伦敦总委员会
9. 莱克·海尔曼	钟表匠	伦 敦	伦敦总委员会
10. 列斯纳，弗里德里希	裁 缝	伦 敦	伦敦德国工人教育协会

* 这个名单是根据1869年伦敦版《巴塞尔代表大会资料汇编》译制的。伦敦版中原来没有“地区”这一项，现补齐。——编者注

(续前表)

姓 名	职业	地 区	代表的组织
11. 鲁克拉夫特, 本杰明	家具工人	伦 敦	伦敦总委员会
12. 斯特普尼, 考威尔	协会司库	伦 敦	伦敦总委员会
法 国			
79 13. 奥布里, 艾米尔	排字工人	鲁 昂	鲁昂工人联合会
14. 博得, 阿马布里	法兰绒纺织工人	里 姆 日	国际里姆日支部
15. 布尔索, 维克托	铜 匠	里 昂	里昂铜匠和炼钢 工人
16. 舍马莱, 艾仁	建筑师	巴 黎	国际巴黎支部
17. 克列佐, 让-克洛德	精纺工人	索泰里列-鲁 昂	鲁昂区精纺工人 联合会
18. 憲雷尔, 西蒙	制靴匠	巴 黎	巴黎靴匠调解处
19. 多布尔, 艾米尔	印染工人	圣丹尼	圣丹尼印花工人 互助信贷会
20. 杜朗, 古斯达夫	首饰工人	巴 黎	巴黎首饰工人互 助会
21. 弗拉奥, 艾米尔	大理石工人	巴 黎	巴黎大理石工人 工会调解处
22. 弗朗坎, 茹尔	石印工人	巴 黎	巴黎石印工人协 会
23. 弗留诺	木 匠	巴 黎	巴黎木匠协会
24. 福洛, 安德列	细木工	马 赛	马赛建筑工人
25. 兰德林, 依波利特	铜 匠	巴 黎	巴黎铜匠协会
26. 朗格鲁瓦, 杰	新闻记者	巴 黎	巴黎金属施工工 会调解处
27. 莫兰, 加布里埃尔	金属镀金工匠	巴 黎	巴黎专门科学研 究所
28. 莫尼叶, 沙尔	制帽工人	圣新弗里恩· 德奥赞(伊 泽尔省)	圣新弗里恩·德 奥赞缫丝工人

(续前表)

姓 名	职 业	地 区	代表的组织
29. 穆拉，安得列	机械工人	巴 黎	巴黎机械工人工会调解处
30. 乌其叶，塞列斯登	细木工	里 昂	里昂细木工协会 80
31. 帕利克斯，路易	裁 缝	里 昂	里昂缫丝工人和裁缝协会
32. 比顿，艾仁	纺织工人	埃尔伯菲	埃尔伯菲工人社会经济协会
33. 潘迪，路易	细木工	巴 黎	巴黎细木工工会调解处
34. 里沙尔，阿尔伯	丝织工人	里 昂	里昂缫丝工人和制带工人协会
35. 鲁塞尔，艾德华	白铁工人	巴 黎	巴黎白铁工人协会
36. 塔尔塔列，艾仁	大理石研磨工人	巴 黎	巴黎大理石研磨工人工会调解处
37. 托伦，昂利	雕刻工	巴 黎	马赛面包工人协会
38. 瓦尔兰，路易·欧仁	印刷工人	巴 黎	巴黎印刷工人协会
德 国			
39. 赫斯，莫泽斯	新闻工作者	巴 黎	国际柏林支部
40. 扬纳什	政治经济学教授	巴塞尔	国际马格德堡支部
41. 克利盖尔，约翰	新闻记者	巴塞尔	国际德累斯顿支部
42. 李卜克内西，威廉	《人民国家报》编辑	莱比锡	社会民主党艾森纳赫代表大会

(续前表)

姓 名	职业	地 区	代表的组织
43. 茹马耶, 路德维希	《新城周报》编辑	维也纳新城	国际维也纳新城支部
44. 奥伯温德, 亨利希	《人民呼声报》编辑	维也纳	国际维也纳支部
45. 里廷豪森, 莫	作家	科 伦	国际科伦和佐林根支部
81 46. 舍勒, 亨利	大学生	巴塞尔	国际巴门和爱北斐特支部
47. 施皮尔, 赛米尔	教 师	沃尔劳彼特	国际不伦瑞克支部
48. 魏尔格尔	制革工人	洛拉赫(巴登)	国际洛拉赫(巴登) 支部
意大利			
49. 巴枯宁, 米海依尔	新闻工作者	日内瓦	意大利机械工人支部
50. 卡普卢索, 斯蒂凡诺	裁 缝	那不勒斯	意大利那不勒斯中央支部
51. 法奈利	建筑工程师	佛洛伦萨	佛洛伦萨工人协会
西班牙			
52. 法尔加-佩利塞尔, 拉斐尔	排字工人	巴塞罗纳	卡塔洛尼亚中央支部
53. 敦蒂尼昂, 加斯帕尔	《联盟》周报编辑	巴塞罗纳	国际巴塞罗纳支部
瑞 士			
54. 贝克尔, 菲	《先驱者报》编辑	日内瓦	日内瓦(德语区支部) 中央委

(续前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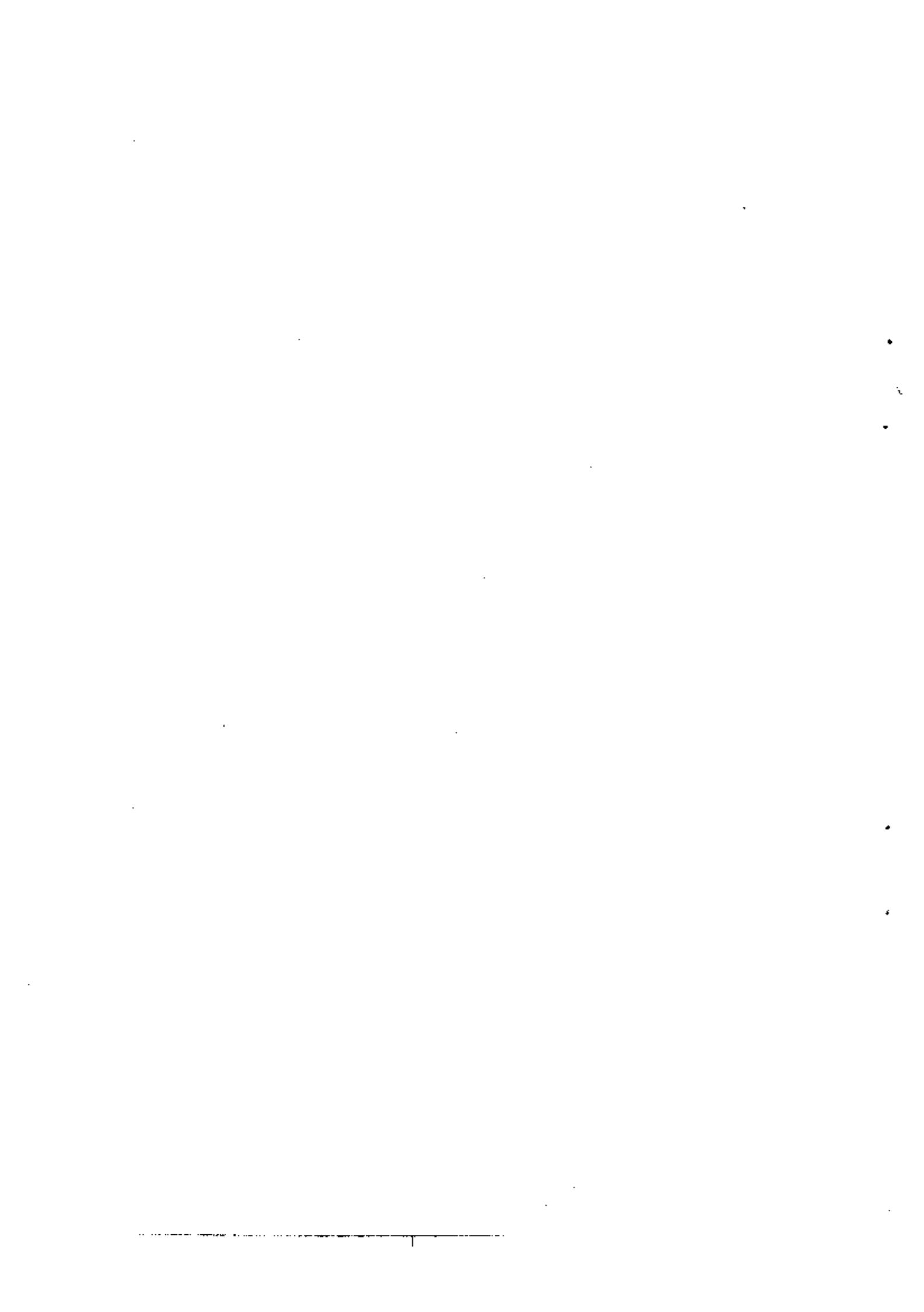
姓 名	职 业	地 区	代表的组织
55. 博尼	小五金商人	巴塞尔	员会 国际巴塞主要支 部
56. 布罗塞，弗朗斯瓦	铸 工	日内瓦	国际日内瓦支部
57. 布律安，卡斯帕尔· 阿路瓦	检察官	巴塞尔	国际巴塞尔城和 巴塞尔区支部
58. 毕尔克利，卡尔	制革工人	苏黎世	苏黎世消费合作 社
59. 科林，伯恩哈特	商 人	巴塞尔	国际巴塞尔支部
60. 艾什巴赫，亨利	机械工人	苏黎世	苏黎世五金工人
61. 弗雷，约瑟夫	制带工人	巴塞尔	国际鲁岑弗鲁支 82 部
62. 弗洛凯，弗朗苏阿	钟盒匠	洛克尔（纽沙 特尔州）	洛克尔中央支部
63. 戈克，阿曼得	《背囊报》编辑	日内瓦	德国工人教育协 会
64. 乔治，查尔斯	钟表工人	穆其埃格朗- 瓦尔	国际穆其埃格 朗-瓦尔支部
65. 格雷利希，海尔曼	装订工人	苏黎世	国际苏黎世支部
66. 格罗斯兰，雅克	钟表工人	日内瓦	日内瓦建筑工人
67. 吉约姆，詹姆斯	教 师	洛克尔（纽沙 特尔州）	洛克尔雕刻师协 会
68. 古特，海罗里得	裁 缝	巴塞尔	瑞士裁缝中央委 员会
69. 亨格，弗里茨	雕刻师	日内瓦	国际日内瓦支 部*
70. 赫来特尔，雅科布	钳 工	巴塞尔	巴塞尔工人协会

* 1869年伦敦版中把第69至72号代表所代表的组织写颠倒了，现
予以纠正。——编者注

(续前表)

姓 名	职 业	地 区	代表的组织
71.热叶, 维克托	制革工人	洛 桑	国际洛桑支部
72.莱森格尔, 雅科布	裁 缝	巴塞尔	巴塞尔德国工人协会
73.马尔蒂诺	排字工人	纽沙特尔附近的美因	国际纽沙特尔支部
74.培列, 昂里	雕版师	日内瓦	日内瓦钟表工人
75.昆舍, 路易	制带工人	巴塞尔	巴塞尔制带工人支部
76.罗伯尔, 弗里茨	教 师	绍德封	国际绍德封支部
77.施维茨格贝耳, 阿德 马尔	雕版师	桑维耳耶(伯 尔尼汝拉山 区)	国际库尔台拉里 州支部
78.斯塔克, 鲁道夫	制靴匠	巴塞尔	巴塞尔制靴匠协 会

代表大会材料



[一、关于土地所有制问题]

1. 社会有权废除土地私有制并把土地变为公有财产。
 2. 废除土地私有制并把土地变为公有财产是必要的。
- (代表大会根据卡普卢索的建议通过的补充决议：)

每一个支部应当在下届代表大会时制定出为解决公有制问题所必需采取的实际措施的方案。

[二、关于工会问题]

代表大会声明，各种职业的工人应当努力建立同业工会。

这种工会一经产生，就应当立即同其他地方已经存在的同业工会建立联系，以便建立全国性的联合会；这些联合会的特殊任务是：收集涉及它们工业部门的一切统计资料和其他资料，同时应尽力提出保护工人阶级共同利益的措施；它们应当尽最大努力使这些措施获得成功，直到雇佣劳动制度被合作化的自由劳动制度所代替。

鉴于劳动和资本的国际性质要求建立国际工会组织，代表大会委托总委员会建立国际工会联合会。

[三、关于劳动统计问题]

考虑到代表大会除了讨论理论问题以外，还应当采取实际

86 措施，使（协会的）全体会员知悉各个国际劳动者的状况和工业状况。

根据共同章程第五条^{*}，

代表大会建议所有工人团体在半年内把有关下述情况的尽量详细的统计资料送交总委员会：关于每种专业的工人人数的资料；关于工资水平的资料；关于产品的成本和价格的资料；关于工人不满的原因的资料以及一切能收集到的关于每个工业部门的原料和市场情况的资料。

[四、关于组织问题]

1

[关于主席职位]

鉴于工人协会在自己内部因袭专制的和独裁的原则即设置主席是不恰当的，即使主席没有任何权力，这种荣誉称号也是对民主原则的侵害，

代表大会建议所有支部和加入国际的工人团体在自己内部取消主席职位。

2

[关于含有攻击协会的言论的出版物]

有关支部应把含有攻击协会的言论的一切出版物立即寄给总委员会。

* 指国际共同章程第五条以下地方：“总委员会同各种工人团体建立联系，它应该使一国工人能经常知悉所有其他各国工人阶级运动的情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600页）——编者注

**[关于在协会的机关刊物上公布管理处
和总委员会的地址]**

管理处 [bureaux] 和总委员会的地址每三个月应当在协会的机关报上公布一次。

[关于新支部加入协会的手续]

一切新成立的支部和愿意加入国际的团体应当把自己加入的决定立即报告总委员会。

[关于接收新支部加入协会的手续]

总委员会有权接受或不接受新的支部或小组，但它们有权对这个决定向下届代表大会提出申诉。

在设有联合会委员会的地方，总委员会在通过这类决定之前，须听取它们的意见，但总委员会仍然有权做出临时的决定。

[关于从协会内开除支部的手续]

总委员会也有权暂时开除支部，直到下届代表大会为止。

全国性组织也有权从本联合会开除个别团体，但后者仍旧是国际的支部。全国性组织可以建议总委员会把这些团体暂时开除出国际。

[关于解决协会各支部之间的冲突]

总委员会有权解决一个全国性组织所属的各个团体之

间或各个全国性组织之间的冲突；双方均有权在下届代表大会上对这种解决办法提出申诉，由代表大会做出最终决定。

88

8

[关 于 会 费]

今后仍然只允许那些参加了国际并向总委员会缴纳规定的会费的团体、支部和组织的代表参加代表大会和投票表决。

但是，那些国际工人协会的组织受到法律禁止的国家中的工人团体的代表，将被允许参加原则性问题的讨论，但不允许参加组织问题的讨论和参加关于这些问题的投票表决。

9

[关 于 会 费 的 数 目]

根据条例第四条^① 关于会费的规定，1869—1870年度每人应缴纳十生丁会费。

[10]

[关 于 各 地 方 支 部 向 协 会 代 表 大 会 的 总 结 报 告]

今后各地方支部的所有总结报告仍然应当至少在代表大会前两个月提交总委员会；总委员会应当把它们综合成一个总的总结报告。

① 指章程的下述条款：“……在1866—1867年度作为一种特殊情况向国际工人协会的每个会员征收30生丁（3 达特）会费。这些会费主要用来支付总委员会的多种费用，如总书记薪金，发表文件及通讯的费用，代表大会的组织工作和其它筹备工作的开支，等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602页。——译者）。——编者注

[关于协会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

关于列入代表大会议程的问题的报告，将不在全体会议上宣读，而由各专门委员会审阅，各专门委员会将提出关于这些报告的准确真实的摘要。

需要讨论的问题的目录应当在代表大会前六个月发给各支部。

[五、个别决定]

89

[关于协会下次代表大会召开的地点]

下次代表大会在巴黎召开。

[关于抵偿巴塞尔代表大会的开支]

鉴于巴塞尔支部处境困难，（代表大会的）每一个代表应缴纳五法郎以抵偿代表大会的开支。

[关于总委员会的财务报告]

批准总委员会的财务报告（一致通过）。

[关于总委员会的驻在地]

再次确定伦敦为总委员会的驻在地。

[六、选举总委员会]

总委员会的原有成员重新当选（一致通过）*

俄译文根据的版本：

第一、二两项决议、第四项决议中的第5、6两条译自伦敦出版的代表大会议记录正式版本；第三项决议和第四项决议中的第1—9各条译自《关于1869年9月在巴塞尔召开的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报告》，1869年布鲁塞尔版；第四项决议中的第11条译自《国际工人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9月6日到11日在巴塞尔》，1869年日内瓦版。

* 1868年在布鲁塞尔代表大会上选出的总委员会成员如下：贝克里、贝尔纳、德尔、杜邦、札比茨基、若昂纳尔、柯恩、卡普兰得、拉法格、列斯纳、利姆堡、罗、马克思、米尔纳、莫里斯、奥哲尔、斯特普尼、威廉斯、华尔顿、韦斯顿、福克斯、豪威耳、黑尔斯、肖、埃卡留斯、阿普耳加思、荣克。——编者注

各委员会的成员

1、土地所有制问题委员会

里廷豪森（科伦）、克列佐（鲁昂）、朗格鲁瓦（巴黎）、科林（巴塞尔）、昆舍（巴塞尔）、缪拉（巴黎）、瓦尔兰（巴黎）、列斯纳（伦敦）、德·巴普（布鲁塞尔）、赫斯（柏林）、比顿（埃尔伯菲）、扬纳什（马格德堡）、贝克尔（日内瓦）、散蒂尼昂（巴塞罗纳）。

2、继承权问题委员会

德雷尔（巴黎）、里沙尔（里昂）、布里斯美（布鲁塞尔）、吉约姆（洛克尔）、巴枯宁（里昂和那不勒斯）、亨格（日内瓦）、德·巴普（布鲁塞尔）、李卜克内西（莱比锡）、赫斯（柏林）、贝克尔（日内瓦）、法尔加-佩利塞尔（巴塞罗纳）。

3、互助信贷问题委员会

施维茨格贝耳（圣伊米耶）、多布尔（巴黎）、古特（洛桑）、弗洛凯（洛克尔）、埃卡留斯（伦敦）、舍马莱（巴黎）、斯塔克（巴塞尔）、散蒂尼昂（巴塞罗纳）。

4、综合教育问题委员会

鲁克拉夫特（伦敦）、巴斯腾（维尔维耶）、布律安（巴塞尔）、罗伯尔（绍德封）、莫兰（巴黎）、杜朗（巴黎）、罗

班（列日）、考威尔·斯特普尼（伦敦）、戈克（日内瓦）、列斯纳（伦敦）、诺马耶（维也纳）、阿普耳加思（伦敦）、赫斯（柏林）、散蒂尼昂（巴塞罗纳）、施皮尔（不伦瑞克）、兰德林（巴黎）、博尼（巴塞尔）、格罗斯兰（日内瓦）。

5、工会对工人阶级解放的作用问题委员会

安斯（布鲁塞尔）、施维茨格贝耳（圣伊米耶）、弗朗坎（巴黎）、弗拉奥（巴黎）、奥布里（鲁昂）、乌其叶（里昂）、福洛（马赛）、布尔索（里昂）、弗洛凯（洛克尔）、培列（日内瓦）、鲁塞尔（巴黎）、考威尔·斯特普尼（伦敦）、
91 阿普耳加思（伦敦）、舍马莱（巴黎）、热叶（洛桑）、布罗塞（日内瓦）、潘迪（巴黎）、李卜克内西（爱森纳赫）、法尔加-佩利塞尔（巴塞罗纳）。

俄文译自《关于1869年9月在巴塞尔召开的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报告》，
1869年布鲁塞尔版。

土地所有制问题委员会的报告

（报告人——里廷豪森）

土地私有制造成的无穷灾难是有目共睹的，是我们党内所有同志都很清楚的，所以由社会民主党人组成的委员会必须向自己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

“社会是否有权废除土地私有制并把土地变为公有财产？”。

委员会的绝大多数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完全肯定的；只有两个委员认为，土地私有制造成的巨大祸害应当用最广泛的措施来消除，但是他们不敢断言，这些措施可以被合法地扩大

到象上述大多数人所要求的范围。这两个委员不管在这个问题上，还是在第二个问题上最终都同意了多数人的建议；不过他们认为，土地所有者对一部分土地价值的经常权利，是由土地私有制的长期存在和由此产生的劳动成果这一事实产生的，虽然他们未能用明确的和使多数人信服的措词把这些权利确定下来。

多数人中有一个人声明，在他看来，不能提出这种虚构的权利来反对社会。何况，土地私有制并不象对立面所认为的那样，是社会自愿实行的，而是用暴力和一切卑鄙手段在经过了社会的一千多年的反抗之后建立起来的，在一切原始的初民那里土地都是公有财产。接着，委员会的这个委员描述，这种公有制怎样由于一系列掠夺和卑鄙行为而被消灭了，大批居民怎样被用欺骗的方式剥夺了他们对土地的合法权利。社会无限制地支配大自然给予它的土地的合法权利是那样不可争辩，连远不是属于社会主义阵营的法学家也完全公正和明确地表明了这种意见。对于每个社会民主党人来说，了解一下著名的萨维尼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非常有意义的。大家知道，萨维尼在几十年前曾在普鲁士担任大臣。他对这个问题的意见并不是在什么肤浅的演说中说的，而是在他的《现代罗马法体系》一书中发表的，而且并没有因此受到任何谴责。在题为《财产权》(第一卷第五十六节) 这一节中，他这样明确地说：

“但是，为了充分阐明财产的本质，我们必须把下述普遍论断作为出发点。每个人都有权支配不自由的自然界；但是他应当承认每个别的人也同样有这种权利，在个人广泛接触的情况下，这种互相承认便产生了划分利益的要求，——这种要求最初是不确定的，只有在一定的自我限制的情况下才能得到满足。这种满足是通过联合为国家的方式用实在法来实现的。如果我们在国家的范围内赋予国家充分支配不自由的自然界的权利，那么个人便是这个共同政权的参与者，而任务在于找到一

个明确的准则，以便政权能根据这个准则，在个人之间实行分配。实行这种分配的方法有三种，这三种方法不仅不应当互相排斥，而且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同时使用。我们可以把这三种方法表述如下：

- (1) 公有财产和公共使用……
- (2) 公有财产和私人使用……
- (3) 私有财产和私人使用……”

93 我们队伍中缺乏坚定性的人应当注意这个现代著名法学家的这些话。

经过长时间的辩论，辩论的细节报告人在这里就不讲了，委员会提出了第二个问题：

“社会是否有必要废除土地私有制并把土地变为公有财产？”

在这个问题上最初也没有取得一致意见。象在第一个问题上一样，少数几个人倾向于持否定答案。多数人指出，人的劳动只能运用于物质——木头、石头、铁、耕地等等。由此可以得出一个不可争辩的结论：谁绝对掌握着物质即土地，谁就完全支配着劳动。这是既不能推翻也不能回避的规律。在保存这种秩序的情况下，工人群众被剥夺了自己的份地，被迫勉强度日，没有挣脱地主铁爪的任何希望，而地主则衣食无虞，坐待时机，强迫工人接受最苛刻的工资条件。土地私有制最初几乎是少数人积累资本的唯一的和最强大的手段；由于这种积累的结果，有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支配变成为残酷的敲骨吸髓。

下面引用的比利时官方的可靠的统计资料证明，在保存土地私有制的情况下改善工人阶级状况的希望是多么小。

从1830年到1846年，地租在整个比利时提高了百分之三十，即每年提高百分之二。

这里必须指出，在暴风雨的1848—1849年，地租的增长完全停止了，后来地租又以更快的速度增长。从1850到1856年这

五年期间，地租增长了百分之十七点十四，即每年增长百分之三点四三到百分之三点五。

在这个期间，比利时农业工人的工资情况怎样呢？

94

对于食宿自理的雇佣工人来说，全王国男人的平均工资如下：

	1830年	1835年	1840年	1846年
单位法郎：	1.08	1.12	1.14	1.80

在这整个时期工资只增长了百分之九点二五，而在同一时期内地租则增长了百分之三十。这种不成比例的状况表明，工人阶级陷于无限贫困之中。

食宿自理的妇女的工资如下：

	1830年	1835年	1840年	1846年
单位生丁：	67	69	70	70①

这就是说，从1830年到1846年，每日的工资增加了五生丁，即不到百分之七点五。我们知道，在同一时期内地租增长了百分之三十，就是说工资的增长只是地租增长数的四分之一。

如果我们考察一下地价的增长，那么根据相应的统计资料我们可以看到，地价是随着地租的增长幅度而自然增长的。从1830到1846年，在小小的比利时，地价就增长了十二亿零三百三十万六千一百四十六法郎，即增长了百分之二十二。

这种状况要求即速干预，任何一个不怀偏见的人都不会否认这一点。

关于把土地变为公有财产以后将采用什么方式耕种和经营的问题，委员会委员的意见不一致。

由五个委员组成的少数派主张，社会应当把土地交给个人或农业合作社使用，由社会收取租金。少数派认为，为了保持

① 俄文版可能有误，这里似应为72。——译者注

农业工人的个人尊严和独立性，采用这种办法是完全必要的，
95 但少数派也承认，这将带来许多困难，而且不管怎样，农业工人将要负担重新产生的为数不大的地租。事实上，签订的租佃合同将会是比较长期的，因此，就有足够的时间形成这种地租。这也是多数派反对少数派提出的耕种方法的论据之一，而且还指出，在这种条件下，不可能把不同的农业地区和地方的地租拉平。

此外，多数派还认为，把土地交给个人或合作社使用会对新的公有制造成危险。多数派认为，令人担心的是，一切合作社内的排他性的滋长和它们所固有的损害非社员利益的倾向的加强，会导致对土地公有制的新的掠夺，当最强大的权力工具即土地本身将经常掌握在这些合作社手中的时候，尤其是这样。在古代，掠夺土地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进行的。例如，在日耳曼人那里，土地每年都租给个人使用，结果一当国王和贵族的势力增长了或当时某种事件为掠夺土地造成了良好环境的时候，在一些地区内土地就逐渐变成了这些人或他们后代的财产。

把多数派各个成员关于耕种土地问题的所有意见全部列举出来会使我们的报告过分冗长。这里仅仅指出，这些观点都归结为一点：土地应当由团结一致的公社耕种或经营。

土地问题委员会一致建议代表大会通过以下决定：

代表大会声明，社会有权废除土地私有制并把土地变为公有财产。

96 它声明，这种改造是必要的。

关于耕种和使用土地的形式，有两种不同的意见相持不下：

- (1) 多数派认为，土地应当由统一的公社耕种和经营。
- (2) 少数派认为，社会应当把土地交给个体农民，特别是交给农业合作社使用，由社会收取租金。

多数派由下列
公民组成：
约·菲·贝克尔
科林
瓦尔兰
里廷豪森
扬纳什
列斯纳
鲁克拉夫特
散蒂尼昂

少数派有以下
公民：
德·巴普
比顿
朗格鲁瓦
缪拉
克列佐

委员会的一个委员赫斯主张重申布鲁塞尔代表大会的决议。

俄文译自《在巴塞尔召开的国际工人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简报》，1869年9月11日第5号。

工会问题委员会的报告

(报告人——潘迪)

这个问题*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

一方面——应当如何组织工会，以便准备未来并在可能的范围内保证今天；另一方面——我们的关于将来组织劳动的思想如何能帮助我们现在巩固工会。问题的这两方面是互相补充和互相确证的。

我们设想可能有两种组织劳动者的体制：首先——建立能

* 在关于代表大会的正式通知中（见本书第113页）以及在1869年布鲁塞尔出版的载有这个文件的汇编中，日程的这一项是这样表述的：“关于工会对工人阶级解放的作用”。——编者注

使一个地方的劳动者之间保持经常联系的地方组织，然后——建立包括几个地方、地区、省等等的组织。这是第一种体制。

这种组织体制是同现代社会中的政治关系相适应的，并且可以很好地代替它们；迄今为止，国际工人协会采用的就是这种体制。

要做到这一点，对工会来说，首先要把各地方分会联合起来，让这些分会用资金互相支援，组织讨论社会问题的会议，并共同采取普遍适用的措施。

但是随着工业的发展要求采取同第一种体制并存的第二种体制。

所有国家的工人都感觉到他们的利益是一致的，因为一个国家的工人常常被人们利用来压迫其它国家的工人。另一方面，将来要求建立这样的组织：它将越出城墙，不知道任何边界，在全世界范围内来分配劳动；根据这两种考虑，工会组织应当是国际性的，每一种行业都应当在全国范围内以及同其他国家建立通讯联系和交换情报，争取在还没有分会的地方建立新的分会，在一切有可能的地方和同一工种的工人同志协商采取一致行动，尽力建立象英国人已经建立的那种公共基金。这种组织体制将成为分散管理的一种因素，因为这里谈的不是在每一个国家中为一切工业部门建立一个共同的中心，而是每一个工业部门在它最发达的地区建立自己的中心；例如在法国，矿工联合会建立在圣太田，丝织工业的工人中心组织则建立在里昂，而制造奢侈品的工人组织则设立在巴黎。

如果实现了这两种组织体制，那么劳动将会为了现在和未来而组织起来，而雇佣劳动的消灭将以下述方式得到实现：由于每一行业的工作日到处缩短，劳动将均衡地分配，工人之间的竞争将消灭。如果把这种方法运用于一切行业，并且学徒的数目也由于实行自由和合理的统计的结果而有了限制，就有可能在一切行业中均衡地分配工人，防止工人聚集在一种行业中

而另一种行业中又缺少工人的现象，从而在实际上实现劳动权。

把各种工人团体按城市和地区组织起来还有一个优点：一切行业将轮流实行罢工，其他的行业支援罢工的行业，它将继续进行斗争，直到达到普遍的水平；工资的平等将预示着职能的平等。

此外，象第一种组织体制将组成未来的工人代表机关一样，第二种组织体制将组成未来的公社。各行业的联合委员会以及由它们的代表组成的委员会将代替政府，并调节劳动关系以代替政治。

最后，既然按城市和地区建立的组织已经存在，起码是部分地存在，我们建议通过以下决议：

“代表大会认为，所有工人都应当积极参加在一切行业中建立抵抗基金会的工作。

代表大会建议各支部、联合会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把这些团体将来建立的情况随时通知同一行业的其他团体，以便建立各行业的全国性联合会。99

这些联合会应当提供涉及它们工业部门的一切情报，指导实现具有普遍意义的措施，调节罢工，积极促进罢工获得胜利，以迎接自由生产者的联合代替雇佣劳动的日子。

此外，代表大会建议总委员会在需要的时候以联络员的身份把一切国家的工会联合起来”。

俄文译自《关于1869年9月在巴塞尔召开的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报告》，
1869年布鲁塞尔版。

综合教育问题委员会向代表大会 提出的决议草案

代表大会重申支持实行综合教育，认为每一个儿童有权获得完全的理论教育和实际教育，这种教育能使儿童同时成为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劳动者。

代表大会建议所有支部和全国性组织召开会议，以便着手研究科学、艺术和生产的一切问题。

俄文译自《平等报》1869年10月16日
第39号*

在代表大会上宣读的贺词

纽约德国工人联合总会的贺词

在巴塞尔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第四次年度代表大会。

虽然我们的经济状况不允许派自己的代表出席你们的大会，但是我们还是要越过海洋同你们兄弟般地握手，并同你们一起高兴地祝贺工人政党的原则在欧洲工人阶级中间越来越多地得到承认。

劳动者的斗争要取得胜利就必须成为普遍的斗争，这种意识在美国工人中间也日益加深。只有当我们的、在短期内取得了重大成就的组织充分集中化以后，那时（我们对这点深信不疑）同国际工人协会的联系将变得更加密切和持久。

曼彻斯特学派^①在这里的工人中几乎没有信徒。可是凯洛格货币制度^②的影响在一些工人中间却根深蒂固。根据这种制度，只有为美国所有的州发行统一的纸币并把地产分成小块地

^① 曼彻斯特学派是反映工业资产阶级利益的英国经济思想中的一派。这一派的拥护者，即自由贸易派，主张贸易自由，国家不得干涉经济生活和对工人阶级的无限制的剥削。自由贸易派的宣传中心是曼彻斯特，领导这一运动的是1838年组织反谷物法同盟的两个纺织厂厂主——科布顿和布莱特。——译者注

^② 凯洛格，爱德华（1790—1858）是美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著有《新的货币制度：保证劳动权和所有权以及保护社会免遭金融动荡的唯一手段》（1868年纽约版）等书。马克思说，凯洛格的著作和蒲鲁东等人的著作是“一路货色”。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 第149页。——译者注

段才能改善工业状况。不过，由于轮流执政的两个政党的大规模营私舞弊行为，这种制度的拥护者在日益减少。

我们希望，你们将同我们一起注意这个问题，并给我们以帮助，以便尽快达到我们的目的——牢固的团结。

祝你们的代表大会获得最好的成就；衷心同你们在一起。

德国工人联合总会

主席 副主席 通讯书记

康拉德·卡尔 塞巴斯蒂昂·布律涅耳 齐格弗里特·迈耶尔

1869年8月8日于纽约

俄文根据原件照相副本译出

(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①档案馆)

法国海员联合会的贺词

101 1869年9月2日马赛

法国海员联合会的会员向出席国际巴塞尔代表大会的各工人团体的代表致以敬礼和兄弟的问候！

公民们和兄弟们：

团结的感情应当把人剥削人的制度下受苦受难的所有无产者联合起来，我们深受这种感情的鼓舞，我们思想上和你们的会议在一起。

由于那些希望我们分离的人们在我们中间狡黠地散布可耻的成见，我们直到今天还是脱离其他工人的一种特殊工人。一个简单的标记把我们互相分开。

可是我们的命运是相同的，苦难和贫困——这就是我们的

① 现在称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译者注

共同命运；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的共同要求；我们把这个要求写在自己的旗帜上。

早该摧毁那些把我们分开的障碍了。从今以后，我们中间将不再有海员和工人之分，我们都是劳动者，我们已经受够了欺骗，我们追求一个共同的目的：确立正义。

祝永往直前！

代表法国海员联合会——委员会委员

（下面是签名）

俄文译自《1869年在巴塞尔召开的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1869年布鲁塞尔版。



附录

四

关于召开代表大会的通知

105

一

国际工人协会第四次年度代表大会将于1869年9月6日星期一在巴塞尔（瑞士）召开。代表大会将讨论下列问题：

- (1) 关于土地所有制问题；
- (2) 继承权；
- (3) 工人阶级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立即利用信贷；
- (4) 关于普及教育问题；
- (5) 工会对工人阶级解放的作用。

议事日程：(1) 审查代表资格；(2) 选举主席团；
(3) 总委员会的总结报告，以及各支部和分部的总结报告；
(4) 讨论列入议程的各项问题；(5) 决定下一年度总委员会的驻在地；(6) 选举总委员会委员；(7) 决定下次代表大会的时间和地点。

附注：对工人阶级状况的统计研究仍继续进行，请寄材料。

根据总委员会的委托：

主席 欧仁·杜邦
司库 考威尔·斯特普尼
总书记 约·格奥尔基·埃卡留斯

1869年6月22日于伦敦

海—霍尔波恩街256号

俄文译自1869年在伦敦出版的传单
《国际工人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

二

(一) 9月4日星期六和5日星期日，巴塞尔支部的成员（帽上有白色徽记）将在车站上欢迎各国代表。

(二) 星期六晚上八点钟将在民族餐厅举行各国代表同巴塞尔支部成员的非正式会见。

(三) 星期日上午将举行隆重的开幕式。各国代表和巴塞尔支部的成员将于二时整在代表大会的会场和入口处集合。然后一起去开庆祝会，地点将根据天气情况，稍后再定。大会程序如下：

1. 唱歌；
2. 巴塞尔联合会主席致欢迎词；
3. 各国代表讲话；
4. 返回代表大会会场，同参加庆祝会的各地方支部告别；
5. 举行晚会。

(四) 从6日星期一开始到11日举行代表大会会议，其中有一天下午休会，参观城市名胜古迹。

(五) 在整个代表大会举行期间，每天将在代表大会会场中举行晚会。

(六) 9月11日星期六晚上将举行代表大会隆重的闭幕式，闭幕后将举行聚餐。

(七) 9月12日星期日午后将到阿尔列斯海姆游览。

代表巴塞尔城和巴塞尔州各联合会支部委员会：

主席： 副主席： 书 记

布林安 弗洛姆莱 克利盖尔

1869年8月15日于巴塞尔

俄文译自《国际报》1869年8月29日第33号

卡·马克思 比利时的屠杀

107

|
112

卡·马克思 致合众国全国劳工 同盟的公开信

113

—
115

116

《蜂房报》关于总委员会 会议的报道摘录

116

一

总委员会1869年6月15日会议

……常设委员会受委托拟定即将举行的代表大会的议事日程并于下星期二（1869年6月22日）提交总委员会。

1869年6月19日《蜂房报》

二

总委员会1869年6月29日会议

……讨论列入这次代表大会议事日程的问题，讨论开始时介绍了重新提出讨论第一个问题即土地所有制问题的理由，因为上一次代表大会已经通过了关于这个问题的决议。在上一次代表大会上有二十一—三十个代表不仅在表决时弃权，而且声明，他们遭到了突然袭击，问题没有得到全面讨论。因此，有必要重新研究这个问题，或者重申上一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或者反对土地国有化的少数派提出的论据能够动摇多数派的信念，那就用另一个决议来代替它。下星期四将恢复讨论；提出了一项建议：重申上一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我们提醒大家，这个决议主张把土地变为公有财产，并根据合同把土地交给工人

• 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的档案馆中没有关于总委员这几次会议的记录原本。——编者注

合作社共同耕种。

1869年7月3日《蜂房报》

117

三

总委员会1869年7月6日会议

……讨论土地问题，一开始就建议重申上一次代表大会关于把土地变为国家财产的决议，但是要补充一些能保护每一个人在他国内使用一定份额土地的抽象权利和自然权利。提这个建议的人指出，土地是自然界的礼物，这是所有的人都承认的，总委员会一致批准了把土地转为公有财产的建议，但是表达这个要求的措词必须比上一次代表大会更为坚决。决议中说，这种转变是由社会必要性决定的。为了促使人们行动起来，这个论据是不充分的。大家承认，每个人有权生存，但是还必须承认每个人有获得生存手段的权利，生存手段就是土地，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是把土地变为国家财产。为了论证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还指出，谁也不反对把矿山和森林变为国家财产；地产集中在少数人手中所产生的害处也是大家承认的，但只是就英国而言。在可耕地问题上产生了争论，反对意见是由代表私有者农民思想的小农场的拥护者提出的。同抽象权利和自然权利的要求相比，社会必要性是对土地转为公有财产的必要性的更好的论证。动物也对土地有自然权利，因为没有土地它就无法生存。从对土地的自然权利可以得出结论：每个人应当自己耕种自己的一份土地。提建议的人回答说，社会必要性，他们已经证明了，但是解决问题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在英国，由议会通过一项法令就可以在几天内把土地国有化；在法国，要做到这点就需要好多年。大家都同意应当改变决议的性质，但是没有通过任何决定。辩论推延到下星期二。

118

1869年7月10日《蜂房报》

118

四

总委员会1869年7月13日会议

……恢复了关于土地问题的热烈辩论，但是谁也不反对土地国有化，——相反地，各个发言人都指出了现代制度所产生的害处。唯一的争论问题是，应当根据自然权利还是根据社会必要性要求实行土地国有化。辩论的结果，建议会议对两种权利都予以支持，委托常设委员会重新修改决议案。在举行表决时，双方票数相等，主席的一票具有决定意义，他赞成社会必要性。下星期二将讨论继承权问题。

1869年7月17日《蜂房报》

五

总委员会1869年7月20日会议

总委员会会议在上星期二举行。主席是鲁克拉夫特先生。在讨论“继承权”问题时，马克思博士首先发言^①。他指出，这个问题是由日内瓦分部提出的，总委员会同意进行讨论。在普鲁士可以继承的只是自己的一部分数量不大的财产，但是英国的继承法纯粹是无稽之谈。在英国，人们具有遗赠自己财产，甚至剥夺自己子孙继承权的无限权利，并且可以提出这样一些条件，根据这些条件，死者在死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仍然是实际的主人。一般地讲，工人没有东西可以继承，所以他对废除这种舞弊不感兴趣。这件事应当让资产阶级去处理，它可以利用它来反对贵族。

^① 马克思这次发言的正式记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650—653页。——译者注

119 人们期望通过废除继承权为向公有制的过渡奠定基础；但是，一个想要废除继承权并且拥有足够力量这样做的议会，同样也可以实行剥夺。如果颁布一项法律，命令一切租佃农场主向国库缴纳地租，而不向土地所有者缴纳，这项法律就会立刻发生作用，并给政府提供货币资金，可是废除土地继承权的法律只会对将来具有意义并会带来害处。协会的目的是要使劳动资料社会化。当每个人都保证有取得劳动资料的权利的时候，关于继承的法律就会自动失效。

米尔纳先生认为，当人们看到大多数人无依无靠并受一小撮人压迫的时候，对继承权产生怀疑是十分自然的。他们终究会宣布自己有利用劳动工具的权利。

黑尔斯先生声明，个别人在死后很长时期内支配自己财产的权利会危害活人，应当废除。他举例说明，怎样同教养机关勾结来查封财产。

韦斯顿先生认为，应当谴责为不劳而获创造条件的任何转分财产的行为。

讨论推延到下星期二。

1869年7月24日《蜂房报》

六

总委员会1869年7月27日会议

总委员会在7月27日举行了会议。鲁克拉夫特先生担任主席。宣读了总委员会委员阿里夫列得·阿·华尔顿的一封信，
120 他建议不要用一种论据来论证土地国有化，而要同时既用自然权利又用社会权利及其他权利来论证。

……许多巴黎工会决定派代表出席代表大会。由于必须解决迫切的组织问题，从会议程序中取消了对列入代表大会议事日程问题的讨论；讨论将在下一次会议上恢复。

国际工人协会第四次年度代表大会将于1869年9月6日在巴塞尔（瑞士）开幕。需要在代表大会上讨论的有以下问题：

- （1）关于土地所有制问题；（2）继承权；（3）工人阶级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立即利用信贷；（4）关于普及教育问题；
（5）工会对工人阶级解放的作用。

1869年7月31日《蜂房报》

七

总委员会1869年8月3日会议

……总委员通过决议，建议大陆上各国的书记提醒自己的国外通讯员注意，根据章程第8条的规定，“只有向总委员会缴纳会费的支部和分部的代表才能参加代表大会的工作”，布鲁塞尔代表大会曾决定贯彻这一原则。

……对继承权问题讨论的结果，批准了一篇总结报告，对于准备向代表大会提出的决议案作出说明。为了加速讨论列入代表大会议事日程的其他问题，决定在星期六即在8月14、21和28日召开三次专门会议；教育问题将在信贷问题之前讨论；教育问题将在8月10日星期二讨论；会议将于晚上八点钟准时开始；日程上的其余问题将在星期二和星期六晚上研究。

1869年8月7日《蜂房报》

八

121

总委员会1869年8月10日会议

……德国书记〔马克思〕通知说，他收到了德国的一个工人代表大会的电报，其中说，根据国际工人协会的纲领原则建立了社会民主党，它将派代表出席巴塞尔代表大会。

关于教育问题，埃卡留斯先生建议坚持日内瓦代表大会关

121

于教育的含义和内容的决议。因此，问题归结为，要确定究竟应当由谁来关心儿童的教育和应当由谁来支付教育经费。前两次代表大会（特别是法国人，曾强烈表示，不希望把教育儿童的事情委托给国家；他认为主要因为这一点，前几次代表大会没有通过任何决议。

马克思先生声明，在前几次代表大会上以那种形式提出的问题无非是国家教育的拥护者之间的争论，而且把国家教育问题同政府教育混为一谈。为了证明是否可以顺利地建立一种国家的而同时又不是政府的教育制度，他详细介绍了美国的情况；他认为上学应当是义务，在国立学校中不应当教授宗教课，应当任命政府视察员来考察学校和监督学校行政当局对义务执行的情况。现在在美国仅仅做到了使每个市政局把应当关心学校视为一种义务；为学校纳税是义务，但儿童上学却不是应尽的义务。普鲁士的国民教育制度是为了培养好士兵，而不是好公民。

米尔纳先生认为，不能使工人了解他的劳动价值，不能使
122 工人得到任何职业训练的教育纲领，不能认为是好的教育纲领。哈里斯先生同意这个意见。

根据柴克先生的建议，辩论延迟到8月14日星期六。

1869年8月14日《蜂房报》

9月14日会议记录

出席会议的有〔总委员会〕委员：阿普耳加思、布恩、柯恩、杜邦、埃卡留斯、弗列泽、黑尔斯、哈里斯、荣克、拉法格、列斯纳、鲁克拉夫特、莫里斯、米尔纳、奥哲尔和韦斯顿。[•]出席会议的还有从芝加哥来的美国全国劳工同盟的代表凯麦隆先生。

一致选举凯麦隆先生为主席。

宣读和批准了上一次会议的记录。

埃卡留斯建议推迟研究函件，以听取代表大会代表的报告。

建议被通过。

然后主席请公民荣克发言。

荣克：我的报告将很短。我们于星期六晚上到达，曾受到在车站上等候我们的人的欢迎。星期日早晨举行了预备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任命了一个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一些人希望代表大会就在当天开幕，但是他们的建议没有被接受。下午，我们到城外去，并打着旗帜唱着歌举行了游行；巴塞尔及其郊区的工会参加了游行。代表们在大啤酒酒店的院子里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会，有几个人在欢迎会上发表了讲话，然后我们回到了城里。星期一早晨对六十多个代表的资格进行了审查，然后巴塞尔支部的主席致了开幕词，选出了大会负责人。我被选为主

• 马克思因去德国而没有出席这次会议（参看本书第141—142页拉法格给马克思的信）——编者注

席。代表非常多，其中大多数都是名符其实的代表。这一次的代表性比往常要充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我们中间也有 124 美国代表出席。乍看起来，代表大会做的工作不多，因为我们只讨论了三个问题。我们开会的时间是：从上午九点到中午十二点和从下午四点到晚上六点。从星期三开始我们还在晚上八点到十一点举行会议。制定议事规则花去了许多时间，但是它将使以后的代表大会节省时间。在接待代表和为代表安排住所以及代表大会会议的准备工作，都做得很好。从日内瓦代表大会以来有了很大的进步。在日内瓦，德国人坐在一个角落，法国人坐在另一个角落，代表们来往起来也象法国人和德国人那样拘束。在巴塞尔则没有这种情况。来大会采访的报界代表很广泛。派记者的不仅有巴黎的各家报纸，而且有外省的报纸。他们关于我们说了些什么，你们比我知道得更清楚。巴黎的各团体都派有代表出席。在巴黎委员会被查封以后，巴黎工人非常踊跃地加入协会。当向代表们提出会费问题时，他们通知说，收钱很困难。无论在什么会议上，只要一提到国际，会议就立即被解散。我问他们是怎么募集钱派代表的。他们回答说，为了筹款，他们不得不跑遍各工厂。于是我就说，他们是不是也可以采用同样的方法为总委员募集会费。他们答应以后缴纳会费。最重要的决议是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去年赞成决议的有三十四个人，反对的有六个人，弃权的有二十三个人。今年赞成决议的有五十四个人，反对的有四个人，弃权的有十三个人。没有提出任何新的论据。

在归途中，我们在巴黎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印刷工人协会在自己的合作工厂里欢迎了我们。大多数巴黎工人拥护土地公有制。投反对票的代表不反映〔巴黎工人的〕真正意见。缪拉如果不是因他参加国际而坐牢，是不会当选的。托伦不得不从马赛面包工人那里给自己弄到委托书，而舍马莱的情绪显然 125 有些沮丧。关于信贷问题，舍马莱指出，实行公有制就不需要任

何信贷了。

阿普耳加思：我只能证明上面所讲的都是事实。我参加了工会问题委员会，但是未能做到使别人采纳我的意见。我曾想证明，依靠工会可以达到什么。我提出了几个决议案，但是由于时间不够没有讨论。美国代表的出席使我非常高兴。主要问题是土地问题。有趣的是，《泰晤士报》相信我们的健康思想，希望我们投票反对。可是刊登在这家报纸上的发言却导致相反的结论。可惜没有讨论教育问题。我希望美国代表的出席将加强美国工人阶级和我们之间的紧密团结和互相来往。埃卡留斯就发表总结报告的问题给几家报纸写了信，但没有得到回答，我知道这个情况后就给《设菲尔德独立报》写了篇报道，这家报纸发表了我寄去的材料。根据我读到的材料来看，发言人的总的语调比前几次代表大会好。

鲁克拉夫特：我并不象荣克那样满意。许多时间浪费了。总委员会应当起草关于一切问题的决议案。准备工作和起草报告花去了三天时间。我对这点不满意。但是我感到高兴的是，代表们都听从主席。荣克忘了说，在巴黎，合作社员为我们举行了宴会。在印刷工人的房子里放了一张长桌，每边坐了近五十个人。罢工使他们产生了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工作的想法，他们做到了这一点。总的来讲，我可以说，我象其余的人一样对代表大会是满意的。

阿普耳加思：以后举行代表大会时，我们应当给我们的秘书准备真正的记录簿，决议应当由专门的译员来翻译。在代表大会结束后我到苏黎世去了一趟，关于在资金有限的情况下，在教育和合作事业方面能做些什么事情这个问题，我在那里了解到的东西要比所有的蓝皮书所提供的东西还要多。¹²⁶

列斯纳：除了代表大会的会议以外，还在晚上举行会议，每天晚上都有人发表讲话。埃卡留斯作了讲演，我和其他人也发了言；在那里进行了大量的宣传工作。做长篇报告等现象，

现在已经没有了。我赞成总委员会应当事前准备好决议案。我们应当有非代表的专职翻译和记录。我们应当给他们发薪金。

埃卡留斯：在前几次代表大会上我们曾竭力避免做长篇总结报告和发言，但没有做到。现在这已经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了。以前不同意的人现在也这样做了。我们也改进了各专门委员会的工作。我仅仅补充一点：晚上会议和代表大会的会议一样，起了很大的精神影响。在其余代表离开了以后，我了解到民族餐厅是那些在九个月前想消灭我们协会的巴塞尔工厂主聚会的地方。他们听了我们的所有言论，我不怀疑他们已经相信，要对付我们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同我们所有的人都密切有关的是，原来的总委员会委员全部重新当选。荣克说，这次代表大会上一点也没有前几次代表大会上那种混乱现象。有人专门翻译决议案。如果由总委员会把译文准备好，就不必在代表大会上翻译了。

阿普耳加思：我希望免除这些人的这种义务，因为他们除了翻译外还要做其他工作。

接着主席发言。

主席〔凯麦隆〕：我没有准备发言。我出席这个会议证明，我们希望同你们建立更密切的联系。社会上只有两个阶级——掠夺者和被掠夺者。劳动最多的人常常得到的却是贫困和
127 坟墓，而无所事事的人却应有尽有。为了消除阶级的立法，我们摆脱了旧的党派的桎梏。我们想要实行有利于全体人民的法律。我们有金融贵族，你们有世袭贵族，而我们的贵族是两者中最坏的。我希望你们制定一个协调移民的计划，使离开这里的工联成员，在来到美国以后能立即加入我们的行列，一起进行斗争。资本家在全欧洲都有自己的代理人。他们的目的是为了使美国工人受压迫，使他们的劳动降低价值。每当发生了什么冲突，就威胁说要从旧大陆运进工人。宾夕法尼亚的矿工昼夜不停地劳动，一星期只得到十四美元，在差不多七个月中就

开采出够全年用的煤；一年中的其余时间他们不是闲着没有活干，就是干工资很低的活。最后，他们再也不能容忍这种状况了，要求缩短工作日。由于报刊处于资本家的监督下，因此社会舆论反对工人。但是，在我们举行代表大会的时候，报刊是可以利用的，那时可以向广大公众报道矿工的状况。现在事情发生了新的变化。当我在利物浦登岸后，我首先看到了这样一些传单，上面写着：“给矿工大幅度增加工资——每周工资十八元到二十元”。我仔细一看，在传单上签名的正是那些残酷剥削宾夕法尼亚工人的强盗。此外，还实行一种可耻的制度——不给工人发现金。矿场和工厂附近的土地全归公司所有，它们不许别人在那里经商。他们用只能在他们商店里买东西的信用券给工人发工资，在别的地方只值六七角钱的东西在他们的商店就卖一元。在别的商店购买东西或者揭露这种骗局的每一个工人都要受到惩罚，如果工人起来反对这种制度，他们就受到威胁，说要从欧洲输入工人。现在发生冲突时我们可以给你们打电报，你们在这里向工人宣读，让他们不要上资本家的圈套。
128
资本家将被迫做出让步。

黑尔斯建议仍然选举埃卡留斯为总书记。

建议被通过。

阿普耳加思建议仍然选举原有的书记。

建议被通过。

阿普耳加思还建议再次选斯特普尼为司库。

建议被通过。

他还建议指定一个专门委员会来研究凯麦隆的建议。

建议被通过。

被指定的专门委员会成员如下：阿普耳加思、杜邦、埃卡留斯、黑尔斯、哈里斯、荣克、柯恩、拉法格、列斯纳、马克思、米尔纳、奥哲尔。

然后总委员会会议闭会。

主席 罗·阿普耳加思
书记 约·格奥尔格·埃卡留斯
俄文是按照相复制品译的
(藏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档案馆)

马克思和恩格斯书信摘录^①

129
—
143

① 详见本书目录。——译者注

144 德·巴普、荣克、李卜克内西、列斯纳
和拉法格致马克思的信

1

塞·德·巴普致卡·马克思

1869年5月31日于布鲁塞尔

至于总委员会的宣言^①，您大概已经看出来了，我们在翻译时稍微改动了两个地方。我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谈到皮尔美先生和弗兰德伯爵的地方，以及讲到大臣们把国家出卖给了法国政府的地方，会使我们遭到追查。希望您不要对这种改变作别的解释，因为这种改变是必要的；当然，我们应当事先写信告诉您，但这会延误宣言的出版时间。

我们以比利时各支部的名义建议（尽管已经很迟了）给巴塞尔代表大会的日程中增加两个问题；我们更早地提出建议是有困难的，因为只是在本月17—18日比利时各支部的代表大会上才决定提出这个建议。这两个问题如下：

一、将来组织公裁决。

二、建立互助储金会、储金会联合会和组织保险事业。

此外，比利时各支部代表大会决定支持英国各支部，如果它们真正（人们这样转告我们）建议把以下问题列入巴塞尔代

① 指马克思《比利时的屠杀》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译者注

表大会的议程：通过合作社把工业劳动和农业劳动结合起来。

第一次发表

俄文是按原件译的

（藏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

研究院档案馆）

2

145

塞·德·巴普致卡·马克思

1869年6月9日于布鲁塞尔

我们在布鲁塞尔支部开始讨论列入巴塞尔代表大会议程的问题，以便对其中每个问题都能提出一个报告。希望伦敦的中央委员会或英国的支部（或两者分别提出）也能在今年就议程的每一个问题提出报告。特别是关于土地所有制问题，我希望您或者以伦敦德国人支部的名义，或者以不列颠各支部的名义，对这个重要问题提出一个完善的、论据充分的报告。尽管您在不断努力写您的巨著《资本论》，正如您告诉我的，这个工作曾妨碍您为布鲁塞尔代表大会准备关于所有制问题的报告，我还是希望，您在今年能找出时间来做这件事。我知道，个体农业的拥护者、蒲鲁东的追随者也想向巴塞尔代表大会提出报告，一个报告出于巴黎人的手笔，另一个报告是由布鲁塞尔的蒲鲁东主义者起草的，在这些报告中将论证土地私有制的必要性（就象死后出版的蒲鲁东著作《所有制理论》中所论证的那样），从科学和哲学形式来看，这两个报告将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个人主义者想对布鲁塞尔代表大会的决定进行报复，我很担心，如果这一次集体主义者将仅仅得到布鲁塞尔和鲁昂报告的支持，代表大会将遭到突然袭击，并放弃在布鲁塞尔批准

的结论①。

第一次发表

俄文是按原件译的

(藏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
研究院档案馆)

3

海·荣克致卡·马克思

1869年8月12日于伦敦

亲爱的马克思！

我昨天晚上看见了阿普耳加思，他希望我出席他们执行委员会在今天晚上召开的会议，以便向他们建议派代表到巴塞尔去。¹⁴⁶我答应尽力协助；我认为，如果不事先同总委员会或者哪怕同它的几个委员讨论一下这个问题，我无权代表我们的〔总〕委员会就这个问题发表意见，因为我将以他们的名义而不是以我个人的名义到那里去；您的意见如何？我要不要去？请把关于这个问题的意见在晚上以前写信告诉我：您能否同我一起去？

在没有得到回答以前，我对这件事不采取任何步骤，但不要忘记，在这个月里，这是细木工和木匠工联执行委员会的最后一次会议，如果他们今天晚上不选出代表，那就根本不选了。

向马克思夫人和全家转致问候

始终是你的海·荣克

第一次发表

① 指布鲁塞尔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废除私有制的决议。——译者注

俄文是按原件译的
(藏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
研究院档案馆)

4

弗·列斯纳致卡·马克思

1869年9月6日于巴塞尔民族餐厅

亲爱的马克思！

我现在才能坐下来给你写信。这里混乱不堪，拼命追逐名利，简直不知道从何谈起。巴枯宁和他的保镖们到处在搞阴谋。布鲁塞尔人也在搞阴谋，好象也在反对李卜克内西。维也纳的诺马耶看来在反对李卜克内西和奥伯温德。此外，还有两个西班牙代表也起哄反对李卜克内西，等等。

资产阶级的创世主戈克也在这里，他是《背囊报》派的一个瑞士工人协会的代表。但是，李卜克内西好象对他们非常满意。倍倍尔打电报来，说他不能出席。荣克是主席，贝克尔和布里斯美是副主席，莫·赫斯、李卜克内西和施皮尔是德语秘书，瓦尔兰、奥布里和罗伯尔是法语秘书，埃卡留斯是英语秘书。¹⁴⁷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英国记者。这正好，因为阿普耳加思已经对法国人辩论的方式感到惊讶。法国人到现在为止似乎还占有优势，但这很快就会结束：因为有的德国人大概还没有来。

托伦和弗里布尔以记者的身份出席。吹牛家舍马莱也在这里，还有莫·赫斯和科伦的里廷豪森。朋友埃卡留斯完全忙于炫耀自己。他问每一个外国人是否听到过埃卡留斯。有一次他问道：你们那里听到过关于埃卡留斯的什么消息吗？

刚才得知，有一个英国记者出席，好象是《晨星报》派来

的。当我向埃卡留斯询问此事时，他发火了，大声呵斥我，并声明他什么也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昨天奏着音乐打着旗帜举行了环城游行；这次游行看来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接着发表了各种各样的演说，我们大家都参加了，然后举行了音乐晚会，一般说来，大家的情绪很好。

我接到通知，说资产阶级非常痛恨我们，警察被叫来保护我们。

亲爱的马克思，至今还没有收到总结报告。现在是下午两点钟。

下次再谈。

你的朋友弗·列斯纳

向你全家致衷心问候

第一次发表

俄文是按照相复制品译的

(藏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
研究院档案馆)

5

弗·列斯纳致卡·马克思

1869年9月7日于巴塞尔民族餐厅

亲爱的马克思！

这里昨天晚上十点左右收到了总委员会的总结报告。我及时从荣克那里拿到了德译文，并立即进行研究。但是，我今天早晨惊奇地发现，报告把埃卡留斯先生迷住了，他看到总结报告写得那样好，就不忍释手了。当我向他要总结报告时，他对我说，需要给主席团的一个成员读总结报告。他利用一切机会来摆架子。

昨天下午关于苏黎世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巴枯宁仍然表示厌恶一切政治行动。但是李卜克内西、里廷豪森及其他人都很好地收拾了他；还在上午会议以后，他象一头野狮子一样咆哮起来。大多数法国人都反对他。巴枯宁显然什么也没有得到，而他的行为不是很讨人喜欢的。看来大多数布鲁塞尔人都同意巴枯宁的观点。这是些糟糕透顶的空谈家，今年他们似乎更坏了，巴黎人也是这样。舍马莱使出了自己的全部本领来证明自己的巨大意义；在他看来，信贷问题是最大的、最有意义的和最重要的问题；舍马莱昨天就这个问题大吵大嚷。希望过几天他就无话可说了。托伦想当代表，可是巴黎人反对；问题交给资格审查委员会处理。此外，收到了日内瓦中央委员会反对戈克的信。

开会情况象布鲁塞尔代表大会一样：早晨从九点到十二点，讨论组织问题。这些会议除代表外，任何人不能参加。

下午，从两点到六点，进行辩论。

阿普耳加思通知我，尽管记者不是由《晨星报》直接派来的，但是他把通讯报道既寄给了《晨星报》，也寄给了《派尔-麦尔新闻》。他不能始终留在这里，但是我听说，他就这个问题已同阿普耳加思谈妥了。名单准备好后，我就立即给你寄来。

李卜克内西好象支持戈克，而菲·贝克尔则支持巴枯宁，所以在这个问题上还会有很大的争论。

巴枯宁把自己人组成了一个委员会，李卜克内西也这样做，因此我们的处境很尴尬：李卜克内西要我们反对巴枯宁，¹⁴⁹而贝克尔则要我们反对戈克。请尽快将你自己对这个问题的意见告诉我。

你的缺席对我们是最大的损失；多数人还希望你来，虽然我从一开始就告诉他们，你身体很不好，而且还忙于总委员会的工作等等。否则的话，巴枯宁、戈克之流是不敢强一句嘴的。

今天早晨就各种问题以及代表大会关于各次会议的报告展开了争论。法国人想承担这个报告的出版任务，可能是为了抬高自己。多数人似乎同意让他们出版。我表示反对，并援引组织条例，建议他们筹集款项，让总委员会出版完备准确的正式报告。

刚才决定接受法国人出版报告的建议，但有一个条件：这个报告将不是正式的，并且必须事先把它交给有三个法语秘书即瓦尔兰、罗伯尔和奥布里参加的委员会审查。

其次，决定将一切文件交给将要选出的总委员会，接着决定取消主席这个职位。

今天下午可能要宣读总委员会的总结报告。

刚才得知，从巴黎收到了允许托伦出席的决定，因为据说，若不这样就会为把别的一些人也开除出去提供借口。

该停笔了，因为我简直没有一点安静的时候，一会儿英国人进来并提出各种问题，一会儿德国人来找等等。

下次再谈

你的朋友弗·列斯纳

请把关于教育问题和关于继承问题的决议草案寄来！

第一次发表

俄文是按照相复制品译的

(藏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
研究院档案馆)

威·李卜克内西致卡·马克思

〔1869年9月7日星期二于巴塞尔〕

亲爱的摩尔！

这里事情进行得很顺利。想扮演施韦泽那种角色的巴枯

宁，我们是能对付的。会员证问题无疑将会按照我们的精神加以解决。我不向日内瓦集团即巴枯宁屈服。

英国人、德国人和法国人以及日内瓦人和比利时人（后者是些不可救药的糊涂虫，我担心他们多少被收买了）将一起投票赞成伦敦为总委员会的驻在地。

你什么时候到德国来？你应当和我们这里做领导工作的人保持联系。

向你和家里人问好

你的图书馆

第一次发表

俄文是按原件译的

（藏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
研究院档案馆）

7

弗·列斯纳致卡·马克思

1869年9月8日于巴塞尔民族餐厅

亲爱的马克思！

昨天上午，拉绍德封的罗伯尔用法语宣读了总委员会的总结报告，李卜克内西用德语宣读。宣读经常被暴风雨般的掌声打断。法国人看来对总结报告很满意，而德国人也非常满意，并立即把报告送去付印，过几天就可以印好。

然后李卜克内西做了关于德国情况的报告，他用全力来反对施韦泽；他取得了很大成功。接着施皮尔就施韦泽和霍夫施泰因问题做了一个很有趣的说明。里昂的报告人做了非常好的报告。接着，巴塞罗纳的代表发言，他的发言经常被欢呼声打断。

151 戈克的发言充满空泛的词藻，他的发言不时地被打断，最后不得不坐到自己的位子上去。

昨天晚上举行了关于巴枯宁和李卜克内西问题的仲裁会议。贝克尔拿出了巴〔枯宁〕和一个叫维尔海麦尔的人给他的信件，从这些信件可以看出，李卜克内西称巴枯宁为俄国的间谍等等。但是李卜克内西否认这一切，并指出，这“不是他的看法，而仅仅是报纸上刊登的东西，因此他没有必要去否认”；他顺利地摆脱了窘境。

看来贝克尔完全被巴〔枯宁〕迷惑住了。

会没有开完我就离开了，今天得知，他们已言归于好。

伯尔尼的《联邦报》说，巴〔枯宁〕弄不到代表证，似乎由于这个原因他不得不去意大利；但是这种说法不正确；我得到的消息说，他有那不勒斯和里昂的代表证。托伦持的是马赛的代表证。

昨天晚上各种问题的委员会都在开会，象往常一样，这一次也是很多喧嚣，混乱，很少成效。

里廷豪森大吵大嚷，他仍然想充当调停人。

日内瓦人对戈克的指责被转交给德国代表处理，所以我们单独开一次会；希望我们能抛开他。昨天晚上我同他发生非常激烈的争论，李卜克内西在场，看来他和他关系很好。

因此，事情将闹到很不愉快的地步。我不理解，为什么李卜克内西对这个戈克采取这种态度。当我向他提出这个问题时，他回答说，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是可以改变的等等。

今天下午将讨论土地问题，同样会有许多争论。

兰……* 也是昨天下午来的，还有洛克尔的吉约姆及其他许多人，我至今还不知道他们的名字。

刚才荣克通知我，他收到了你寄来的东西，他非常高兴，

* 原稿不清楚——。编者注

他说，现在我们全副武装起来了。他请我转告你，他和赫斯昨天晚上在继承权问题委员会会议上好好地收拾了巴枯宁，并迫使他闭口。152

该搁笔了，马上又要开会了。下次再谈。

向大家致友好的问候。

弗里德里希·列斯纳

第一次发表

俄文是按照相复制品译的
(藏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
研究院档案馆)

8

弗·列斯纳致卡·马克思

1869年9月9日〔—10日〕于巴塞尔民族餐厅

亲爱的马克思！

荣克让我转告你，事情进行得非常顺利，他坚信，一切将能按我们的精神进行。到现在为止他非常满意。但是我暂时还不满意；一切都应当做得更好，我才会感到满意。一半时间已经过去了，而我们甚至还没有讨论到〔议程上的〕问题。

有两次会议完全用来听报告，除了少数例外，都是重复总委员总结报告中的东西，而总结报告中讲的要比它们好二十倍。

但是，通过了一项今后代表大会的规则，按这个规则将大大避免浪费时间，这也是一种补尝吧；总算学会了一点东西。阿普耳加思做了一个很好的报告，尽管工联主义味道还很浓。

戈克引起了一场大吵嚷，因为，第一，他想用法语发言，第二，他讲了些片面的、瑞士民族主义的胡说八道。李卜克内

西的报告写得很好，获得了很大成功。维也纳的诺马耶也讲得不错，看来他是国际的坚决拥护者，但他对李卜克内西不大满意。

其次，可以告诉你的是，收到了巴塞罗纳、巴黎以及一些社团的许多贺信和贺电。

153 今天上午宣布，对戈克的指责“论据不足，因而不能剥夺他参加大会的权利”。我声明，我根本不同意这个决定，并请把这点写入记录，我的声明遭到激烈反对，而李卜克内西先生象发了疯似的。

因为很多时间已经过去了，而议程上的问题还没有讨论，所以开会的时间大大提前，晚上还增加一次会议，好让人们可以丧失更多的时间。

早晨五点。整个会议就土地问题进行了激烈争论；我们建议重申布鲁塞尔决议，并让反对者讲出自己的意见。但大多数人反对，因此，我们又开了一次会来听〔报告〕，开了另一次会来辩论。刚才舍马莱作了表演。当荣克提醒他十分钟发言时间已经用完了时，引起了一场喧哗。但是，这些先生们被迫退却，因为这条规定是他们自己帮着确定的。

我们的考威尔·斯特普尼提出了一些很中肯的意见。

傻瓜戈克这会儿正在高谈阔论，而荣克允许他继续吹下去。他吹了那么久，然后他还要把他所吹的全译成法语，结果引起了一场喧嚷，他被迫闭嘴。

鲁克拉夫特也是片面地看问题，但是荣克总说不错。

阿普耳加思向你问好，并让转告你，荣克简直做出了奇迹，把一切事情都办得很好，并叫我告诉你，如果我们的事业需要的话，他准备昼夜不停地发言。

今天上午对土地问题进行表决，我想如果有人投票反对的话，那也只是几个人。

荣克又让我向你致意，并让转告你，他没有时间给你写

信，让你别生气。的确，好好写信几乎不可能。会议刚一结束，又开始搞其他事情。

总的说来事情进行得比前几次代表大会要好。

看来，参加这次工人的代表大会是非常有益的，并将留下很好的印象。

到现在为止，出席的已有七十六个代表，但是还有新的代表不断地来。

我将把已印好的记录，即已准备好的那部分以及总委员会的总结报告立即给你寄来。

希望你收到这封信时身体已经康复；向库格曼医生致衷心问候，告诉他，他应该到这里来，而且你本来也不应当缺席。

致友好的问候

弗里德·列斯纳

星期五早晨九点

第一次发表

俄文是按照相复制品译的
(藏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
研究院档案馆)

9

弗·列斯纳致卡·马克思

1869年9月11日于巴塞尔民族餐厅

亲爱的马克思！

会议那样多，一个接着一个，几乎没有时间写任何东西。《芝加哥工人辩护报》派来了一个编辑，此事你已知晓，昨天上午《泰晤士报》给埃卡留斯写信，请他把报告寄去，并辩解说，因为有埃卡留斯给他们写稿，所以没有派记者来。

关于土地问题的表决结果如下：

赞成——五十四票， 反对——十三票， 弃权——四票，
缺席——四人。

关于继承权问题， 结果混乱。

今天上午讨论了罢工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也出现了很大混乱，许多人把这个问题看作是代表大会上的最重大的问题，因此很大一部分时间用来说就这个问题进行各种说教。朋友李卜克内西也倾向于把这个问题看作最重要的问题。
155

那不勒斯的一个意大利代表就这个问题发言，他描述了劳动者非常困难的境遇，他的发言非常成功。

巴黎的塔尔塔列用长篇大论的发言来消磨时间，布里斯美也是这样。

在各种长篇大论的发言后，我和阿普耳加思发言结束了这种状况。我驳斥了关于合作社的教条，我们不是为此召开代表大会的。

阿普耳加思提的决议案被通过。决议案我当然无法给你寄来，因为我自己至今还没有拿到。

就上述问题进行投票表决后，一个美国代表发言。

他的发言除了几点以外，感伤主义味道很浓。没有上帝他简直寸步难行。但总的说来对他的发言反应还不坏，这也是很自然的。他邀请大家参加应届美国代表大会，这一点得到热烈赞同。

刚刚提出了一个建议：把还没有讨论的问题转到下次代表大会讨论。

下次代表大会将于明年在巴黎举行，一致通过。

总委员会移到伦敦，或者更确切些说，留在伦敦。明天举行宴会。致友好的问候。

弗·列斯纳

第一次发表

俄文是按照相复制品译的
(藏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
研究院档案馆)

10

保·拉法格致卡·马克思

〔1869年9月中于伦敦〕

亲爱的马克思先生！

委员会于星期二〔1869年9月14日〕举行了会议：所有的代表都出席了，并向我们做了关于自己行动的报告*。荣克第一个发言。无需赘言，他象平常一样，兴奋得不能自己，只讲他自己所遇到的人和事。总的印象是：所有代表对于他们受到的接待、对代表大会工作的进程和他们在瑞士、法国、英国的观感，都非常满意。可怜虫杜邦对于没有到巴塞尔去感到非常遗憾。但是最有趣的是，美国代表凯麦隆出席了这次会议。他出生于苏格兰，个子不高，面部表情坚毅，甚至有些呆板，但是在他的平静外貌后面隐藏着一团烈火，只要他开始讲话，火马上就燃烧起来。他很健谈，是个很好的演说家。他的理论水平不高，只看到他直接碰到的事情。因此，他在代表大会上似乎投票赞成小所有制，虽然口头上他好象是同意吞掉一切；但是财产卡住了他的喉咙，因为他的父亲是一个州的地主，而他想在某个时候在他父亲的一块土地上种大白菜呢。但这暂时还不重要，他很积极，而在目前没有把自己的利益同工人阶级的利益分开，他现在是工人阶级的领袖之一。

他被选为会议主席，这使他的自尊心得到了满足。在荣克的长篇报告和其余的报告人发言之后，大家请凯麦隆发言。他

* 参看1869年9月14日总委员会会议记录，见本书第122—126页。

向我们朗诵了西尔维斯的信，但是把它压缩了，并稍微有些渲染；他的简短发言中有一处很好。他说：“现在有两类人：掠夺者和被掠夺者”。他发言结束时提出了他曾在代表大会上提出过的那个建议，即建立移民局；他认为这个局的职责是：每当它得到雇主邀请欧洲人的消息时，它就通知我们，让我们阻止他们离开，每当需要（这是经常发生的）熟练劳动时，它将告诉我们，我们就把移民送到指定地点。总之，凯麦隆想让我们调节移民，使其不致损害美国工人。有一件事我忘了告诉你，也许你已经知道，但这件事很典型，值得重复一下。美国的大工业家把他们工厂周围的土地攫为己有，在这些土地上为工人建筑住宅，禁止别的工业或商业企业在附近营业，好让他们自己为工人提供必需品——肉、衣服、糖等等。他们还不满足于用这种方法把工人掌握在自己手中，他们还发行了一种在他们商店里专门使用的特殊货币，并用这种货币给工人发工资。如果这些不幸的人想把这种货币换成金子或银行券，它们就不得不贬值百分之四十。在最近一次代表大会上揭露了这一事实，他们将为消灭这种骗人的制度而斗争。在结束对这次会议的介绍之前，我想给你谈谈哈里斯的一段插曲。当时选出了一个委员会来作关于移民问题的报告。荣克总想讨好所有的人，他建议由哈里斯来做；哈里斯刚一听到自己的名字，就一跃而起，讲了一大套；他一开始就说：“我应当告诉我们的朋友凯麦隆，我不是工联主义者。”从大厅的四面八方响起了不满的叫声。凯麦隆不知如何是好，愤怒的黑尔斯说：“我们和您的意见毫不相干”，但是哈里斯还是继续发言。当他讲完了时，凯麦隆讲话并回答他：“我知道，工联只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虽然如此，我应当说，没有一个聪明人、没有一个行动的人不是工联主义者”。哈里斯想反驳他，幸而他遭到反对，没有讲成。

凯麦隆惋惜未能见到您。他今天离开。我想送他一张您的照片，但我家里一张也没有。昨天，我和荣克、埃卡留斯和列斯

普尔加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预料他将是委员会的一个非常积极的成员。是把他您的报告送给设菲尔德报纸几乎全文发表的，他还为这家报纸写了关于代表大会的报道。阿普耳加思甚至比原来设想的要激进一些。《泰晤士报》曾在社论中断言：英国代表投票反对没收土地。阿普耳加思在委员会里驳斥了《泰晤士报》的这种错误说法，并补充说，如果他知道农民的困苦生活而持另一种意见，他会感到“自己是可耻的”。阿普耳加思又提出了移民问题；他认为，只有这才是迫使英国人支持我们的真正手段。甚至预见到利用这个移民局来赚钱的可能性。我们可以把它变成通讯局，并规定较低的薪俸，我们就能做到使许多人向我们提出申请。其次，凯麦隆答应给我们提供必要的情报，并说我们可以同土地转卖者签订合同，如果我们把移民送到他们那里去，他们会给我们一定的提成。无论如何，我们应立即按凯麦隆的意见来开始工作，即阻止欧洲人应雇主的要求到美国去。根据阿普耳加思的建议，我们决定，在关于代表大会的报道的小册子中应当宣布建立我们的移民局，工联在自己每月报告中一定要提到这点，这会帮助传播我们的影响和关于我们的消息。他向我们建议，如果可能的话，每月或每三个月印一份报道，并把它散发给所有的协会。

燕妮在她写的一封信中说，您将很难摆脱库格曼的盛情接待。我觉得，您有一个很好的藉口，因为，您非常有必要在日内回到伦敦。

施纳普斯病很重，我们的行期未定。向燕妮致友好的问候。握手。

保·拉法格

第一次发表

俄文是按原件译的

(藏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
研究院档案馆)

注　　释

1 许多资产阶级报纸，主要是法国的《费加罗报》、《号召报》，英国的《地球报》、《派尔-麦尔新闻》、《旗帜报》和瑞士的《日内瓦日报》、《洛桑日报》，对第一国际巴塞尔代表大会作了歪曲报道。——第23页。

2 参看总委员会向巴塞尔代表大会的报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360—365页。——第24页。

3 在纽约召开的全国劳工同盟第三次代表大会（1868年8月）通过了建立独立的工人阶级政党——工人改革党（Labour Reform party）的决定。后来这个党蜕变成一种小资产阶级选举团体。——第24页。

4 伯明翰工联代表会议于1869年8月23—28日举行。代表中有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华尔顿、克里默和奥哲尔。代表大会根据克里默的建议决定：“争取在全联合王国内把工作日限制为八小时”。华尔顿作了关于农业工人合作社的报告，希望消灭对土地的垄断，把“必要的资本和土地通过立法措施交给工人合作社”。在讨论过程中，克里默建议在不久后举行的代表大会上讨论土地问题。代表大会还通过决议，建议一切工人组织和工人参加国际。——第24页。

5 在英文本中这一条写得不太清楚。在布鲁塞尔用法文出版的报告中（1869年），这一条是这样写的：“代表大会将首先讨论伦敦总委员会提出的列入代表大会议事日程的五个问题，然后再讨论其他问题”。——第30页。

6 里沙尔引证1869年伦敦版的一个地方译得很不确切，同1869年在布鲁塞尔版中全文公布的赘词的文本差别很大（参看本书第108页）。——第32页。

7 1868年9月推翻波旁王朝，成立立宪王国，是西班牙资产阶级革命的一个阶段。——第35页。

8 指艾希霍夫的著作：《国际工人协会。它的建立、组织、社会政治活动和发展》，1868年柏林版。——第41页。

9 指1860年建立的木工和细木工工联，从1862年到1871年总书记是阿普耳加思。——第42页。

10 英国资产阶级不断控告工联，说它们“恐吓”和“挑唆”没有组织的工人。根据这种控告，1867年2月，政府成立了一个工联活动调查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作出结论：工联的活动应由法律来调节。1871年通过一项法律，允许工联合法存在，同时对它们的活动，特别是对罢工加以遏制。——第42页。

11 指第一国际布鲁塞尔代表大会（1868年9月6—13日）通过的关于所有制问题的决议（见本书第44—45页脚注）——第45页。

12 参看注4。——第58页。

13 在巴塞尔代表大会上宣读的总委员会关于继承权的报告是马克思起草的。在1869年7月20日和8月3日总委员会会议上，对继承权问题事先进行了讨论（见本书第117、119页）。——第60页。

14 在布鲁塞尔（1869年）出版的关于巴塞尔代表大会的报告中，介绍了代表大会代表就继承权问题表决的结果。对总委员会报告进行表决的情况如下：赞成——巴斯腾、戈克、里廷豪森、布鲁因、昆舍、阿普耳加思、埃卡留斯、斯特普尼、荣克、列斯纳、诺马耶、赫斯、莱森格尔、古特、格雷利希、李卜克内西、克利盖、凯麦隆、弗雷；反对——法尔加-佩利塞尔、罗班、德·巴普、布里斯美、奥布里、瓦尔兰、罗伯尔、托伦、多布尔、安斯、穆拉、潘迪、弗朗坎、亨格、布罗塞、弗洛凯、热叶、施维茨格贝尔、布尔索、乌其叶、比顿、巴枯宁、卡普卢索、朗格鲁瓦、里沙尔、巴利克斯、莫尼叶、福洛、德雷尔、舍马莱、吉约姆、斯塔克、扬纳什、乔治、马尔蒂诺、弗留诺、塔尔塔列，弃权——散蒂尼昂、兰德林、鲁塞尔、弗拉奥、莫兰、科林；缺席——杜朗、培列、格罗斯兰、克列佐、鲁克拉夫特、施皮尔、贝克尔、博尼、霍来特尔、舍勒、毕尔克利、魏尔格尔，因病未参加投票——奥伯温得。总共：十九票赞成，三十七票反对，六票弃权。建议被否决。

对专门委员会的报告进行投票结果如下：赞成——散蒂尼昂、法尔加-佩利塞尔、罗班、巴斯腾、布里斯美、瓦尔兰、罗伯尔、安斯、亨

格、布罗塞、弗洛凯、热叶、施维茨格贝尔、布鲁索、乌其叶、巴枯宁、卡普卢索、里沙尔、巴利克斯、莫尼叶、福洛、德雷尔、里廷豪森、吉约姆、列斯纳、诺马耶、科林、贝克尔、扬纳什、克利盖、乔治、马尔蒂诺；反对——奥布里、托伦、缪拉、潘迪、比顿、朗格鲁瓦、舍马莱、昆舍、阿普耳加思、埃卡留斯、斯特普尼、荣克、斯塔克、赫斯、莱森格尔、吉特、格雷利希、李卜克内西、弗留诺、塔尔塔列、魏格尔、凯麦隆、弗雷；弃权——德·巴普、兰德林、多布尔、杜朗、鲁塞尔、弗拉奥、莫兰、弗朗坎、格罗斯兰、克列佐、戈克、布鲁因、舍勒；缺席——培列、鲁克拉夫特、施皮尔、博尼、霍来特尔、毕尔克利；因病没有参加投票——奥伯温德。总共：三十二票赞成，二十三票反对，十三票弃权。建议被否决。

由于任何一个报告都没有获得绝对多数票，巴塞尔代表大会未就继承权问题作出任何决定。——第66页。

15 参看注10。——第72页。

16 第一国际布鲁塞尔代表大会（1868年9月6—13日）就罢工和工会问题通过决议，其中说：为了较顺利地举行罢工，建议成立工会，把它们在全国范围内和国际范围内联合起来，并把“广大无产阶级群众吸引到国际的队伍中来”。——第73页。

17 美国全国劳工同盟第五次代表大会于1870年8月15日在辛辛那提举行。大会通过以下决议：“全国劳工同盟宣布拥护国际工人协会的原则，并希望在最近期间加入上述协会”。——第79页。

18 马克思起草的第一国际章程和成立宣言，在1864年11月1日伦敦总委员会会议上被通过。1865年9月25—29日在伦敦举行的第一国际代表会议上，初步研究了以后在第一国际日内瓦代表大会上（1866年9月3—8日）讨论的一系列纲领性问题。日内瓦代表大会批准了最终章程。——第79页。

19 由于1870年7月14日普法战争开始，1870年未能举行第一国际代表大会。下一次即最后一次代表大会于1872年9月2—7日在海牙举行。——第81页。

索引^①

发言入索引

阿普耳加思 在开幕式上发言——第7页；谈英国工联活动情况——第35页；提出关于工会问题的决议案——第70页；就下届代表大会的地点问题发言——第76页。

埃卡留斯 在开幕式上发言——第6页；就土地问题发言——第39页；就土地问题发言——第51页；就下届代表大会的地点问题发言——第76页。

安斯 在开幕式上发言——第6页；做国际比利时中央委员会的报告——第26页；宣读国际布鲁塞尔支部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第41页；就土地问题发言——第50页；就工会问题发言——第66页；提出在巴黎召开下届代表大会的建议——第76页。

奥布里 代表国际鲁昂支部做关于土地问题的报告——第40页。

巴枯宁 就国际在奥地利的活动情况的报告发表声明——第35页；就土地问题发言——第47页；就继承权问题发言——第59—60页；就工会问题发言——第66页；就召开下届代表大会的地点问题发言——第76页。

巴斯腾 做关于国际佛尔维耶（比利时）支部的活动情况的报告——第29页；就召开下届代表大会的地点问题发言——第

① 索引中的页码系原书页码，亦即本书边码。——译者注

15页。

贝克尔 做关于国际在美国和德国的活动情况的报告——第33页；就土地问题发言。——第49页。

布里斯美 就土地问题发言——第53页；就工会问题发言——第68、69页。

布律安 在代表大会开幕式上讲话——第5页；就戈克的发言发表声明——第32页；就土地问题发言——第40页。

德·巴普 报告巴里纳什的罢工情况——第32页；代表国际布鲁塞尔支部做关于土地问题的报告——第40页；就继承权问题发言——第57页。

杜朗 就工会问题发言——第67页；代表巴黎工人联合会致贺词——第75页。

法尔加-佩利塞尔 做关于巴塞罗纳支部活动情况的报告——第30页；回答缪拉提出的关于巴塞罗纳罢工的问题——第33页。

弗拉奥 做巴黎大理石工人协会的总结报告——第34页；建议从议事日程上取消关于信贷和人民教育问题——第61页；就工会问题发言——第67页。

弗留诺 就土地问题发言——第53页；就工会问题发言——第68页。

弗洛凯 讲洛克尔国际支部的情况——第35页。

戈克 提出把直接人民立法问题列入代表大会议事日程的建议——第10页；做关于瑞士德国工人教育协会活动情况的报告——第29页；就土地问题发言——第42页。

格雷利希 就土地问题发言——第53页；就工会问题发言——第69页。

格罗斯兰 做国际日内瓦支部的报告——第33页；就工会问题发言——第70页。

吉特 做瑞士裁缝联合会中央委员会的报告——第29页。

- 亨格 做日内瓦支部关于土地问题的报告——第41页。
- 赫斯 就工会问题发言——第68页。
- 吉约姆 就继承权问题发言——第61页。
- 卡普卢索 做关于国际那不勒斯支部活动情况的报告——第33页；对土地问题决议提出补充意见——第53页；就工会问题发言——第65页。
- 凯麦隆 代表美国全国工人联合会致贺词——第72页。
- 昆舍 代表巴塞尔制带工人协会做报告——第34页。
- 朗格鲁瓦 就土地问题发言——第46页；就继承权问题发言——第61页。
- 李卜克内西 做关于国际德国支部活动情况的报告——第27页；就土地问题发言——第53页；就继承权问题发言——第64页；就召开下届代表大会的地点问题发言——第76页。
- 里沙尔 在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发言——第7页；做国际马赛支部的总结报告——第27页；代表国际里昂支部做关于土地问题的报告。——第39页；就土地问题发言——第39页；就继承权问题发言——第58页。
- 里廷豪森 在开幕式上的发言——第8页；就戈克的发言发表声明——第30页。
- 列斯纳 就土地问题发言——第49页；就工会问题发言——第70页。
- 鲁克拉夫特 就土地问题发言——第43页；就召开下届代表大会的地点问题发言——第76页。
- 罗班 做关于国际比利时支部活动情况的报告——第32页；就土地问题发言——第53页。
- 莫兰 就土地问题发言——第52页。
- 缪拉 对总委员会的报告提出具体修改意见——第26页；谈巴塞罗纳的罢工问题——第33页；就继承权问题发言——第59页；就工会问题发言——第68页。

- 诺马耶 做关于国际奥地利支部活动情况的报告——第34页。
- 帕利克斯 做关于里昂缫丝工人支部的报告——第29页。
- 培列 做关于日内瓦钟表工人状况的报告——第32页。
- 荣克 就戈克的发言发表声明——第30页；就会议程序问题发表声明——第72页；答谢凯麦隆的贺词——第74页；致代表大会闭幕词——第74页。
- 舍马莱 谈攻击国际的出版物问题——第31页；就讨论土地问题的程序问题发表声明——第39页；就土地问题发言——第57页；就工会问题发言——第65页。
- 施皮尔 对李卜克内西关于德国支部活动情况的报告提出补充——第29页；就会议程序问题发表声明——第39页。
- 施维茨格贝尔 做库尔特拉里州国际支部的总结报告——第29页；就戈克的发言发表声明——第30页。
- 斯特普尼 就土地问题发言——第42页。
- 塔尔塔列 就土地问题发言——第49页；就继承权问题发言——第61页；就工会问题发言——第69页。
- 托伦 就农业问题发言——第45页；就个人问题发表声明——第61页；就工会问题发言——第67页。
- 瓦尔兰 做关于巴黎支部活动情况的报告——第34页；就继承权问题发言——第59页。

人 名 索 引

A

阿普尔加思，罗伯特 (Applegarth, Robert 1834—1924) ——

英国木工，伦敦工联委员会的著名活动家，木工和细木工联合会总书记 (1862—1871)，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从1868年起)，巴塞尔代表大会 (1869) 的参加者。1871年拒绝在总委员会宣言《法兰西内战》上签名并退出国际。以后是工联的活动家，自由派工人政治家。——第7、26、35、70、71、76、78、89、90、112、115、123、124、125、127、139、140、145、146、147、148、153、155、158页。

埃尔，爱德华·约翰 (Eyre, Edward John 1815—1901) ——

从1864年起是牙买加英国总督；1865年10月残酷镇压牙买加黑人起义。——第109页。

埃卡留斯，约翰·格奥尔格 (Eccarius, Johann Georg 1818—1889) ——德国裁缝，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流亡伦敦，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书记 (1867—1871)，第一国际所有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的参加者，《泰晤士报》、《蜂房报》和其他报纸的通讯员；1872年附和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的《多数派》反对海牙代表大会 (1872) 的决议，参加对总委员会和马克思的诽谤运动。后来是工联运动的活动家。——第6、9、26、39、51、76、77、78、89、90、105、112、115、123、125、126、128、138、143、147、148、154页。

艾什巴赫，亨利希 (Eschbach, Heinrich) ——机械工人，苏黎世机械工人出席第一国际巴塞尔代表大会的代表。——第89页。

艾希霍夫，卡尔·威廉 (Eichhoff, Karl Wilhelm 1833—1895) ——
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五十年代末因在报刊上揭露施梯伯的密
探活动被审判；一些社会民主党刊物的编辑。——第34页。
安斯，欧仁 (Ans, Eugene 1839—1923)。——比利时蒲鲁东主
义者，后为巴枯宁主义者，第一国际比利时支部书记；布鲁
塞尔代表大会 (1868) 和巴塞尔代表大会 (1869) 的参加者
——第 6、26、41、50、66、68、71、78、90、141、143页。
奥伯温德，亨利希 (Oberwinder, Heinrich 1846—1914) ——
奥地利新闻工作者，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创始人之一，曾出
席德国社会民主党爱森纳赫代表大会 (1869)，《人民之声报》
编辑，第一国际维也纳支部成员；巴塞尔代表大会 (1869)
的参加者；后来成为改良主义者——第75、80、146页。
奥布里，艾米尔 (Aubry, Emile) ——法国排字工人，蒲鲁东
主义者，以后成为社会波拿巴主义者；鲁昂《社会改革报》
的编辑；第一国际鲁昂支部的建立者，日内瓦代表大会
(1866年)、洛桑代表大会 (1867)、布鲁塞尔代表大会
(1868) 和巴塞尔代表大会 (1869) 的参加者——第 9、40、
53、79、90、146、149页。
奥哲尔，乔治 (Odger, George 1820—1877) ——英国制鞋工
人，工联主义者，工联伦敦委员会书记 (1862—1872)；争
取波兰独立民族同盟成员 (1863)，圣马丁堂第一国际成立
大会 (1864年9月28日) 的倡议者之一；《蜂房报》编辑部
成员；几次提自己为议员候选人。1871年拒绝在总委员会宣
言《法兰西内战》上签字，并退出国际。——第89、115、122、
123、128页。

B

巴贝夫，弗朗斯瓦 (Babeuf, François 1760—1797) ——法国

的革命共产主义者，法国大革命的参加者；在热月反动时期（1795—1796）曾领导《平等派密谋》——第47页。

巴枯宁·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Бакунин, Михаил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1814—1876) ——俄国无政府主义者，从1864年起是第一国际会员；1865年建立了社会主义民主同盟，1868年曾企图使国际把这个团体作为一个独立组织接受为成员，但没有成功；在正式宣布解散同盟后仍继续领导秘密同盟，妄图依靠秘密同盟来夺取国际的领导权并企图把无政府主义纲领强加于国际。曾进行派别斗争反对总委员会；在一国际巴塞尔代表大会上企图组织巴枯宁派的多数，为此曾为自己的一些拥护者颁发了一些不存在的支部的委托书。在海牙代表大会上(1872)被开除出国际。——第35、47、48、50、51、57、60、66、76、81、90、133、134、136、137、138、142、143、146、148、149、150、151、152页。

巴斯特利卡，安得列(Bastelica, Andre 1846—1880) ——法国印刷工人，国际马赛支部的成员，巴枯宁主义者，同盟的成员，在巴黎公社期间任城市税务局长；1871年流亡伦敦，被选为总委员会委员，伦敦代表会议(1871)的参加者；后来参加社会波拿巴派(阿·里沙尔及其他)，因此被开除出国际——第31页。

巴斯腾，尤贝尔(Bastin, Hubert) ——比利时纺织工人，出席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代表第一国际维兹得拉联合支部——第29、75、78、90页。

邦霍尔斯特，列奥纳得·封(Bonhorst, Leonhard Von约生于1840年) ——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建筑工人，德国社会民主党爱森纳赫成立大会(1869)的参加者；由于党委员会在普法战争问题上持反对立场同委员会其他委员一起被捕，被法庭(1871年11月)宣判无罪，以后脱离政治活动。——第137、138页。

倍倍尔，奥古斯特 (Bebel, August 1840—1913) ——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创始人和领袖之一，旋工，第一国际会员，六十年代曾参加自由派建立的工人教育协会；1865年和威·李卜克内西一起建立萨克森人民党，是这个党内无产阶级派的首领，这一派后来在爱森纳赫代表大会（1869年8月7—9日）上建立了德国社会民主党。从1869年起是国会议员，反对俾斯麦制度，在反社会党人法年代（1878—1890）领导党的半秘密和秘密活动；第二国际活动家，后期犯过一些错误。——第130、131、133、146页。

贝尔纳(Bernard)——法国油漆工人，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从1868年起)；总委员会比利时书记(1869)——第89、112、115页。

贝克尔，约翰·菲力浦(Becker, Johann Philipp 1809—1886)——制刷工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48年革命的老战士，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巴登起义（1849）的领导者之一，流亡日内瓦。第一国际在瑞士的德国支部的组织者，《先驱者》报的编辑和发行人。曾被巴枯宁拉入同盟（1868），但很快就离开它，此后就支持总委员会。伦敦代表会议（1865）和国际历次代表大会的参加者——第33、49、81、90、96、132、133、134、135、136、137、146、148、149、151页。

贝克里，詹姆士(Backley, James)——英国油漆匠，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从1864年起)——第89、115页。

比顿，艾仁(Pièton, Eugène 生于1839年左右)——法国纺织工人，鲁昂工人联合会成员，以埃尔伯菲工人研究经济问题小组代表的身份出席第一国际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1870年因国际鲁昂支部审判案受审，被缺席判刑和罚款。——第53、80、90、96页。

毕尔克利，卡尔(Bürkli, Karl 1823—1901)——瑞士制革工人，傅立叶的信徒，资产阶级和平和自由同盟盟员，第一国际苏黎世支部的主席（1867）；瑞士合作运动的创始人之一，

第一国际日内瓦代表大会（1866）、洛桑代表大会（1867）和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的参加者——第81页。

俾斯麦，奥托·封（Bismarck, Otto von 1815—1898）——普鲁士外交大臣（1861—1867），北德意志联邦首相（1867—1871），德意志帝国首相（1871—1890）；革命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最凶恶的敌人。依靠贵族，用反革命的方法解决了德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中心任务——统一德国。——第19、28页。

波克罕，西格兹蒙得（Borkheim, Sigismund 1825—1885）——德国新闻记者，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巴登起义的（1849）的参加者；以后流亡英国——第134页。

博得，阿马布里（Baudet, Amable）——法国法兰绒纺织工人，第一国际里姆日支部成员，巴塞尔代表大会的参加者（1869）——第79页。

博尼（Bohny）——小五金商人，第一国际巴塞尔主要支部成员，曾代表该支部出席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第53、81、90页。

波特尔，乔治（Potter, George 1832—1893）——英国工联主义者，《蜂房报》创办人和编辑。——第140页。

布恩，马丁·詹姆斯（Boon, Martin James）——英国机械工人，1869年底在伦敦建立的土地和劳动同盟的荣誉书记；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9）——第115、123、138页。

布尔索，维尼托（Bourseau, Victor 生于1828年——法国工人，出席第一国际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的里昂铜匠联合会的代表——第79、90页。

布里斯美，德吉烈（Brismée, Désiré 1821—1888）——比利时工人运动活动家，布鲁塞尔印刷工人，第一国际会员；巴枯宁主义者，布鲁塞尔代表大会（1868）、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和海牙代表大会（1872）的参加者——第9、44、

53、68、69、78、90、146、155页。

布律安，卡斯帕尔·阿路瓦 (Bruhin, Kasper Alois 生于1824年) ——巴塞尔地区的主要检察官，第一国际巴塞尔支部出席巴塞尔代表大会 (1869) 的代表——第 5、9、32、46、80、90、106页。

布律涅耳，塞巴斯蒂昂 (Brunner, Sebastian) ——纽约德国工人联合总会副主席 (1869) ——第100页。

布罗塞，弗朗斯瓦 (Brossat, François) ——铸工，第一国际日内瓦中央支部成员，巴枯宁主义者，同盟盟员，1869年是瑞士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代表；巴塞尔代表大会 (1869) 的参加者——第80、91、142页。

D

德·巴普，塞札尔 (De Paepe César 1842—1890) ——比利时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医生和新闻工作者，在比利时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中起领导作用，一个时期曾受马克思很大的影响。第一国际比利时支部的组织者之一，曾参加伦敦代表会议 (1865)、洛桑代表大会 (1867)、布鲁塞尔代表大会 (1868) 和巴塞尔代表大会 (1869) 以及伦敦代表会议 (1871) ——第32、40、57、58、78、90、96页。

德尔，威廉 (Dell, William) ——英国帐幔工人，第一国际圣马丁堂成立大会的参加者之一 (1864)；第一国际伦敦代表会议 (1865) 的参加者——第89页。

德雷尔，西蒙 (Dereure, Simon 1823—1900) ——法国工人，鞋匠，布朗基主义者，第一国际巴黎支部的成员，巴塞尔代表大会 (1869) 和海牙代表大会 (1872) 的参加者。巴黎公社委员，公社失败后侨居美国，国际美国支部的组织者，纽约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大赦后回到法国，加入法国工

入党。——第79、90页。

杜邦，欧仁 (Dupont, Eugene 1831年左右—1881) ——法国工人，乐器匠，侨居伦敦，从1864年起是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马克思的战友；法国通讯书记（1865），伦敦代表会议（1865）和日内瓦代表大会（1866）的参加者；洛桑代表大会（1867）主席，布鲁塞尔代表大会（1868）副主席，1870年迁居曼彻斯特，继续在第一国际支部工作；伦敦代表会议（1871）的参加者。——第89、105、112、115、123、128、156页。

杜朗，吉斯达夫 (Durand, Gustave 生于1835年) ——法国首饰工人，第一国际巴黎支部成员，出席布鲁塞尔代表大会（1868）和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巴黎公社的参加者；流亡伦敦，1871年10月，因进行挑衅和特务活动被总委员会开除出国际——第53、67、75、79、90页。

多布尔，艾弥尔 (Dosbourg, Emile) ——法国印花布印染工人，第一国际圣丹尼支部成员，布鲁塞尔（1868）和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的参加者。——第53、79、90页。

F

法尔加-佩利塞尔，拉斐尔 (Farga-Pellicer, Rafael) ——西班牙人，印刷厂管理员，巴枯宁主义者，第一国际巴塞罗纳支部书记，同盟巴塞罗纳支部成员，第一国际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和海牙代表大会（1872）的参加者，巴枯宁主义者圣依米耶代表大会（1872）和无政府主义者日内瓦代表大会（1873）的参加者。——第30、33、81、90、91页。

法奈利，朱泽普 (Fanelli, Giuseppe) ——建筑师和工程师，加里波第进军的参加者，第一国际会员，同盟马德里和巴塞罗纳支部的组织者；国际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的参加者，

- 从1866年起是意大利国会议员。——第81页。
- 菲力浦，弗兰德伯爵（1837—1905）——比利时国王列奥波德一世的儿子。——第108、144页。
- 伏尔泰，弗朗索阿·马利·阿鲁埃（Voltaire, François-Marie Arouet 1694—1778）——法国作家和哲学家，大革命前法国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之一。——第47页。
- 福克斯，彼得·安德烈（Fox Peter Andre 死于1869年）——英国新闻工作者，作家，孔德主义者，第一国际圣马丁堂成立大会（1864年9月28日）的参加者，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1867），1866年是《共和国报》编辑部成员；美国通讯书记（1866—1867）——第89页。
- 弗拉奥，艾米尔（Flahaut, Emile 生于1838年）——法国大理石工人，法国巴黎大理石工人工会出席第一国际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的代表；1870年因对国际的第三次审判案在巴黎受审，但被宣判无罪。——第34、61、67、79、90页。
- 弗兰西奥（Francillon）——圣伊米耶钟表厂主——第29页。
- 弗朗坎，茹尔（Franguim, Jules 生于1838年）即卡里米纳——法国石印工人，1869年同巴黎印刷工人反抗协会一起加入第一国际，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的参加者；1870年因对国际的第三次审判案在巴黎受审，被判处监禁和罚款。——第79、90页。
- 弗里布尔（Fribourg）——法国工人，雕刻师，布景美术家，右派蒲鲁东主义者，第一国际巴黎支部建立者之一；伦敦代表会议（1865）和日内瓦代表大会（1866）参加者，蒲鲁东主义的第一国际史作者。——第147页。
- 弗雷，约瑟夫（Frey, Joseph）——制革工人，第一国际巴塞尔支部成员，洛桑代表大会（1867）和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的参加者。——第82页。
- 弗列泽（Fraser）——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9）——第123

页。

弗留诺 (Frunean) ——木匠，第一国际巴塞尔会员，巴塞尔代表大会 (1869) 参加者。——第53、68、79页。

福洛，安德列 (Foureaau, Andre 生于1820年) ——细木工，马赛建筑工人协会会员，第一国际马赛支部成员，巴塞尔代表大会 (1869) 参加者。——第79、90页。

弗洛凯，弗朗苏阿 (Flocquet, François) ——瑞士钟表工人，巴枯宁主义者，同盟成员，第一国际洛克尔支部成员，巴塞尔代表大会 (1869) 参加者。——第35、82、90页。

弗洛姆莱 (Frommlet) ——第一国际巴塞尔和巴塞尔地区联合支部委员会副主席。——第106页。

G

戈克，阿曼得 (Gogg, Amand 1820—1897) ——德国新闻记者，小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巴登革命政府 (1849) 的成员；资产阶级和平和自由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1869年是《背囊报》的编辑；瑞士德国工人教育协会的活动家；《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编委；第一国际会员，布鲁塞尔代表大会 (1868) 和巴塞尔代表大会 (1869) 的参加者——第10、29、42、82、90、137、139、146、148、149、151、152、153页。

格雷利希，海尔曼 (Greulich, Hermann 1842—1925) ——装订工人，瑞士社会民主党的创始人和领袖之一，第一国际苏黎世支部的书记 (1867—1876)，第一国际巴塞尔代表大会 (1869) 的参加者，后来是第二国际改良主义的首领之一。——第53、69、82页。

格罗斯兰，雅克 (Grosselin, Jacques 1835—1892) ——钟表匠，第一国际日内瓦中央支部成员，巴枯宁主义者；巴塞尔

代表大会（1869）的参加者。——第33、53、70、82、90、142页。

古特，海罗里得（Gut, Herold）——裁缝，以瑞士裁缝中央委员会代表的身份出席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第82、90页。

H

哈茨费尔特，索菲娅（Hatzfeld, Sophie 1805—1881）——伯爵夫人，拉萨尔的密友，拉萨尔（1864）死后曾资助从全德工人联合会分裂出去的一派。——第131页。

哈里斯，乔治（Harris George）——英国新闻记者，宪章运动领袖奥勃莱恩的追随者，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9—1872）——第122、123、128、157页。

豪威耳，乔治（Howell, George 1833—1910）——英国工联主义者，曾为砌砖工，伦敦工联委员会（1861—1862）和改革同盟（1864—1867）书记，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1872），诽谤性国际史的作者（1878）。——第89页。

亨格，弗里茨（Heng, Fritz）——瑞士工人，雕版匠，巴枯宁主义者，秘密同盟委员会委员，同盟日内瓦支部书记和罗曼语区联合会成员，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的参加者。——第41、82、90页。

赫斯，莫泽斯（Hess, Moses 1812—1875）——德国政论家，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所谓“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巴登起义（1849）的参加者。1863年参加拉萨尔主义运动，《社会民主党人报》的撰稿人；第一国际会员，布鲁塞尔（1868）和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的参加者。——第9、68、80、90、96、146、147、151页。

黑尔斯，约翰（Hales, John）——英国工联主义者，针织工人

协会领导人；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从1866年起）；1871年任总委员会书记，伦敦代表会议（1871）和海牙代表大会（1872）的参加者。海牙代表大会后在埃卡留斯、莫特施赫德等人的支持下夺取了第一国际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的领导权，并对总委员会和马克思、恩格斯进行诽谤。——第89、115、119、123、128、157页。

华尔顿，阿尔弗勒德（Walton, Alfred死于1883年）——英国宪章运动者，工联运动领袖之一，工人改革同盟成员，第一国际会员（从1865年起）；洛桑代表大会（1867）的参加者，总委员会委员（从1867年起）；写过一些关于地租问题的著作。——第89、119页。

霍夫施泰腾，约翰-巴普提斯特（Hoffstätten, Johann-Baptist）——德国军官，施韦译《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副编辑——第150页。

霍来特尔，雅科布（Holeiter, Jakob）——钳工，巴塞尔德国工人联合会出席第一国际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的代表——第82页。

J

吉约姆，詹姆斯（Guillaume, James 1844—1917）——瑞士无政府主义者，教师，新闻记者，第一国际洛克里支部的建立者（1866）；第一国际日内瓦代表大会（1866）、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和海牙代表大会（1872）的参加者；秘密同盟的主要成员之一，巴枯宁的朋友和战友；《进步报》和《团结报》的编辑；从1872到1878年是《汝拉联合会简报》的编辑；在海牙代表大会（1872）上被开除出第一国际。诽谤性的巴枯宁主义的第一国际史的作者（1905—1910）——第61、82、90、142、151页。

伽利略，伽利莱 (Galilei, Galileo 1564—1642) ——意大利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第47页。

K

卡普兰得 (Capeland) ——从1868起是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第89页。

卡普卢索，斯蒂凡诺 (Caporusso, Stefano) ——意大利人，裁缝，巴枯宁分子，第一国际那不勒斯中央支部主席，因挪用公款于1870年被支部开除，同盟日内瓦支部成员——第9、33、54、65、81、85页。

凯麦隆，A, C, C(Cameron, A, C,) ——美国全国劳工同盟的领导者之一，该同盟出席第一国际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的代表——第48、72、74、78、123、126、128、156、157、158页。

康拉德，卡尔 (Konrad, Karl) ——纽约德国工人联合总会主席 (1869) ——第100页。

康普 (Kamp) ——塞兰市 (比利时) 市长——第108页。

柯恩，约翰 (Cohn, John) ——雪茄工人，伦敦雪茄工人联合会主席，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从1867)，丹麦通讯书记，布鲁塞尔代表大会 (1868) 和伦敦代表会议 (1871) 的参加者——第89、115、123、128页。

科布顿，理查 (Cobden, Richard 1804—1865) ——曼彻斯特的工场主，自由贸易派首领，国会议员 (从1841年) ——第141页。

科克里尔，约翰 (Cockerill, John 1790—1840) ——英国资本家，1816年在塞兰 (比利时) 建立了有两千多工人的重工业制铁工厂；这个企业后来成为股份公司——第107，108页。

科林，伯恩哈特 (Collin, Bernhardt) ——商人，代表第一国际巴塞尔分部出席巴塞尔代表大会 (1869) ——第81、90、96

页。

克利盖尔，约翰 (Krieger John) ——新闻记者，代表第一国际德累斯顿分部出席巴塞尔代表大会 (1869)；巴塞尔地区支部联合会委员会书记。——第80、106页。

克列佐，让，克洛德 (Creusot, Jean-Claude 生于1826年) —— 法国精纺工人，鲁昂精纺工人联合会会员，第一国际会员，巴塞尔代表大会 (1869) 参加者；1870年因第一国际鲁昂联合会审判案被缺席判处监禁和罚款。——第53、79、90、96页。

库格曼，路易 (1827—1902) ——汉诺威医生，曾在莱茵地区参加1848年革命；从1862年起同马克思通信，向马克思系统报告德国情况，完成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关于德国事务的委托；洛桑代表大会 (1867) 和海牙代表大会 (1872) 的参加者，支持总委员会反对巴枯宁的斗争。——第154页。

昆舍，路易 (Quinche, Louis) ——制带工人，第一国际会员，以巴塞尔缘带工人代表的身份出席巴塞尔代表大会 (1869) ——第34、82、90页。

L

拉法格，保尔 (Lafargue, Paul 1842—1911) ——法国工人运动中马克思主义派的领袖之一；从1861起参加共和主义大学生运动；从1866年起是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西班牙书记。1870到1871年在巴黎和波尔多进行组织和鼓动工作；巴黎公社失败后逃到西班牙，在那里领导地方支部反对巴枯宁派的斗争。1880年同盖得一起建立了法国工人党。马克思的女婿。——第89、105、123、128页。

拉弗勒，艾米尔 (Laveleye, Emile 1822—1892) ——比利时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讲坛社会主义者——第141页。

拉萨尔，斐迪南 (Lassalle, Ferdinand 1825—1864) ——法学

家，德国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的始祖。60年代初进行争取普选权和通过国家帮助生产合作社办法长入社会主义的鼓动；从1863年起是全德工人联合会主席，把这个组织引上同容克资产阶级国家妥协的道路；死于决斗——第27、28、138、139页。

拉斯拜尔，弗朗斯瓦 (Raspail, François 1794—1878) ——法国化学家和政治活动家，左派共和主义者，1830和1848年革命的参加者。从1849到1853年坐牢，作为左派共和主义反对派的代表于1869年被选为立法团委员。——第15页。

莱森格尔，雅科布 (Leisinger, Jakob) ——裁缝，第一国际洛桑支部成员，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的参加者——第82页。

兰德林，依波利特 (Lanoerin, Hippolyte) ——铜匠，巴黎铜匠协会活动家，第一国际会员（从1868年），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参加者——第53、79、90页。

朗格鲁瓦，杰 (Langlois, J) ——新闻记者，代表巴黎金属旋工工会出席第一国际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第46、50、53、61、79、90、96页。

雷米，泰奥多尔 (Remy, Theodor) ——巴枯宁主义者，同盟瑞士日内瓦小组成员，约，菲、贝克尔领导的第一国际德国支部日内瓦委员会书记。——第133页。

李卜克内西，威廉 (Liebknecht, Wilhelm 1826—1900) ——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创始人和领袖之一，曾参加1848年革命。第一国际莱比锡支部的建立者，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的参加者。普法战争（1870）时反对军事拨款和兼并阿尔萨斯-洛林，因此被判处两年监狱监禁，同拉萨尔派合并（1875）的倡议者之一，党中央机关报《人民国家报》（1876—1877）、《前进报》（1876—1877和1890—1900）的编辑；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指导下在一些重要问题上执行了革命的无产阶级

路线，但不是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犯了一些机会主义性质的严重错误——第9、27、53、61、64、76、80、90、91、114、115、130、131、138、139、146、148、150、151、152、153、155、页。

利姆堡 (Limburg, W) ——德国鞋匠，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1868—1869) ——第89、115页。

里沙尔，阿尔伯 (Richard, Albert 1840—1925) ——法国织工工人，1872年以前是无政府主义者，国际里昂支部成员，里昂通讯书记，国际布鲁塞尔代表大会 (1868)、巴塞尔代表大会 (1869) 和伯尔尼和平与自由同盟代表大会 (1868) 的参加者。1868到1870年积极帮助巴枯宁组织同盟。巴黎公社失败后流亡英国；1872年初，和古·布兰克一起，用拿破仑第三的钱出版书籍，宣传恢复帝国；后来到意大利，继续进行波拿巴主义宣传。——第7、27、39、45、48、58、59、80、90页。

李什费尔特，托马斯-乔治 (Leachfield, Thomas-George 1825—1895) ——英国保守党人，上议院议员——第140页。

里廷豪森，莫里茨 (Rittinghausen 1814—1890) ——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新闻工作者，宣传“直接人民立法”，第一国际佐林根支部成员；巴塞尔代表大会 (1869) 和海牙代表大会 (1872) 的参加者；后来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党；1877—1878和1881—1884年是国会议员。——第30、80、90、91、96、147、148页。

林肯，阿布拉罕 (Lincoln, Abraham 1809—1865) ——美国总统。——第32、113页。

列斯纳，弗里德里希 (Lessner, Friedrich 1825—1910) ——在伦敦的德国流亡者，裁缝，曾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盟员；从1864年起是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在国际中捍卫马克思的路线；伦敦代表会议 (1865)、洛桑代表大会 (1867)、

布鲁塞尔代表大会（1868）、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伦敦代表会议（1871）和海牙代表大会（1872）的参加者；后来成为工联的活动家——第49、70、78、89、90、96、115、123、126、128、157页。

鲁克拉夫特，本杰明（Lucraft, Benjamin 1809—1897）——英国家具工人，著名的工联主义者，圣马丁堂第一国际成立大会（1864年9月28日）的参加者；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从1864年）；工联争取选举改革运动著名活动家之一；代表总委员会出席布鲁塞尔代表大会（1866）和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由于不愿在总委员会宣言《法兰西内战》（1871）上签名而脱离国际。——第43、76、78、89、92、96、115、118、119、123、125、153页。

鲁塞尔，艾德华（Roussel, Edouard）——法国白铁工人，第一国际会员，作为巴黎白铁工人协会的代表出席布鲁塞尔代表大会（1868）和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第53、81、90页。

路易·波拿巴，见拿破仑第三。

罗伯尔，弗里茨（Robert, Fritz）——瑞士教师，绍德封的数学教员，巴枯宁主义者，第一国际绍德封分部的成员，洛克里支部的领导人，布鲁塞尔代表大会（1868）和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的参加者——第9、82、90、146、149、150页。

罗班，保尔（Robin, Paul生于1837年）——法国教育家，巴枯宁主义者，第一国际会员，1869年因宣传国际被驱逐出比利时，流亡日内瓦；同盟日内瓦支部书记，《平等报》编辑；1870年10月被补选为总委员会委员；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的参加者；作为有发言权的代表出席伦敦代表会议（1871）。——第32、53、78、90、142、143页。

罗，哈里埃特（Law Harriett 1832—1897）——英国无神论者

运动激进派领导人之一，从1867年起是第一国际总委员会的积极成员。——第89、115页。

罗斯，J (Ross, J) ——英国制鞋工人，从1869年起是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第115页。

M

马基雅弗利，尼古洛 (Machiavelli, Niccolo 1469—1527) ——意大利政治活动家，写过一些论国家的著作——第19页。

马克思，卡尔 (1818—1883) ——第89、112、115、118、121、123、128页。

马克思，燕妮，冯·威斯特华伦 (Marx, Jenny, Von Westphalen 1814—1881) ——卡·马克思的妻子——第146页。

马克思，燕妮 (Marx, Jenny 1844—1883) ——卡·马克思的女儿；从1873年是沙·龙格的妻子——第158页。

马尔蒂诺 (Martinaud) ——法国免去教衔的天主教神甫，无神论者，纽沙特尔吉约印刷厂的排字工人，凭巴枯宁派发给的伪代表资格证出席了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第84、142页。

迈耶尔，齐格弗里特 (Meyer, Siegfried 1840—1872) ——纽约全德工人联合会通讯书记，第一国际会员——第100页。

迈尔，卡尔 (Mayer, Karl 1819—1889) ——德国新闻工作者，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观察家报》的编辑——第138页。

米尔纳，乔治 (Milner, George) ——裁缝，奥勃莱恩的追随者，从1869年起是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出席伦敦代表会议 (1871) 的只有发言权的代表；1872年离开总委员会——第89、115、119、121、123、128页。

弥勒·安 (Muller) ——瑞士钟表工人，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1869) ——第115页。

莫兰，加布里埃尔 (Mollin, Gabriel) ——金属镀金工匠，巴黎《无产者—实让论者协会》出席巴塞尔代表大会 (1869) 的代表——第32、53、79、90页。

莫里斯 (Maurice) ——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从1866年) ——第89，123页。

莫尼叶，沙尔 (Monnier, Charles) ——制帽工人，代表圣·圣福里安得奥赞 (法国) 捻丝工支部出席第一国际巴塞尔代表大会 (1869) ——第79页。

缪拉，安得列 (Murat, Andre生于1833年) ——法国机械工人，蒲鲁东主义者，第一国际巴黎支部成员，日内瓦代表大会 (1866)、洛桑代表大会 (1867)、布鲁塞尔代表大会 (1869) 和巴塞尔代表大会 (1869) 的参加者，曾因对国际的第一次 (1868) 和第三次 (1870) 审判案在巴黎受审——第26、33、39、48、53、59、68、79、90、96、124页。

N

拿破仑第三，波拿巴 (1808—1873) ——法国皇帝 (1852—1870) ——第109页。

牛顿，依萨克 (1642—1727) ——英国数学家，天文学家和物理学家——第47页。

诺马耶，路德维希 (Neumayer, Ludwig) ——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新市民周报》的编辑，第一国际维也纳支部成员，同情巴枯宁，巴塞尔代表大会 (1869) 的参加者——第34、80、90、136、146、152页。

P

帕利克斯，路易 (Palix, Louis约1829—1871) ——法国工人，

裁缝，巴枯宁主义者，里昂工人联合会成员，国际里昂支部的有威信的成员之一，第一国际洛桑代表大会（1867）和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的参加者——第29、80页。

潘迪，让-路易（Pindy, Jean-louis 1840—1917）——法国木器工人，蒲鲁东主义者，工人协会联合会委员，第一国际巴黎支部成员，布鲁塞尔代表大会（1868）和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的参加者。曾因对国际的第三次审判案1870在巴黎受审，被判处一年监禁。巴黎公社委员，《少数派》拥护者。后来参加瑞士的无政府主义运动，日内瓦（1873）和伯尔尼（1876）无政府主义者代表大会的参加者。——第53、80、91、96页。

培列，昂里（Perret, Henry）——瑞士人雕版师，第一国际会员，1868年曾为巴枯宁的同盟中央局委员，但不久后以日内瓦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书记的身份领导了日内瓦支部反对巴枯宁的斗争。第一国际日内瓦代表大会（1866）、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和伦敦代表会议（1871）的代表。——第32、53、82、90、141、142页。

佩龙，沙尔·欧仁（Perron, Charles）——搪磁器皿画家，第一国际会员，巴枯宁主义者，日内瓦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平等报》的主编，第一国际洛桑代表大会（1867）和布鲁塞尔代表大会的参加者。——第142、143页。

佩蒂·燕妮（Petit, Jenny死于1869年）——十二岁女孩，里卡马里（法国）罢工时被士兵枪杀。——第20页。

皮尔美·艾都尔（Pirmez, Eudore 1830—1890）——比利时内政大臣（1868—1869），自由主义者，国民银行经理。——第103、144页。

普鲁斯，亨利·奥斯丁（Bruce, Henry Austin 1815—1895）——英国内务大臣（1869—1873）——第25页。

蒲鲁东，比埃尔、约瑟夫（1809—1865）法国小资产阶级经济

学家，无政府主义创始人之一。——第145页。

Q

乔治，查尔斯 (George, Charles) ——钟表工人，第一国际穆其埃（瑞士）分部成员，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的参加者——第82页。

R

热叶，维克托 (Jaillet, Victor) ——制革工人，第一国际洛桑分部出席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的代表——第82、91页。荣克，海尔曼 (Jung, Hermann 1830—1901) ——瑞士钟表匠，1848年革命参加者，流亡伦敦，从国际建立之日起就是总委员会委员，瑞士通讯书记。1872年以前是马克思的拥护者。伦敦代表会议（1865）的参加者，日内瓦代表大会（1866）、布鲁塞尔代表大会（1868）和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主席，伦敦代表会议（1871）参加者，在各次代表大会上执行了总委员会路线；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成员，参加这个委员会从国际分裂出去的《多数派》，反对海牙代表大会（1872）决议。——第9、11、30、31、37、48、51、62、63、68、72、75、77、78、89、98、112、122、123、125、126、128、141、142、146、147、151、152、153、156、157页。

若昂纳尔，茹尔 (Johannard, Jules 1843—1888) ——法国人，营业员，第一国际会员，总委员会委员，意大利通讯书记（从1869年起），因对国际的第三次审判案（1870）在巴黎受审，被判处监狱监禁，1870年9月4日被释放；巴黎公社委员，《多数派》的拥护者，曾参加第一国际海牙代表大会，支持马克思反对巴枯宁派的斗争——第89、112、115页。

S

散蒂尼昂，加斯帕尔 (Sentifon, Gaspar死于1903年) —— 医生，巴枯宁主义者，巴塞罗纳秘密同盟 (1868) 和同盟日内瓦支部的成员，巴塞尔代表大会 (1869) 的参加者；1872年后脱离革命运动。——第9、81、90、96页。

舍尔瓦尔 (Cherval) —— 普鲁士密探。——第129页。

舍勒，亨利 (Scherrev, Heinrich) —— 大学生，第一国际巴塞尔支部成员，巴塞尔代表大会 (1869) 的参加者。——第80页。

舍马莱，费里克斯 (Chemale, Felix生于1839年) —— 法国建筑师，右派蒲鲁东主义者，1865年建立的第一国际巴黎支部的领导人之一；日内瓦代表大会 (1866)、洛桑代表大会 (1867) 和巴塞尔代表大会 (1869) 的参加者，曾因对国际的第一次审判案于1868年在巴黎受审，被判罚款。——第31、39、41、45、49、53、57、61、65、79、90、124、147、148、153页。

什纳普斯——马克思的孙子、劳拉和拉法格的儿子 (生于1868，早夭) 的外号。——第158页。

圣西门，昂利 (1760—1825) —— 空想社会主义最著名的代表之一。——第55页。

施皮尔，赛米尔 (Spier, Samuel生于1838年左右) —— 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社会民主党爱森纳赫成立大会 (1869) 的参加者；因党委员会在普法战争 (1870) 问题上的反对立场同委员会其他成员一起被捕并被审讯；第一国际巴塞尔代表大会 (1869) 的参加者。——第9、29、39、80、90、146、150页。

施维茨格贝耳，阿德马尔 (Schwitzguebel, Ademar 1844—

1895) ——瑞士雕版工人，巴枯宁主义者，秘密同盟委员会委员，第一国际汝拉联合会书记，带领这个支部反对总委员会；日内瓦代表大会(1866)、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和海牙代表大会(1872)的参加者。——第29、30、82、90页。

施韦泽，约翰·巴普提斯特 (Schweitzer, Johann Baptist 1833—1875) ——法兰克福律师，民族自由派；60年代初参加拉萨尔派，从1865年起是全德工人联合会主席，柏林《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1865年在创办该报时得到俾斯麦的津贴；1871年后脱离政治生活。——第28、130、131、132、139、150页。

舒尔采-德里奇·弗朗茨 (Schulze-Delitsch, Franz 1808—1883) ——德国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提出把合作社和银行作为反对革命工人组织的主张。——第28页。

斯塔克，鲁道夫 (Starke, Rudolf) ——皮靴匠，巴塞尔制靴匠协会会员，第一国际会员，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的参加者；1872年是第一国际纽约临时联合会委员会成员。——第82、60页。

斯特普尼，考威尔 (Stepny, Cowen 1820—1870) ——英国人，曾参加第一国际圣马丁堂成立大会(1864年9月28日)，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从1866年起)，总委员会司库(1869—1872)；第一国际布鲁塞尔代表大会(1869)和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的参加者。——第26、42、78、89、90、105、112、115、128、147、153页。

T

塔尔塔列，艾仁 (Tartaret, Eugène) ——法国大理石研磨工人，大理石研磨工人工会会员，第一国际巴黎支部成员，布鲁塞尔代表大会(1868)和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的参加

者。——第31、49、61、69、80页。

图尔奈森，爱德华 (Thurneysen, Eduard 1824—1890) ——巴塞尔大会会议主席。——第12页。

托伦，昂利 (Tolain, Henri 1828—1897) ——法国雕刻工，蒲鲁东主义者，合作运动者；在第一国际圣马丁堂成立大会（1864年9月28日）上代表法国工人发言；第一国际巴黎支部的组织者之一，巴黎支部领导成员；伦敦代表会议（1865）、日内瓦代表大会（1866）、洛桑代表大会（1867）、布鲁塞尔代表大会（1868）和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的参加者。1870年9月4日以后是叛徒，巴黎公社的敌人，凡尔赛议会的议员。根据总委员会决定开除出第一国际；从1876年起是上议员，反对大赦公社委员的建议。——第45、51、53、61、67、80、124、147、148、151页。

W

瓦尔兰，欧仁 (Varlin, Eugene 1839—1871) ——法国印刷工人，左派蒲鲁东主义者，巴黎职工运动的著名活动家，第一国际法国支部的组织者之一，伦敦代表会议（1865）、日内瓦代表大会（1866）和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的参加者；曾因对第一国际的第二次审判案在巴黎受审；巴黎工人协会联合会书记；巴黎公社委员，拥护《少数派》，1871年5月28日公社失败后被凡尔赛军队枪杀。——第9、34、59、80、90、96、146、149页。

沃伦 (Warre, J) ——英国制箱工人，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从1869年起）。——第115页。

魏尔格尔 (Würger) ——德国制革工人，第一国际洛拉赫（巴登）支部成员，代表该支部出席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第81页。

威廉斯，查理 (Williams, Charles) ——英国抹灰工，工联活动家，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从1866年）；1875进入工联议会委员会。——第89页。

韦斯顿，约翰 (Weston, John) ——英国木工，欧文主义者，第一国际圣马丁堂成立大会（1864年9月28日）的参加者，国际总委员会委员（从1866年）；伦敦代表会议（1865）的参加者；巴塞尔代表大会后在伦敦成立的土地和劳动同盟主席。——第89、115、119、123页。

文克海姆，贝拉·冯 (Wenckheim, Bela von 1811—1879) ——从1867年起是匈牙利内政大臣，自由派——第23页。

乌其叶，塞列斯登 (Outhier, Celestin) ——法国工人，第一国际里昂支部成员，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的参加者。——第80、90页。

X

西耳维斯，威廉 (Sylvis, William 1828—1869) ——铸工，六十年代美国工人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国际铸铁工人联合会主席，美国全国劳工同盟主席，支持该同盟加入第一国际。——第26、73页。

肖，罗伯特 (Show, Robert 死于1870) ——英国油漆匠，第一国际圣马丁堂成立大会（1864年9月28日）的参加者；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从1864年），总委员会美国的英国人支部通讯书记，伦敦代表会议（1865）和布鲁塞尔代表大会（1868）的参加者。——第89、112、115页。

Y

扬纳什 (Janasch) ——政治经济学教授，巴塞尔大学副教授，

第一国际马格德堡支部成员，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参加者。——第80、90、96页。

Z

扎比茨基，安东尼 (Zabicki, Antoni 1810—1889) ——波兰革命者，排字工人，曾参加1848年匈牙利革命，任波兰军团少尉；1848年革命后流亡伦敦，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5），波兰通讯书记（从1866年起）——第89、112、115页。

报 刊 索 引

- 《背囊报》(《Das Felleisen》) ——瑞士德国工人教育协会的中央机关报，从1862年到1874年先在苏黎世出版，后在日内瓦出版，1869年由戈克主编。——第82页。
- 《晨星报》(《Morning star》) ——带有自由主义倾向的一家日报，从1862年到1870年在伦敦出版。——第147、148页。
- 《工人报》(《De Werker》) ——第一国际支部的机关报，从1867年起用佛来米文在安特卫普出版。——第27页。
- 《工人报》(《De Werkmann》) ——第一国际支部的机关报，周报，从1868年起用荷兰文在阿姆斯特丹出版。——第24页。
- 《工人辩护士报》(《Working Man's Advocate》) ——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在芝加哥出版。——第80页。
- 《国际报》(《L'International》) ——法文日报，法国政府的半官方报，从1863年到1871年在伦敦出版。——第136页。
- 《国际报》(《L'Internationale》) ——周报，第一国际比利时支部的中央机关报，从1869年到1873年在布鲁塞尔出版。——第16、27、106页。
- 《进步报》(《Le Progrès》) ——汝拉的巴枯宁派的双周机关报，从1868年12月到1870年4月在吉约姆和巴枯宁的直接参加下在洛克尔(瑞士)出版。——第143页。
- 《觉醒报》(《Le Réveil》) ——德勒克吕兹创办的左派共和主义者报纸，从1868年到1871年在巴黎出版。——第33页。
- 《联邦报》(《Der Bund》) ——在伯尔尼(瑞士)出版的一家日报，从1850年出版到现在，在六十一七十年代具有资产阶级激进主义倾向。——第151页。

- 《联盟》(《La Federacion》) ——第一国际西班牙支部的机关刊物，周报，从1869年8月到1873年在巴塞罗纳出版，编辑是法尔加-佩利塞尔。——第24、81页。
- 《米拉波报》(《Le Mirabeau》) ——法文周报，带有无政府主义倾向，从1867年到1880年在佛尔维耶出版，从1868年起是第一国际地方支部的机关报。——第27页。
- 《派尔-麦尔新闻》(《Pall-Mall Gazette》) ——带有保守主义倾向的一家晚报，从1865年起在伦敦出版。——第148页。
- 《平等报》(《L'Egalité》) ——第一国际罗曼语区联合会的机关周报，从1869年到1872年在日内瓦出版，最初受巴枯宁的直接影响；从1870年1月起实际上由吴亭主编出版，保卫总委员会的路线。——第99、137、141、142页。
- 《人民国家报》(《Der Volksstaat》) ——德国社会民主党(爱森纳赫派)的中央机关报，由威·李卜克内西主编，从1869年到1876年每周出版三次。——第80页。
- 《人民之声报》(《Die Volksstimme》) ——社会民主党人的报纸，从1869年起由奥伯温德主编，在维也纳出版，1869年10月被警察当局查封，1870年用《人民意志》(《Volkwille》)的名称继续出版。——第80页。
- 《设菲尔德独立报》(《Sheffield Independent》) ——带有自由主义倾向的报纸，从1819年起在设菲尔德出版。——第157页。
- 《社会民主党人报》(《Der Sozial-Demokrat》) ——拉萨尔派的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机关报，日报，从1864年到1871年在柏林出版。——第28页
- 《泰晤士报》(《Times》) ——大型日报，大资产阶级的机关报，英国政府的半官方报纸，从1785年起在伦敦出版。——第158页。
- 《通报》(《Le Moniteur Universal》) ——从1789年到1901

年在巴黎出版的一家日报；到1869年初是政府的官方机关报。——第20页。

《维也纳新城周报》（《Wiener-Neustadter Wochen-blatt》）——带有左派民主主义倾向的一家周报，于1869年在维也纳新城出版。——第80、135页。

《先驱》（《Der Vorbote》）——一种月刊，第一国际德国支部的中央机关刊物，主编是约·菲·贝克尔，从1866年到1871年在日内瓦出版。——第132、134页。

《总汇报》（《Allgemeine Zeitung》）——大型日报，从1798年到1882年在奥格斯堡出版；六十一七十年代具有民族自由主义倾向。——第14页。